

ISSN
1000-7326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学术
研究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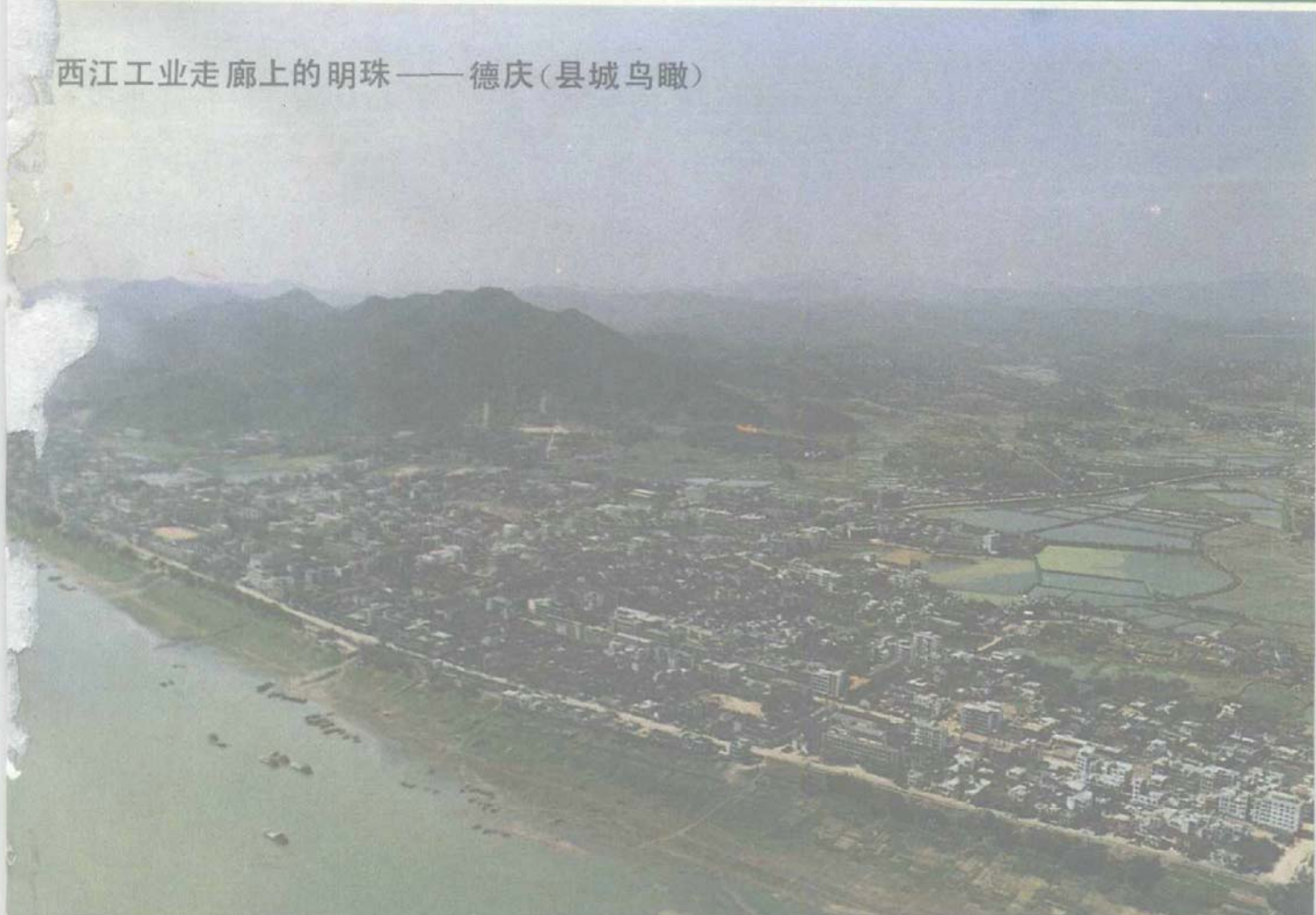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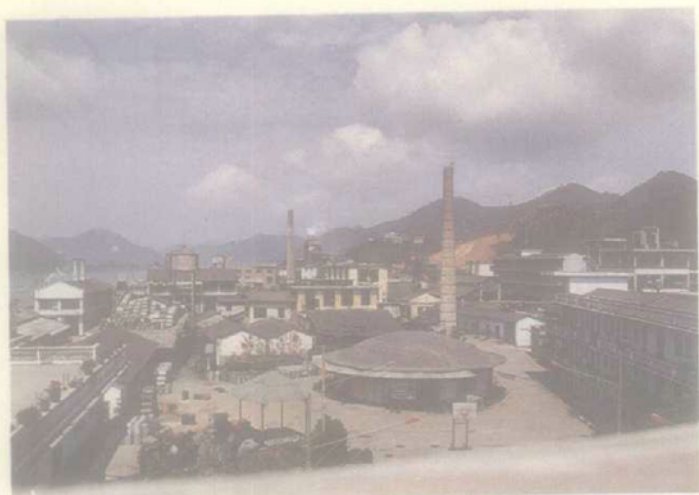
- 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理解与庸俗化
- 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内资金来源
-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
- 思想启蒙与反传统
-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 五四文学及其流变的反思
- 有此一说：“应用哲学”即“无哲学”
-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受到质疑



ACADEMIC RESEARCH

西江工业走廊上的明珠——德庆(县城鸟瞰)





▲ 省级先进企业德庆县林产化工厂。

德庆林化厂新产品系列。



▲ 德庆稀土冶炼厂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稀土系列金属钕等十余个产品。图为该厂先进的检测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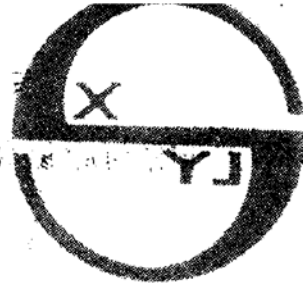
蓬勃兴起的德庆山区工业



▲ 德庆西江石料厂。

该厂引进的80年代意大利花岗岩饰面板生产线。

◀ 图为该厂部分产品。



学术研究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N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书号：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穗工商广字207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 1989年第二期(总第九三期)目 录

专 题 评 论

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理解与庸俗化 邹永图 (6)

五四运动70年

思想启蒙与反传统

- 李泽厚谈五四运动.....本刊记者 刘斯翰 凌 峰 (9)
五四“民主”口号的梦幻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虚弱性.....张梦阳 (12)
为了人的解放：我对五四精神的理解 陈鸣树 (16)
五四文学及其流变的反思 邓国伟 (20)

政 治

- 权威崇拜与政治参与意识 葛 荃 (26)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 俞可平 (29)

经 济

- 产业结构调整的内资来源 厉以宁 (32)
“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与中国的对外经济 何小锋 (38)
现代股份制运作机制及借鉴意义 刘文韶 梁俊乾 (44)
企业集团发展趋向的垄断性 范 英 刘 青 (48)
经济联合体间的利益分配研究 王 河 (52)
就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与张太增等高权 何国文 何力坚 (56)

纪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国庠

- 略论杜国庠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张江明 章权才 (58)
墨者·学者·革命者
——谈杜老的为人与治学 李锦全 (63)
文艺大众化的先声
——读杜国庠《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 熊泽初 (69)

稿件主审签发 张颂城 总校对 黄荣显 封面设计 陈沛林

杜国庠主要著、译年表 熊泽初 黄学盛 (72)

学术报导

有此一说：“应用哲学”即“无哲学”..... 本刊记者 石 成 (76)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受到质疑..... 本刊记者 晨 一 (78)

“龙学”已成为东方文化新“显学”

..... 本刊记者 陶原珂 刘绍瑾 (80)

学者议政

解决我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吴 光 (82)

文 史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 陈胜彝 (87)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李时岳 (92)

马克思对跨越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三个阶段 郑 镇 (99)

试论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认同性 陈少华 (103)

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 吴国钦 (108)

国情·省情·县(市)情

资源——技术——市场

——德庆山区工业发展引发的思考 蔡仁秀 (113)

书 评

人类历史行为：由短期转向长远

——梁桂全《发展战略学》读后 杜 平 (115)

书海酌蠡

枢密院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蠡之·25) 《新学伪经考》

初刊年月考(陈占标·28) 吴质籍贯小考(熊清元·55)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奖项目(1986—1987年) (117)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2, 1989)

CONTENTS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nderstanding 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Scientifically and Vulgarizing ItZou Yongtu (6)
- Enlightenment of Thinking and "Anti-tradiction"—Professor Li Zhehou talks about the May 4th Movement (correspondents of this journal) Liu Sihao & Ling Feng (9)
- The Dreamlike Feeling of the May 4th Movement's Slogan "Democracy" and the Weaknes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Zhang Mengyang (12)
-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Chen Mingshu (16)
-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Its VariationsDeng Guowei (20)
- Authority Worship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Ge Quan (26)
- The Basic Patter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Main FeaturesYu Keping (29)
- The Sources of Domestic Funds for the Structur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esLi Yiling (32)
- The Bloc Tendency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Chinese External EconomyHe Xiaofeng (38)
- The Proceeding Mechanisms of the Modern Stock System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Liu Wenshao & Liang Junqian (44)
- The Monopolisticity within the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Blocs.....Fan Ying & Liu Qing (48)
- A Research into the Allocation of Benefits between Economic Associate Bodies.....Wang He (52)
- A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s of Surplus Value with Mr. Zhang Taizeng and So-and-So..... He Guowen & He Lijian (56)
-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Mr. Du Guoxiang's Down-to-earth Spirit of Doing Scholarly Work.....Zhang Jiangming & Zhang Quancai (58)

- A Man of Letters, Scholar and Revolutionist—A talk about Mr. Du Guoxiang's conduct and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Li Jinquan (63)
- The Precursor of Popularizing of Literature and Arts—A comment on Du Guoxiang's article "1929's Several Critical Problem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Which Must Be Solved at Once" Xiong Zechu (69)
-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Du Guoxiang's Main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Xiong Zechu & Huang Xuesheng (72)
- It is said that "Applied Philosophy" Is No Other than "Non-philosophy"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Shi Cheng (76)
- It's Queried that "the Intellectuals Are a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Chen Yi (78)
- The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Has Become a New Noticeable Branch of Learning of Oriental Culture (correspondents of this journal) Tao Yuanke & Lui Shaojin (80)
- My Opin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Our Country.....Wu Guang (82)
- On How to Rerecognize the Morp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Chen Shenglin (87)
- The Cruxes i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Civil Rights"Li Shiyue (92)
- The Three Stages of Marx's Recogniz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Surmount the Period of Capitalism.....Zheng Zhen (99)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the Assimilativity in the Comparative Cultur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Chen Shaohua (103)
- The Relat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Drama to the "Washe" Culture ("Washe" was a kind of amusement grounds of the metropolise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Wu Guoqin (108)
-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A ponderation brought about fro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Deqing CountyCai Renxiu (118)
- The Historical Conducts of Mankind: from the Short-term's to the Long-term'sDu Ping (115)
- A General Catalogue of Guangdong's Outstanding Prize-winning Works in Social Sciences(1986—1987) (117)

· 专题评论 ·

当前在“生产力标准”问题上存在四种误解：把“根本标准”视为“唯一标准”；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视为“直接”决定作用；把生产力标准等同于实践标准；把生产力标准视为单一的物质标准。

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理解与庸俗化

邹永图

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标准问题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范畴，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即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因而在理解和把握生产力标准时必须抛弃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坚持系统、全面的历史辩证法观点。“生产力标准”涵义是十分广泛的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要回答什么是生产力标准，还要回答生产力为什么能成为根本标准等问题。我认为，至少要从以下的几个层次或方面去理解，才能完整地、科学地领会“生产力标准”的涵义。

第一，“生产力标准”是指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是任何社会形态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主要动力，它的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整个社会机体的面貌及其变化。显然，同生产力相比较，其他社会因素都不可能拥有这种地位和起到这种作用。

第二，“生产力标准”是指发展生产力是一切进入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

的中心任务。这同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表明，生产力所以是根本标准，是因为无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抑或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都应当支持，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反之，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都必须反对，特别是封建残余、官僚主义以及僵化思想。

第三，“生产力标准”是指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动因、目的和成败的衡量尺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否成功，最后还是要从整体上看是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第四，“生产力标准”是指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重大问题、制订路线方针

政策、确定规划、建立体制以至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革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同时，是指我们各战线、各部门、各单位以至每一个公民的工作和活动，必须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为总的目标和总的方向。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的观念指导，就意味着并没有真正掌握“生产力标准”，有可能走上邪路。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生产力标准”的基本涵义。但是，当前在“生产力标准”的讨论中，仍然有种种误解需要澄清。

一是把“根本标准”理解为“唯一标准”。这表现在以生产力作为划分不同性质的社会和同一性质社会的不同阶段的唯一标准，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重复了形而上学社会“因素论”的错误，否定了历史辩证法的社会系统论。既然社会系统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那末，划分和检验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状态，除了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之外，无疑还有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些第二级标准。把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就不能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二是把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理解为“直接”的决定作用，把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理解成“唯一任务”，因而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认为增加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投资势必影响经济建设。诸如此类的误解，其形而上学是很明显的。按照辩证法，无论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都是客观存在又互相依存的，抓主要矛盾并不否定或忽视次

要矛盾的解决，两者是互相制约的。同时，决定作用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生产力除了直接地决定社会的面貌之外，往往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间接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是把坚持生产力标准理解为“就是坚持真理的检验标准”，将两个标准完全等同起来。这种理解也有片面性。因为，一方面，这两个标准的应用对象不同：前者是检验客观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后者则是检验主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虽然是主要的实践形式，但决不是唯一形式；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则包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等等各种实践形式。所以，可以说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只是深化了但不是等同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了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我们必须同时坚持生产力标准以及真理的检验标准，决不可使两个标准相互代替或混为一谈。

四是把“生产力标准”理解为单一的物质标准，否认生产力标准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

懂得了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及其科学涵义，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全面应用它，这是由于理论认识同现实实践毕竟不是一回事。迄今为止，在坚持与应用“生产力标准”方面，出现了几种值得注意的错误倾向：

一种是把“生产力标准”整个物质化的倾向。只讲“物”的因素，不讲“人”的因素，见物不见人。表现在只看生产总值、物质财富、机器设备和收入利润，不问社会的

精神财富、劳动者的素质、人民的需要、工作者的积极性、人的精神道德和人才多少。这在实际上，把“四个现代化”变成了“一个物质化”。

一种是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的倾向。把社会发展简单看成产值翻番；把发展生产力变为“一切向钱看”和个人发财，以单一的产值增减幅度或获取利润多少去评价单位和个人工作的实绩，以至全民经商，党政机关办公司、校长以“抓创收”为主……诸如此类，一句话，把“发展生产力”变成了单纯的“赚钱”。

一种是应用“生产力标准”的急功近利的倾向。相当普遍的企业短期行为；不少农民富裕了不愿扩大再生产；对资源的随意开发、滥用，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相当大量的科教人员离开岗位去搞“创收”，只讲应用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坚持和应用“生产力标准”，决不能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防止或纠正物质化、庸俗化和急功近利等倾向，也决不是叫人们走回头路，空喊政治口号，不搞生产而只人为地频繁变动生产关系；决不意味着发展生产力不要物质、不讲赚钱、不问功利，只有坚持生产力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体原理，才能全面运用生产力标准，这是因为：

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不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外在的凑合，而是二者内在的有机结合。物质生产力乃是人们利用物质工具改造自然界，使之成为人化自然而形成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在劳动过程中进行物质交换的产物；在最一般意义上说，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人首先是有血

有肉的自然实体，它需要物质上的衣食住行，所以，人质生产力离不开“物”的因素；社会关系的生产是以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当然离不开“物”，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在本质是物质关系与人的关系的一体化产物，因而人的关系往往通过物的关系来表现或实现；精神生产力同样体现了人与物的不可分离性，因为精神，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念、理论政策等等，都是人的思维的产物，是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反映和建构，而这又离不开人脑这种特殊的物质。同时，精神生产也离不开印刷厂、报刊、电台等等物质外壳和物质手段。否则，便难以形成精神产品。

可见，任何生产力都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体。这两种因素在统一的生产力内部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差别的：一方面，物是生产力的基础因素，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自然条件等，是形成和发挥生产力的基础。没有物质基础，再多人也无从起作用，所以，“物”在生产力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和动摇的。另一方面，人在生产力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是同样不可否定的。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能力，人是生产力中能动的因素。马克思称机器等生产资料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人的活劳动，才能“使它们由死复生”，物的因素才能起到基础的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新儒学派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我不以为然。五四应该全盘肯定。五四确实遗留下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思想启蒙方面遗留的问题更大。正因为如此，五四的现实意义更大。

全盘反传统不是一种科学态度。五四反传统的过激，是封建传统极为强大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必要的行为；如在今天仍然强调这点，只能成为一场历史闹剧。

思想启蒙与反传统

——李泽厚谈五四运动

本刊记者 刘斯翰 凌 峰

问：李先生，您曾在《现代思想史论》中对五四运动作过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今值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之际，想请你就此谈谈感想。

答：五四运动是现代思想史上重大事件，其影响既深且广，近年来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兴趣有日益强烈的趋向，以至发生种种分歧，如对五四褒贬不一，这都是很自然的。目前在思想界有两种恰好相反的意见，对吧？

问：不是太清楚，请你具体谈谈。

答：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五四运动应该否定，认为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个错误，是不应该搞的。新儒学派中一部分人持这个观点，他们尊孔，强调历史传统，五四提倡“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当然错了。和这种观点相近的意见，是指责五四的反传统过了头，有片面性，等等。我认为五四应该全面肯定。别的不说，提倡白话作为“运动”又取代了文言文，就是一大功劳。在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自我改造上，搬进或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

概念、思维形式、表述方法，便是突破旧传统束缚的重要方面。白话文运动是立了大功的。试想如果今天我们仍用文言文写作，思考，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不可想象的。反传统的片面性，在我看来，在当时也是必要的。鲁迅“开窗子”与“拆房顶”的譬喻很能说明情况，在封建思想影响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只有用激烈的主张去冲破它。至于五四举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还有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这用不着多说了。

问：您曾经指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即启蒙运动与政治运动。开始是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后来救亡压倒启蒙，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现在您肯定五四，基本上都是列举其启蒙的方面，是不是认为今天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启蒙的方面？

答：我曾说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启蒙与救亡是那时代的两大主题。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定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地。其次，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

同于以前的是，这次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能延续多久，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反抗侵略和农民土地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都笼罩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这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刻悲剧。我想，五四的启蒙主题如果在今天对我们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应该是基于这么一种历史的原因吧！

问：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五四启蒙只是辛亥革命失败，政治改革受挫之后，思想改革被重新推上舞台的一个结果。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于一种软弱状态，无法提供一个足够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所以无论政治上抑思想上的改革运动都无法取得成功。五四启蒙的天折，是否也应该包括这一原因？

答：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社会的一切进步，归根结底是由经济的进步引起的。现代的中国，归根结底，也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科技引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达而造成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才能真正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人生观和宇宙观。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三次发展经济的良机，但可惜都错过了。民国初年是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由于袁世凯太落后，想当皇帝，结果失去了机会。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不打内战，而搞“国共合作”，发展民族经济，是可以成

为一次很好机会的，又错过了。第三次是建国后50年代初，又是一次经济大发展的良机，可惜也没把握住。不过，如果以为光靠经济的发展就会自动地更新一切，那也是幻想。意识形态和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坐等基础改变，而仍然需要自我革新。由于中国缺少西方资本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体制结构上，在文化心理结构上，都有着中世纪传统的巨大阴影。所以，我认为，当前主要反对的还应是封建主义。而五四启蒙的伟大现实意义也正在这里。

问：五四诚然是无法否定的。不过，否定观点主要在大陆之外。从近年来看，大陆上的主流是极力张扬五四启蒙的，不是有人主张彻底的反传统么？

答：这正是我开始提到的当前思想界对五四认识的另一种偏见。全面反传统的主张，这只能看作是青年人当中的一种情绪，对现状的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全面反传统的主张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目前西方“解释学”的研究，证明人类是不可能彻底抛弃传统的。在我看来，这种主张表面上看似乎很急进，实际上却是最保守的。从思想的角度说，这是缺乏知识，缺乏批判能力和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的表现。如果说五四反传统是悲剧性的，即它的片面性具有在当时的必要性，不得不表现为比较简单粗暴的话；那么，当代这种全面反传统主张则是闹剧性的。对中国传统的反对和批判，在今天应该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而不应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包括“文化大革命”，不是也“彻底与传统决裂”吗？！目前我们已基本赢得比较

长期的和平环境，国家的主权已经收回，救亡的主题已不再是主要与战争相联系，而是与国家的富强从而与现代化所需要的反封建启蒙相联系。启蒙与救亡的客观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在五四以及以后并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探讨，而是在救亡一革命的浪潮下，一古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简单地否定了。今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之下，除了重新提出它们之外，更要求对它们作具体的分析、细致的研究和理论的建设。对待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也应如此。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也是这样，它不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深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传统既是这么一种活的现实存在，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传统常常又是集好坏于一身，优点和缺点无法截然分割的。这就不是片面批判和笼统的否定所能解决，而首先要有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我认为，将集优劣于一身合强弱为一体的传统进行多方面的解剖，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这才是摆在我们思想界面前的无可回避的任务。我们还要在取得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设法改造我们的传统，使传统作某种能换性的创造。总而言之，绝不能让绕了一个圈子，过了70年，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和“解决”办法，这种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再演下去了。

1988年12月于广州

五四「民主」口号的梦幻感与

中国知识分子的虚弱性

张梦阳

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曰民主，一曰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

《新青年》针对当时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群众的愚昧、落后，提出民主与科学的战

斗口号，确实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史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十年前，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刚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脱的中国知识界，就曾又高扬起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不过，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五四时期提出的这两个口号，特别是“民主”的口号，我们发现，它在提出的时候，就是模糊不清，具有强烈梦幻感的。

什么是理想的民主政治？五四以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就提出过各种设想。

19世纪末叶，早期改良主义者开始介绍以英国为典范的西方议会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在短命的戊戌变法中，又主张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主要是向美国学习。他的政治理想，是仿照“欧美之法”，“创立合众政府”，“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而陈独秀等《新青年》的启蒙思想家则主要是向法国学习。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后来，他又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即资产阶级的共和立宪制。

但是，由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条件，并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资产阶级，正在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允许它的出现，所以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设想，只能是一种梦幻。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不仅对这种民主政体不感兴趣，而且早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抨击“立宪国会之说”：“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因为在大多数群众处于愚昧状态的情况下，实行所谓众治，只可能对先觉的个人进行压制，所以鲁迅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种“立人”、亦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他深刻批判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的虚弱性，以极为清醒、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疾呼他们从瞒和骗的梦幻中惊醒过来，改造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

“民主”的口号，不仅在五四时期是模糊不清、具有强烈梦幻感的，而且在以后的70年间，也始终没有搞清楚，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究竟该如何。

五四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然而，人们对民主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有时把民主当成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武器，有时把民主视为反帝反封建的必然结果。这样，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后，人们就自然认为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高度民主已经实现。但是，事实上却事与愿违，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不仅没有实现民主政治，而且随着一次又一

次政治运动的加剧，连起码的民主也丧失殆尽，将个人崇拜的家长制政治体制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由于极端的封建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的口号竟然叫得空前震响，前边还要冠以“大”字，称为“大民主”。难怪西方有些学者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四运动的再现。

应该怎样认识这一现象呢？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民主”是必须否定的，它恰恰验证了鲁迅1907年所说的话：“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是绝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狂热的状态下，对少数好人或较好的人实行“群众专政”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先例。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不就是死于民众治理（这是“民主”在古希腊的本来含义）的城邦中的吗？苏格拉底认为，人应当摆脱捆绑的绳索（就是社会的习俗），走出洞穴，到阳光下去看自然界的真实事物。因为自然界是超越神祇之上的，认识自然就会使人精神上得到解放，不怕神祇，而且真正懂得人生。但是，城邦里大多数人却囿于偏见，反倒指控苏格拉底犯了“不虔敬”罪，把这位圣哲送上了断头台。苏格拉底之死启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民主并不就一定合乎理性。

“大民主”的大梦幻比苏格拉底之死更为悲惨地破灭了。结果是：不仅“大民主”的施加对象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而且“大民主”的参与者和施行者也遭到了最可悲的愚弄和抛弃。这所谓的“大民主”，不过是阴谋集团用来蒙蔽群众、搞垮政敌的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而在这“大民主”梦幻的进行与破灭的历程中，充分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虚弱性。无庸讳言，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和“大民主”的崇奉者。那是多么天真、幼稚和愚昧、颟顸啊！狂热的梦幻感，缺乏最起码的实践理性。先是做着红太阳的梦幻，去演出誓死保卫的闹剧。然后做着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幻，去扮演横扫一切的“造反者”。他们对民主的渴求与投身运动的热情，不是也反衬出现实中民主的贫乏与专制的盛行吗？结果是一场空，有的上山下乡，失去深造的学习机会；有的学而无用，被当作改造对象。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存在了十年，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用“十年动乱”一句话简单予以否定，或者采取回避不提的态度，与当时那种简单肯定或胡乱颂扬的态度一样，同属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仅仅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与把一切功绩归于伟大领袖的做法一样，同属于历史唯心主义。中国有志的知识分子，有必要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多种学科的角度，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所谓的“大民主”进行一番科学的研究，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偶然性、不合理性，分析其全过程以及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心理变态，分析中华民族在这一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与民族性的梦幻感、精神病态，分析“文革十年”中民族梦幻破灭的历史原因与心理因素。等等，等等。无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及其“大民主”是一场绝不可重演的民族灾难。而只有正视它，研究它，

分析它，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才可能防止灾难的重新降临。

可惜，我们的研究实在太少了，甚至远远不及美国哈佛大学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课堂。这一点，也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的虚弱性。

三

自上而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同样自上而下地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民主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人民的民主意识随之空前地加强了。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民主建设步履维艰！

最明显的事实是：“官倒”的横行与腐败现象的蔓延。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实现高度的民主政治，甚至可以说，连最基本的民主监督也十分薄弱。因此，某些干部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具有“特殊化”的条件与环境，可以凭借权力去谋取金钱、房屋、出国考察、子女接班、亲戚沾光等等他和他的家庭、亲友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可以结成各种裙带关系，形成一些无孔不入的权力关系网。以至于我们不能正视：处于领导地位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确实滋生着一些官僚特权分子。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毛泽东同志临终前不久提出的一个骇人听闻的理论。这个显然有严重错误的理论，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甚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试卷中还有一道这样的题目。据说后来对如何确定这道题的标准答案犯了难，只得请示一位理论权威。

权威再三斟酌，更改数次，才在电话中确定了标准答案。无非是阶级的概念大于政党，不可能在党之内等等一类说法，与以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差不多，但始终没有看到能够彻底批评这一理论问题、较有份量的论文与著作。

当然，本文更加没有解释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可能性，只是想提出些微想法供有志研究者参考。第一、这一论断中概念的内涵是并不科学的。事实上，象西方那样典型的资产阶级，不仅共产党内不存在，即便是共产党外，也还不曾在中国出现，所以这简直是子虚乌有，人为臆想的。第二、这一论断中概念的外延也是不准确的。政党的外延比阶级小，所以一个阶级不可能在一个政党之内。但是不能否认，共产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异己的腐化分子，这种力量可以是某几个分散的个人，也可以是一些由利益结成的关系群。目前普遍存在的“官倒”现象，正是明证。这种力量与党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阶层之间的矛盾始终妨碍着历史的进程，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干扰，也是民主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因此，要顺利贯彻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就不能不认真解决党内腐败分子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今治党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大民主”的方式方法，是荒谬绝伦、事与愿违的；反之，采取视而不见、一味姑息的态度，则民心难服、不能容忍；而像五四运动思想领袖们早在70年前那样，主张在当代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立宪制与多党制，也显系痴人说

梦。唯一可行的道路是从严治党，加强民主监督，逐步完善和健全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当前已经实行的差额选举、举报中心等制度，应算是民主化进程中的切实步骤。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是漫长而缓慢的，必须脚踏在中国现实的硬地上作坚韧的努力。这努力的根本，则是鲁迅所提倡的“立人”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所谓“立人”，就是通过教育造就一代新人，一代新型的、不再那么虚弱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希望在于教育，在于新一代的精神界之战士。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成熟之时，当是高度民主在中国实现之日！

① 《本志罪恶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为了人的解放： 我对五四精神的理解

陈鸣树

“五四”运动已过70年，然而它留下的课题远没有完成。“五四”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以前，不论皇朝如何更替，人们的思想总是被禁锢在严整的封建主义的桎梏中，只有到了“五四”，从对立面的西方发现了一种新的迥异于东方封建传统的文化形态，人们的脑子才开了窍。可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五四”运动的前期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是不足为训的。但其实，“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辛亥革命在理论上提出而在实践上尚未完成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这些人类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意识到的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把它们统统划归资产阶级，是极不明智的；抛弃了人类文化某一阶段的精华，一些“左”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只是继承了封建的文化，以致长期漠视人的主题，无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

“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要赋予自然科学家的人生观，它的引申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对封建主义的先验论，对代圣人立言之类的封建说教当然也

是一种打击。而在“五四”旗帜上大书特书的“民主”则具有更普片更深远的意义，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对立命题。这个命题的解决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显得特别困难。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从理论上提到了“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可是，要完全付诸实践，还要花很大的气力。

近代中国最突出的政治课题是反帝、反清。在反帝、反清的掩盖下，思想领域中的反封建任务被降到了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的地位。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宣传虽然也注意到了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如说：“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制之压制。”（《论汉族不振之由》，《警钟日报》1904年8月29日）但是，他们的批判却极其无力，根本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值得痛惜的是，近百年来，即使“先进的中国人”，也避免不了在这个问题上犯严重的错误。洪秀全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出发，把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作为下民的最高理想，而他们的“天国”里仍因袭着封建帝王的一套。即

使龚自珍、魏源这样比较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维新思想，尽管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在当时的前面，但也不能完全摒弃封建正统的老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埋伏了日后复古主义的种子。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观念的攻击是猛烈的，但最后仍免不了幻想有个好皇帝来解民倒悬。严复是当时介绍西学贡献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却认为中国“民不足以自治”，解决的办法还是回到君臣之道。启蒙的最终归宿只能依靠“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它不但影响到辛亥革命不彻底，也制约着“五四”精神的进一步发扬。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方式的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可是，即使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自己对此也有所保留。他说过一句很容易被人利用的话：“中国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政治家们往往以为，只有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能实行有利于民的主张。这种主张或被称为整体利益，或被称为长远利益。于是，为了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便应该牺牲个人的当前利益。但是，当一个决策——例如“文化大革命”也标榜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时，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恐怕也只能体现当权的官吏的利益。不过，孙中山当时的出发点是，外国的专制比中国厉害，所以才要争个人自由；中国尚可学优而仕，专制不如欧洲，所以毋需强调民主自由。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认为“自由平等”对“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不必提倡，他们“一定不来附和”。（《民权主义》第二

讲）是的，束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习惯于家长制的统治，对争取民主十分冷漠，而这种冷漠，又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20世纪初，虽然鲁迅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改革政治，呼吁科学与民主，重视和发现人的个性，显示了“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可是，当时并不被人注意，“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的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瞿秋白语）嗣后的“五四”运动，最主要的应该是反对封建主义。如此，才能确立人本位的思想，张扬个性，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然而，反封建的任务又淡化在反帝救亡的旗帜下了。虽然当时的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先进得多，但是，因为我们把它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而取排拒的态度，觉得还是老祖宗的文化好，由此种下了封建主义几乎永远除不净的苦根。记忆犹新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错误的指令也能一呼万应，难道不是因为借助于权力的封建主义在肆虐吗？对民主的漠视，必然提倡愚民策政。“愚民的专制使人民变成死相”。死相当然便于统治。正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说的：广大人口所表现的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贪污成风的强大靠山，而且也是俄罗斯暴君的强大靠山。正因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都是以愚民政策为封建主义开路的，因此，启蒙的课题是近代中国乃至“五四”运动的重大课题。只有从愚蒙中摆脱出来，才能掌握民主。

然而，欲启蒙，首先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目前我国的文盲正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递增，有识之士对此无不痛心疾

首。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说：“中国再不抓教育，是要亡国的，一旦亡国，再也翻不过身来了。”（大意）为什么文盲会这么激增，为什么会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归根到底与政府塑造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关，与知识分子的待遇低有关。一级教授在30年前的月工资可以买400斤猪肉，现在却只能买到70斤。何况知识分子中很少一级教授。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给社会树立了一种无望的榜样。知识贬值必然使全民族文化素质大幅度下降。一个社会以哪一部分人为核心，标志着一个方向。而街头的书亭书摊便竞相以印有女郎封面的书刊为招徕之饵。文化素质的下降必然带来道德的堕落，维系社会群体的精神的瓦解，乃至犯罪的激增。所以，“五四”前夕，与鲁迅同其忧愤的陈独秀便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即着眼于此。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先驱者，以摧枯拉朽之势，激烈反对以封建主义为主潮的传统文化，提倡以民主主义为主潮的西方文化。它们是处于两个历史层次的文化形态，后者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而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只能“蹈故习常”，从封建文化那里去讨生活。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视为畏途，而津津乐道《资治通鉴》所提供的治人之术，只能使社会离现代化越来越远。还是“五四”的先驱者有气魄，有胆识，其言论至今令人心神俱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忽然想到》）当然，这都

是极而言之的文学语言，但精神是明白的，选择一种文化，只能以现实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生存、温饱、发展至今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命所系的大问题。抽象讨论传统文化好还是现代文化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是如何能使我们的民族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残余；真正确立人的本位，从而把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推向人类的共同高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学革命为其先声的，而文学革命的参照系以世界现代文化为背景。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才真正纳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鲁迅自述，他写作《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也明确揭示：“同人深信文艺之进步全赖有不囿于传统思想之创造的精神”“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这都是说的要借鉴外国的东西。我想，借鉴的目的首先是要改变中国旧有的思维方法。中国哲学重人生论而不重知识论，因此，中国旧有的思维方法偏重于内省、直观、顿悟。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偏于鉴赏，缺乏论证，不长于抽象和分类。内省、直觉、顿悟，看起来好象偏于主观，实际上缺乏“我”的自觉，不能放在物我之间的关系上激活主体意识。因此，只能以“我”之见揣度万物。而西方有了“我”之自觉，就分出了“我”（主观世界）和“非我”（客观世界）。要确立“我”之地位，必须了解“非我”，因此，研究“非我”的一套逻辑程序随之产生，促进了科学包括文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中国式的感情，大都从人生体验出发，并

加之带着传统文化积淀的感情因素心理因素，从而造成了思维的惰性，其表现形态便是“实体的直观”性而不是“反思的主观性”。（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因此，列维·布留尔把中国的传统思维列为本质上是综合的原逻辑思维范畴，认为它们“几乎永远是不分析的 和 不可分析的。”（《原始思维》）“五四”以前，如王国维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中国的思维方法不可与西方的近代思维方法同日而语，因而明确自己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存的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五四”本以一种开放、容受的精神面貌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胸怀，然而，它被纳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潮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后却与马列主义汲取全人类文化精英的精神相左。“五四”文学传统很快被纳入政治命题，文学的使命——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肯定被削弱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始终受到“左”的阴影的纠缠。当时《中国青年》的革命家们，已提出一百个文学家不如一个政治家的论调。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借从日本福本主义那里贩来的文艺理论来围剿鲁迅、茅盾这样的作家，实际上是一次向“左”的倾斜。抗战时期，在一切服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文艺明确地规定不但要为政治服务，而且要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只有政治家才有发言权。这是《中国青年》的革命家上述论调的重现和推进。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便成为依附于一定的政治的工具。这种工具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空前浩劫，证明政治路线也有极端错误的时候，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和

纠正。50年代，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文学也就一边倒向苏联，从而输入了极端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模式。60年代，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于是周扬同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中国化的宣言。然而，在与世界现代文化隔绝的状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也只能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编的《文学原理》，便只能从中国古代文论诗话中撷拾片言只语来装饰自己。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回到科学形态上，才能获得它的蓬勃生机。而要回到科学形态上，有两个命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文化的继承。二是人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人自身的解放，不能回避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肯定。而这两个命题，我认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发扬的“五四”精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五四文学及其流变的反思

邓国伟

一 五四文学的悲剧性内涵

由于历史的沉淀，人们对五四的认识已经深化。但中国文学要求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中间已经经历过艰难和曲折，事实上却还很难说五四的使命已经完成。今天，站在历史的新的起跑线上的人们将只把它作为又一次相似起点的有价值的参照。

五四文学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被“旗帜”化。应该说，五四的叛逆精神和变革方向无可怀疑，确实具有旗帜意义，然而感情上的歌颂或赞美不能替代对它作出深入的分析，为了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后人更需要从中获取历史的借鉴。“旗帜”心态把五四幻化成完美的境界。人们曾经不无夸张地认为，五四用短短的十年时光，匆匆走完了别的国家经历过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认为经过这样的十年，中国文学已升华到一个理想的现代的高度，并且越到后来越进向高级的形态。但历史并没有把便宜留给这样的人们。事实说明，五四文学运动还不能说是一次已经完成了的很完整的文学运动。

当我们注意到五四文学的光辉时，也要看到其悲剧性的意蕴。五四时代孕育了中国新一代的文学，同时也铸成了这一代

文学的坎坷命运。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有两种悲剧性的历史背景是不能忽略的，一是中国处于濒临“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中，二是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准极其低下。前一种背景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后一种则制约着文学高层次的追求。这是五四文学在降生时就内含着的无法排解的悲剧性矛盾。

五四文学在西方近现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催化下发生，直接借鉴了它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但是，滞留在封建形态里的中国社会还无法为这种现代化文学的发展预备充分的条件，相反地，制约的力量比发展的力量强大得多。结果，五四文学并不象其先驱者的理想那样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利器，倒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来自相反方向的制约和改造。群体救亡意识、政治功利意识和“大众化”低层次文学意识，都要求将文学改造成一种与整个文化大背景相协调的形态。在这个改造过程中，现代意识很强的五四文学也就逐渐地或者转化，或者萎缩，或者扭变，或者消亡。不能说这是历史的捉弄，但事实上只有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在社会再次向现代化建设迈出正常步伐的今天，人们才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觉悟。

当“新时期”文学发展起来之后，我们觉察到文学不只是表现为超前的渴望，还表现了回归的热忱。我们在充满了历史沧桑感的呼唤五四的声音中产生了一种历史的失落感和中断感，终于看清了五四文学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偏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这梦醒似的回归热忱是对“旗帜”心态的否定，回顾是含有悲剧情味的。

二 “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

五四文学运动过程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五四文学在理论形态、创作形态和独立品格等方面均未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不是苛求前人，而是正视不足。

文学的现代化，有赖于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文学独立的要求在五四时期是出现过的，但五四文学运动还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在历史上，“五四”是一个模糊概念，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文学运动和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前期主要表现为“思想革命”运动，后期主要表现为政治运动。文学变革的要求贯穿在这些运动之中，它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根源于同前期的思想革命和后期的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文学革命”最初不是由文学界的作家倡导的，而是由思想界的胡适和政治界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首举义旗的。这些在现代文学史上首开风气的人物，文学观念上仍然承袭着晚清改良主义者的意识，以文学为社会变革的“工具”。陈独秀在其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的文学。”当时热心支持这一革命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

传播思想的工具。”^①在这些倡导者的思想中，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轨道中。但文学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又确实发展了自身。文学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有一个共通之点，即启蒙借助文学以求“立人”，文学则在“立人”中获得了内在的营养，在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强化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得到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起来之后，便有了独立于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外的内在要求，因而同倡导者们的观念又发生矛盾。富于现代意识的五四文学强烈要求摆脱“文以载道”的古老传统。“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出现了，“为人生而艺术”按照周作人的解释也是：“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要预防“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②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要求得到自身的解放，这是五四文学的本质精神，但这一精神很快被随后而来的政治潮流所冲刷和否定。“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很快地转向，“为人生”派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中也有了新的解释，曾经要求独立的文学又重新找到了依附。五四文学毕竟已经苏醒，我们在20年代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身上看到了独立的精神，但坚持这种精神者便同政治功利要求产生了对立，随着政治力量的发展，终于铸成了他们后来被文学史家们称为“支流”、“末流”乃至“逆流”的受排击的命运。

在这次很快就“退潮”的五四运动中，文学的呐喊接连地产生轰动反应，而实际上它的理论建树非常薄弱。西方先进的文学思想不断“亮相”便“走过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大都有变革现状的峻急心态，急于介绍引进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只能一

鳞半爪，既缺乏系统也不能持久。影响极大的“易卜生主义”，也只有《新青年》4卷6期上出过一个“易卜生专号”，其中只有胡适一篇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章。事实上，许多理论介绍只能给文学变革提供策动力，而很难成为指导新文学建设的完备的理论。当他们借助外来的思潮对传统文学发起攻击时，同样只依赖峻急的情绪而缺乏科学研究的基础。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把《西游记》列入“迷信神鬼书类”，把《水浒传》列入“强盗书类”，一概加以排斥。胡适作《论短篇小说》（1918年）引进“短篇小说”（其实不限于短篇）概念时也表现了粗疏和臆断。他附会 short-story 的含义，把古典叙事诗和寓言作品统统称为“短篇小说”。这里并无嘲笑这些发难期文学理论的意思，但以这样急进的姿态和偏颇的理论去动摇传统文学的根基并建设现代化的新文学，能够取得怎样的功效，的确是值得深思的。

五四文学被誉为个性解放的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随感录”、郭沫若的《女神》等都表现过这样的文学特征。但整个五四时期，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在中国，如西方那样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难以在理论和作品中贯彻的。陈独秀极力排斥只写“个人之穷通利达”，“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的文学；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只提出“灵肉一致”的人格要求，只是为着实现合理地生存和发展的人生理想。当五四退潮而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时候，个性主义的文学已经表现为抒写个性压抑的苦闷。替代《女神》的是低沉的《星空》，新进的作家软弱地呼唤“爱的哲学”，郁达夫写出了表现自我病态心理的《沉沦》，鲁

迅也感到“救救孩子”的叫喊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与此同时，新的群体意识的文学在迅速滋长，它排斥作家的自我意识，渐而把个性化的文学排斥到次要的地位。

傅斯年早在白话文运动兴盛时就说过：“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胡里胡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③

三 文学流变：群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冲突

五四文化很难冲破“文以载道”传统的罗网。

鲁迅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可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④五四高潮过去之后，个性主义文学陷入了与群体意识长期的纠结中。专制政治以损害文学的个性去实现自己的专制个性。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个性化文学与功利主义文学不断冲突而个性化文学受到损害的历史。

为了阐述的方便，我们把五四文学的流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意识很强的文学，以“左联”文学为代表，其发展走向是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二是自觉地以个性意识对抗群体意识的文学，以“语丝派”文学为代表，其发展走向是30年代的“论语派”文学；三是与政治意识保持着一定距离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政治意识的影响或困扰的文学，这类型作家很多，大都与政治功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第一种类型的作家，他们为潮流所激，自觉地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原有的创作个性（被称为“小资产阶

级的尾巴”)被自我抑制,虽然作品中仍不能不有所流露(如丁玲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已失去直接表现的欲望,作家的主体意识大多极为淡薄。作家在表现民族心理、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本质时,时常以简单的政治判断替代深沉的思考,作品的描写很难同作家的心灵感受保持一致。“革命浪漫蒂克”的创作正因此而被当代读者所弃置。这类作家习惯于视一种固定的文学样式为“正统”,因而作品容易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套中。第二类型的作家可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例。他们在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中继续强调“自我”,但在30年代文化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保存“自我”不过是一句空话。“语丝”时代的林语堂敢于直面社会,敢想敢说,而“论语”时期,他只能躲在“幽默”的庙宇中去求取生存,由“黑头”改唱“丑角”(鲁迅语),其原有个性已被扭曲、变形。他的作品已不再是个性化的作品。30年代被称为“现代派”的作家群也有类似情形。茅盾说过,他们在激烈的斗争中“昏头昏脑”、“被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⑤结果却是逐渐消亡。第三类的作家在政治功利要求强化的时候大都产生苦闷感,但往往以牺牲个性意识去接纳群体意识。他们不断改变创作方向以至再三地修改已有定评的作品。后来,不少人甚至放弃了创作,而坚持创作的人则逐渐与第一类型作家合流,其作品也就失去了原有个性主义的鲜明特色。最近曹禺公开了黄永玉给他的信:“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

条小溪流。……”自己则感慨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⑥

由以上分析可以说明,现代意识的个性主义文学在与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从几个不同方向迷失以至于泯灭。其具体表现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减少,理性化的作品增多;表现自我意识的作品锐减,迎合群体心理的作品增多;坦诚而深邃的作品减少,浮浅而矫情的作品增多;多样化的文学减少,“公式化”的文学增多。

然而个性主义文学的失落也不能绝然归因于政治功利主义的干扰。追溯到五四文学,其文学主体性意识原就未有很好确立。在中国作家的传统意识中,个体存在的价值习惯上要看它与国家意志或群体意志联系的程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意识向来是被认可的。“文以载道”的传统训谕又使他们常常误文学为真可以担载起经邦济世重任的工具。加上祖国和民族多难时期,“救亡”任务当前,群体意识遂较个体意识更容易理解和接纳。因此,作家主观上也有追随时代潮流或政治潮流的愿望,由此,五四时期由西方传进的“个人主义”远远乏力于冲刷传统的“忧国忧民”并宁愿牺牲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政治功利、“群众观点”、以至新的奴性主义对文学的制约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的因素而轻易地取得效果的。这对文学发展的损益如何,是五四文学反思中一个有意义的论题。

四 形式高层次追求的失落

五四文学体现着中国文学欲与世界文学相沟通,以成为世界进步文学一部分的

时代要求。五四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它们的文学形式，这促进了文学多元化的发展，形成文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的局面。

但艺术形式的这种追求使新文学一方面拉大了同传统文学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同文化水准较低的广大文学接受者的距离。因而五四之后，关于文学形式的问题曾产生过激烈的论争，集中体现为以下二个冲突。

第一，形式高层次的追求与“大众化”的冲突。以诗歌为例，五四时期，许多诗人竞相学习外国诗，借鉴其技巧，形成流派，如新月派、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等等。到30年代，却出现了明显与之对立的“中国诗歌会”，主张大众化诗歌，并以大众化方向否定其他诗歌的方向。文学其他领域也一样，以大众化文学否定高层次文学，以俗文学否定雅文学，以宣传、鼓动性的非文学否定纯文学。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文学应考虑普及，通过普及使新文学占领更广大的地盘；另一种则认为只能够存在大众化的文学，其他文学追求均是错误的。30年代以后，这个否定五四文学多元化追求方向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瞿秋白那时不无偏颇地提倡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曲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认为“茶馆里，空场上……工房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①这是以革命功利要求取消文学的要求，已经超越了文学普及的范畴而明示文学要去迎合大众。毛泽东则明确提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②，尽管有阐述普

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前提，本质上也是对大多数高层次艺术追求的否定。

第二，通过横向借鉴来丰富发展现代文学与强调通过纵的因袭来发展大众化文学的冲突。五四文学勇于对世界进步文学兼容并蓄，多方“拿来”，其开放眼光、广博胸怀令人敬羨。这种打破传统文学的格局，勇于标新立异的行动，指示着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五四时期留下的精英作品，无一不是在这样的文化大气候中孕育而成的。五四之后，文学的发展逐渐失去了这样的开放姿态，又恢复依赖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自给自足”的闭锁状态。“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文学座标的纵轴上。40年代，赵树理富有个人特色的农民文学倾向被指示为新的文学方向。赵树理作为创作个体，是一位很本色的作家，他的创作成果理应受到尊重。但他的文学根基，主要来自纵的文化继承，在生活中他所乐于接受的是晋东南带有封建色彩的民间文艺。把这样的创作个体普泛化，明显地是五四追求的逆反，其结果是导致新文学小说向传统章回小说看齐，“现代诗”向民歌体转化，严肃的文学精神向取媚的娱乐的意趣转化。

五四文学形式高层次追求的失落，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学要真正实现它的现代化，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客观上整个民族文化层次的提高。原因之二是政治性群体意识的推助。政治之所以看重文艺是由于它的工具作用。在看待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政治功利所关注的是普及，而且是向政治力量所把握和依赖的对象普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向农民普及，而还不是向一般市民普及。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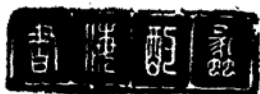
普及性发展文学宣传方面的作用，不单不需要外来的高层次文学，也不需要传统中高层次的文学，如屈原、李杜、《红楼梦》之类的文学。功利主义的文学大众化的要求本质上不是文学的要求，而是在艺术形式上对文学的政治性规范，与五四文学精神背道而驰。

70年之后，我们在“新时期”文学看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文学变革过程，五四文学的许多光辉命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尊重。正视五四文学及其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坚持五四的方向而又注意克服它的弱点，则可望新时期文学在实现我国文

学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 ①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 ②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
- ③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 ④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 ⑤ 茅盾：《夜读偶记》。
- ⑥ 见《曹禹的苦闷》，《羊城晚报》1989年1月27日第7版。
- ⑦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 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枢密院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

蛰 之

齐辛同志《枢密院始于晚唐》一文（刊《学术研究》1988年4期）依据《东观奏记》、《唐语林》等材料纠正了《辞海》的有关不根之说。文章很有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言《枢密院始于晚唐》似仍未为允当。

《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常识》（臧云甫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云，枢密院，原系内侍省，宦者为之，创于代宗时。但不详所据，故只能作为一种说法。又《石林燕语》卷四云：“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重，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中华书局1984年版叶梦得著，页五四）

由上述我们应看出，枢密院的创始连宋朝人（乃至史官）均不详所出。与《东观奏记》作者裴廷裕基本同时的蜀冯鉴所作《续事始》虽有记录，但原书已佚，已无法查考。而据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尚可略知一二。即枢密是内侍之机要，原即存在，至代宗永泰（按永泰只一年）时即置枢密使，但仍属大内之职事，而所谓枢密称院也当在彼时产生。

在政治生活中，权威不宜一概否定；但权威崇拜的极度发展则导致人们政治自主意识的弱化，诱发政治盲从和政治冷漠。封建王权政治结束之后，王权崇拜为“领袖崇拜”所替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思想障碍。

权威崇拜与政治参与意识

葛 荃

权威崇拜就广义而言是不可一概否定的。譬如，知识权威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政治权威在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权威崇拜的极端化将导致人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的泯灭，从而造就了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传统中国正是这样，王权主义养育出遍及全社会的权威崇拜心理，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普遍的非参与倾向。

对于社会下层和一般民众来说，国家大事自有“肉食者谋之”，他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一般只限于服从政府的法规政令，对于政治输出中关系到其个人利益，影响其实际物质生活的那一部分有一定的认识；至于政治输入、政治转换（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及政治输出中与其实际利益相对疏远的内容则无所知觉，正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

者”。（《孟子·尽心上》）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和为贵，忍为高，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他们最惧怕战乱，“宁作太平人，不为乱世人”，因而他们最大的政治期盼是世事太平，风调雨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们将实现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在各级权威身上，他们的利益表达需由权威来代表。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对“清官”的尊崇和向往。

构成“清官”的基本标准是为官清正，执法公允；搏击豪强，惩治贪官；爱护百姓，为民请命等等。当细民百姓在统治者竭泽而渔的压榨之下，难以维持生存的时候，他们就盼望出现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老爷”为之作主。清官们则毅然担起为民请命，主持正义的重任，向君主直言进谏，把民众的利益要求反馈到决策中

枢，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调节政策，缓和社会冲突的作用。清官是民众认可的政治权威和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扮演的政治角色旨在协调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行，是君主政治内在调节机制的体现。纵览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崇拜清官，盼望清官，清官的形象通过话本、小说、曲艺、戏曲等艺术形式日渐充实完美，清官的故事流为口碑，广泛流传，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对清官越是向往和依赖，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就越发萎缩，其权威人格也就愈益牢固，最终作了君主政治的驯服良民。

另外，我们又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上层成员和士人，经由征辟察举、捐资、科举等途径进入政权系统，直接参与政治运行的全过程，成为当政集团中的一员，亦即王权之下权威系统中的成员。这些人是否具有某种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参与政治活动并不等于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处于王权主义的束缚之下，同样受着宗法观念和儒家关于人本质认识的制约，也具有强烈的权威崇拜心理。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以财谋官的有产者和以道谋官的儒生，他们参与政治的真实目的是求田问舍，谋取利益，依赖王权的庇护分享社会财富。因之，他们的政治期盼是尽力得到君主的信任，谋取高官厚禄。崇拜和依附王权是他们赖以立足的根本原则。这些人参与政治的行为并不内涵着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不过是充当了君主政治机器中的传动链条或螺丝钉而已。

还有一部分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士，对

于政治运行的全过程抱有某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政治主动性。他们即使没有加入政权系统，也会裁量执政，针贬时弊，“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儒效》）“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一旦进入当政集团，他们就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依据某些原则积极干预政策的制定。所谓“清官”、“循吏”大多出于其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崇拜权威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的同僚，而且，他们崇拜的权威除了君主，还有圣人和道，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谓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是道德楷模和君主的典范，道则内涵着儒家的政治原则及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这些人的政治期盼是践行儒家的理想政治，奉行的行为准则是“从道不从君”。因而，他们的思虑言行无不严格遵循圣人的训戒和道的规范，具有典型的“传统导向”特征。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他们必须作出某种积极选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他们的选择不过是代圣人“立德、立言、立功”，其中并不内涵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因而也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参与意识。

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即使民主政治的社会也不能完全排除权威人格的存在。但是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权威人格的普遍存在无疑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极大障碍。权威崇拜的极度发展会导出两种极端倾向。其一，人们极度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形成普遍的政治冷漠心态。人们认识不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自己应当成为自身命运的

主宰。他们或是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只注意那些与其切身利益和物质生活相关的问题；或是虽有某些不满，却不知是否应当表达和如何表达。在他们的意识中，似乎只有权威才有权利和资格参与政治。结果，政治被极少数人垄断，在一定条件下则给个人和专制独裁提供了方便。其二，权威崇拜的极度发展容易诱发政治盲从行为。人们绝对信赖权威，狂热地尊崇权威，使权威的政治号召力无限增大，形成全社会对权威意志的盲目追随。追随者们从不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进行自我认识和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典型者如10年“文革”的群众运动，就是在普遍的极端权威崇拜心理基础上展开的。民众政治行为的盲目性越大，对社会

内在稳定性的危害越强，越发加剧政治运行的非程序性和非规范性。显而易见，这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并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

君主政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基于王权主义而形成的极端权威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对于我们的政治心态仍有相当的影响，阻碍着我们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如果说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而促成民主政治需要多方面条件，那么，清除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威崇拜心理，唤醒人们的政治自主意识和对自身政治行为的自觉关注，显然是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陈占标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葛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

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附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然而，最近发现一份清末出版报纸登载一则“广告”，说明《新学伪经考》一书，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已经刊行了。现将“广告”原文录下：

《新书发售》，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新学伪经考，在本堂发售。此书考得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传尔雅说文皆是伪书。初印白纸精本，收回纸墨工价银二两正。 粤城双门底藏珍堂谨白。
（见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广州《广报》）

这则“告白”是比新闻消息之类较为可信。因为新闻消息会有误传、伪作，而商人卖广告是不会说谎而自毁信誉的。

又查《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六年条”载：“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这也说明《新学伪经考》在1890年已经写成了。

据此，我认为：1891年秋万木草堂刊行的《新学伪经考》不是“初刊”，最初刊刻成书并且发售的应为1890年（光绪十六年）。

俞可平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

基本格局：社会主义政治主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亚文化的复合并存。

主要特征：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在政治文化上的基本一致性，各职业阶层之间政治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性，从非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上的过渡性。

(一)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已经在我国逐步形成，并且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这就是我国现存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

三种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共存于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

从历史原因看，我国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政治历史的国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封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国的土壤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与这种政治实际相适应，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土地上滋生，中国的传统封建政治文化第一次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未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虽逐渐打开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口，却并未压倒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更没有使传统政治文化消失，而是形成了以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为政治主文化，以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政治亚文化，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并存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开始取代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具有特别巨大的相对独立性。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建立了，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基本消失了，而旧的政治文化却并未随之而立即消失，新的政治文化也并未立即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立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消失必然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便势必共同存在。

从现实原因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但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还不完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于我国的实际生活之中，旧的习惯势力远远没有得到根除，现实中存在的这些旧的政治

和经济因素必然会滋生和维持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此外，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一部分人难免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而在这些人身上逐渐融入一些西方的政治文化因素。

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目前的主要意识形态。与此相一致，在同时并存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中，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据主要地位，对我国的政治生活起着主导性的影响，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也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但比起前者来，它们的影响是次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体系，政府当局必然采取一切措施强化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并且把拥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公民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人们的政治行为。

(二)

任何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性的，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阶级或阶层，往往都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政治文化的混合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它们具体是怎样混合的，却因国家的不同而极其不同。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有这样三个显著的特征：从纵向看，当代中国的领导阶层的政治文化与群众阶层的政治文化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从横向看，中国各职业阶层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过程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人们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先天地形成的，而是每个人不同生活经验的产物，是每个人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直接结果。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们，由于他们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不同，他们往往具有各不相同的政治文化。一般地说，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和被领导阶层往往具有各不相同的政治文化，领导阶层和群众阶层的政治文化在有些社会中是截然不同的，统治阶层和群众阶层的政治文化在有些社会中则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我国，领导阶层的政治文化与群众阶层的政治文化虽有所区别，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我国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具有共同的现实政治目标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共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评价标准。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所具有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在强弱程度上也基本一致；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对国家、政府、共产党和现行政治制度、政策、法令都具有极其类似的政治认同倾向、政治信任感和政治支持感；在政治宽容性和政治责任心方面，他们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然，由于领导阶层和群众阶层所处的具体岗位不同，经历不同，他们的政治文化也必然有所不同，例如领导阶层的政治热情就普遍比群众阶层的政治热情要多一些，对政策的敏感程度也比群众要高一些。但是，这些区别是程度的区别，而不是实质性的区别。

造成我国领导阶层的政治文化与群众阶层的政治文化基本一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在我国同属于一个阶级，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使它们必然具有在根本上相一致的政治取向。首先，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领导阶层并不是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的阶层。政治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要受制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我国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在社会中处于根本上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事实，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立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其次，在我国，领导者基本上来自群众，是从群众当中选拔的。因此，与中国封建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阶层不同，我国的领导阶层并未经过与众不同的单独政治社会化过程，领导与群众往往有着共同的经历，经受了共同的基本政治社会化过程，从而有助于形成一致的社会政治文化。最后，在我国经常实行一些由上及下的强制性的、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措施，如伴随政治运动而来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这些铺天盖地的政治社会化运动往往席卷着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心灵，无论他是干部还是群众。结果既改造了干部的意识也改造了群众的意识，使领导与群众在某

些重大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倾向。

在一般社会中，政治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主要是纵向地发生的，但在我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却主要发生在横向上，即发生在不同职业阶层的政治亚文化之间。具体地说，就是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城镇工人阶层和农村农民阶层在政治取向模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可以说，这三个阶层分别构成了我国现存的三个政治文化群。

我国这三个基本劳动阶层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这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说，城镇工人阶层的封建政治思想比农民阶层的封建政治思想轻得多，而他们受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程度则比知识分子阶层要小得多；工人阶层的集体意识、政治责任心和政治宽容性，政治热情特别高；他们的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服从意识、政治认同感都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农民阶层所接受的封建政治文化特别严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小；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支持感比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都要强烈；相对说来，他们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权利意识、反抗意识最为薄弱；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宗派意识却最为强烈；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最为不足。比较而言，西方政治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最为严重；他们尤其看重民主、自由的价值；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权利意识和反抗意识最为强烈，但政治宽容性、政治信任感、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支持感最为不足；他们的集体意识和宗派意识也最为薄弱。

应当指出，我国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拥有一个独立的政治文化系统，这种差异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既主导着工人阶层的政治取向，也同样主导着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取向。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别主要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教育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城市工人和农民接受的教育程度比知识分子低，他们对政治民主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因而他们的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就较知识分子低，而知识分子由于对民主自由之价值有较高的认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就相对强烈。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较多，农民和工人既缺乏接触机会又缺乏接受能力，因而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就特别强烈。农民地处农村，而我国农村既是封建政治文化最深厚的基础，交通通讯又诸多不便，同样的现代政治社会化过程在农村就比在城市要慢得多。因此，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对农民的影响就尤其深刻。此外，知识分子家庭、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不同家庭成员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也不同，其政治取向模式从而也就有所不同。

最后，从发展过程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处于急速的转变之中，不断地从传统的政治文化转向现代的政治文化，不断地从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这种转变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中老年公民原来拥有的旧政治文化日趋衰弱，而年轻公民所拥有的新政治文化则日趋巩固。造成这种发展的基本原因是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地位的改善和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的实施。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推行，不仅使出生在新中国的年轻公民受到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的洗礼，从而使其形成新型的政治文化，而且也迫使出生在旧中国的中老年公民在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逐步消除其身上的旧政治文化因素，而融合进新型的政治文化因素。

(三)

社会的政治过程归根到底是人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人的政治行为直接受其政治文化的制约。封建的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我国严重地存在着，是必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违背的。我们认为，消除封建的政治文化的糟粕，扬弃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消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中的腐朽成分，吸取其合理因素；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克服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当然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根除这些弊端的内部主观条件主要是用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去武装人们。 (转第116页)

国内资金缺口与资金潜力并存，关键在于
如何挖掘资金潜力。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对策：

产业结构调整在国内资金来源*

厉以宁

从我国经济目前所处的非均衡状态来看，尽管资金缺口的存在是十分明显的，但与此同时，国内资金潜力也不可忽视。资金缺口与资金潜力的并存，是目前我国资金问题的特点之一。

资金潜力是指潜藏在经济内部的、有可能被发掘出来而至今尚未被发掘出来的资金，这些潜在的资金或者表现为闲置的货币，或者以非货币资源的形式存在着。具体地说，它们有以下五种形式：

第一，最常见的是居民手头保留的现金。这是居民的消费意愿未能实现和国内缺乏除现金、银行存款、债券等少数资产形式以外的其它多种资产形式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居民所需要的消费品供给不足和居民个人投资机会的不足导致了资金潜力的存在。

第二，个体户、私营户手头保留的现金。这些未被继续投入生产领域的资金有可能转入消费领域，成为挥霍性的、炫耀性的消费支出，但也有可能被个体户、私

营户保留在手中，暂时不作安排，待机而动用。

第三，企业的超正常现金和物资储备。这是指：企业保留了超出正常需要的备用现金，以及企业购买了超出正常储备额的原材料、燃料、零部件等等。无论是企业超正常的现金储备还是物资储备，都是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从而都加剧了社会的资金供给不足，假定能让企业把现金和物资储备保持在正常水平，那就等于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了资金的供给。除企业而外，个体户、私营户也有类似的超正常储备情况。居民储存过量的消费品（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供给中断和防止物价上升），同样意味着资金的不合理使用。

第四，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偏低。在资金供给总量为既定的条件下，资金利用效率的偏低和资金周转速度的缓慢都表明资金潜力的存在，表明只要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把利用效率偏低的资金转投资于资金利用效率较高的领域，以及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就可以缓解资金的缺口，缩小资金

供求的矛盾。

第五，潜在的资金还可能以非货币的形式存在着。例如，劳动力的闲置或生产设备的闲置，就意味着非货币形式的资金潜力的存在。

以上五个方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我国的经济非均衡条件下，虽然我们要注意到资金的缺口的存在，但也不要忽略国内的资金供给仍然具有潜力。无论是经济的增长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如果我们只看到资金的缺口而看不到资金的潜力，那么就可能会对国内的资金供求形势作出偏于悲观的估计。

二

既然国内存在着潜在的资金，那就应当动员它们。怎样才能发掘国内的资金潜力？可以根据上述五种不同的情况设计具体的措施。简要地说，可供选择的措施如下：

第一，为了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和尽量减少他们手头保留的现金数额，应当增加居民个人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应利用股票集资的方式把它们动员出来。

第二，为了扩大个体户、私营户的再投资的积极性，使他们手头少保留现金，或者使他们把本来准备用于挥霍性的、炫耀性的消费支出转用于生产资金，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使个体户、私营户对投资前景和财产权有信心。

第三，为了使企业不再保留超正常的现金储备和物资储备，使企业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资金，应当设法消除企业关于供给中断和价格继续上涨的顾虑。为此，应当

采取措施增加原材料、燃料、零部件的供给，并发展期货贸易，减少价格上涨对于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扰。这样就等于减少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第四，为了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以及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节约社会对资金的使用，应当合理调整资金的使用方向，调整投资结构，把利用效率偏低的资金转投于利用效率较高的生产领域。同时，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如改进技术，缩短产品生产周期；组织均衡生产；加速制成品的发送和运输；及时收回销货款等等。

第五，为了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增加收入和增加储蓄，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便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些都有利于把潜在的非货币形式的资金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形式的资金。

由此可见，只要措施得当，潜在的资金是可以被发掘出来的。可以把以上提到的五个方面应当采取的措施概括为以下两点，这就是：一方面要推进经济改革，靠经济改革把资金潜力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依靠各个有关的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措施，既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又减少对资金的不合理使用。

这里所说的经济改革，范围是广泛的。在金融改革方面，应当把重点放在容许多种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银行自身的企业化之上。多种金融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广泛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增加储蓄并使之转化为投资。银行自身的企业化，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减少不合理的

资金投入，而且可以调动银行的积极性，促进银行对社会闲置资金的吸收和利用。此外，金融改革的进展将加速资金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化，在资金市场发展与完善化的基础上，利息率将逐步放开，以适应资金市场的供求变化。

在企业体制改革方面，对挖掘资金潜力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并使其中适宜于股份化的企业实现股份化。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有利于企业节约资金的使用和避免不合理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股份制的推广，不仅可以通过股票形式吸收社会闲置资金，把它们用于生产，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的合并、联营，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把社会资金导向对发展经济有利的生产领域。这些对于挖掘资金潜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同样有助于挖掘资金潜力。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过去单纯依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造为主要依靠居民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由居民储蓄、企业缴纳、国家津贴三者合一而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这一改革而建立的养老金基金会、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基金会等等，将拥有大量资金，它们可以被使用于社会需要的领域，以缓和社会资金供给的不足。

投资体制的改革在动员社会闲置资金和有效地利用资金方面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应当做到这样一点，即建立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基金制，根据资金状况安排投资，国家财政提供的资金在基金中起到酵母作用，依靠它们作为社会集资的利

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金；同时，政府机构不再过问具体的经营性投资项目，经营性投资项目由企业化的投资公司管理，这些投资公司既是投资者，又是未来的经营者，在项目建成以后，投资公司可以有偿转让它们，或租赁出去，或承包出去，也可以增发股票，吸引社会资金，使之成为一个子公司。这些措施将有力地促进投资资金的合理利用和回收。

以上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就是当前我国在资金供给不足条件下解决资金供求矛盾的基本途径。

下面，再就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方面的措施，对发掘资金潜力问题进行一些论述。

三

如果市场不完善而企业又缺乏活力，那么结构调整（不仅是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包括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肯定是困难的，要想通过结构调整来挖掘资金潜力的意图也难免落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经济改革，用经济改革来促进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发掘资金潜力的基本途径。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分析。

毫无疑问，如果经济改革进展顺利，金融体制、企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投资体制等等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市场也将随之而逐渐趋向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速，通过结构调整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格局也会出现。问题是：如果经济改革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实质性的变化尚未发生，市场仍然是不完善

的，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进行较重要的结构调整呢？通过结构调整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愿望是不是就毫无实现之可能呢？情况未必如此。我们不能等待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再来进行结构调整，如果那样做，就会丧失时间。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等待条件成熟之后再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否则资金供给的紧张将一直困扰着我们。正确的对策应当是：把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在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并进的过程中挖掘国内资金潜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缓和资金供求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结构调整的一个可行的措施是政府采取数量调节，主要是以信贷数量调节和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为主的数量调节，以便增加资金的供给和减少对资金的不合理使用。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数量调节是促进结构调整的最佳选择，但至少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信贷数量调节主要是指政府根据自己的目标，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前提下改变信贷的数量结构，使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发生变化。通过这种信贷数量结构的调整，经济效益差、资金利用效率低的企业和部门将得不到信贷的支持，资金将投入经济效益高、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和部门。同时，信贷数量结构的调整还将使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得到调整，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及促进技术结构与国民经济的协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政府预定的结构调整意图逐步实现。尽管信贷数量调节并不触及企业或银行体制方面的实

质性问题，但在经济改革继续进行的过程中，在投资的利息弹性较小，资金市场上供给缺口较大，从而不可能迅速实现利率自由浮动的条件下，信贷数量调节仍然是有效的、可行的。

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可以按照目标原则来确定。这是指：为了促进那些有利于缓和供给缺口的部门的增长，为了更好地利用闲置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及为了限制资金利用效率低的企业的发展，政府可以按一定的配额来分配稀缺的生产资料（如电力、有色金属、某些化工原料等）。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不仅对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作用，而且也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加速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尽管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并不触及经济体制方面的实质性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企业间的竞争发生消极的影响，但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看来这种做法在缓和资金供给不足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要知道，数量调节手段（包括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在供求矛盾较大时，其作用要胜过价格调节手段，这一点正是非均衡经济的特征之一。何况，现在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发掘资金潜力和增加国内的资金来源，为此就必须压缩某些资金利用效率低的企业和部门的投资，使另一些资金利用效率较高的企业和部门能有较大的发展。在通过结构调整而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数量调节也可以发挥比价格调节更显著的作用。数量调节所带来的某些消极后果（如挫伤一些企业的积极性，使某些企业和部门因此而陷于困难地位等等），只能被看成是为了调

整结构和缓和资金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只要利大于弊，就是可行的。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信贷数量调节还是稀缺生产资料的配额调节，既然都可能带来弊端，那么就有必要尽量地减少这些弊端。政府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做法有：

1. 较科学地制定结构调整目标和结构调整方案，使信贷数量调节和稀缺生产资料配额调节有较充足的依据，减少盲目性。

2. 在结构调整目标和结构调整方案制定以后，信贷数量调节和稀缺生产资料配额调节的执行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实行，禁止在数量调节的名义下以权谋私。

3. 二元信贷制度和某些生产资料的二元分配制度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量调节带来的弊端。二元信贷制度是指：除了采取信贷数量调节而外，还容许市场的信贷业务的存在，后者的存款和贷款利率随行就市，政府可以只规定最高利率作为上浮的界限。在二元信贷制度之下，政府应严禁通过信贷数量调节而贷给企业的资金转流入市场借贷业务之中，否则将会滋生各种新的弊端。某些生产资料的二元分配制度是指：除了少数极其稀缺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完全由政府实行配额调节而外，有些稀缺程度不等的生产资料，可以一部分实行配额调节，另一部分则通过生产资料市场进行公开议价交易，其价格随行就市，政府可以规定最高限价，也可以不作这种规定。至于配额调节所占的比例大小，则因该种生产资料的稀缺程度而定。

四

经济增长需要追加的资金投入，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追加的资金投入，在国内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一定量的追加资金投入，用于经济增长的比例大了，可以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比例就小一些，这种追加资金分配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如果能够在资金供给不足的同时尽可能挖掘国内资金潜力，资金供给紧张的问题可以有所缓和，但被动员出来的资金同样会遇到如何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样，仍然会面临这一方面的追加资金投入偏多，则另一方面的追加资金投入偏少的选择。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是不能偏废的，我们不可能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产业结构调整，那么在现有产业结构之下的经济增长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会发生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并存的问题，从而经济增长率将下降，结构性失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反之，如果只顾调整产业结构，而忽视经济增长，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可能是顺利的。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将导致一部分生产要素的闲置，导致企业收入、居民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这样就会阻碍产业结构按照政府的预定目标进行调整。

因此，可供选择的做法将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兼顾，力争做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并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地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是

指：基本上维持与过去相近的经济增长率，增加新产业部门的产出，减少传统产业部门的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例（传统产业部门的产出的绝对值可能不变，也可能有所增加或有所下降）。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指：在传统产业部门的产出在总产出的比例逐渐降低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将主要依靠新产业部门的产出绝对值的增加及其在总产出中的比例的上升来支持。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兼顾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涉及一定资金在部门间的再分配，以及涉及社会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引导等问题。

这里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动员国内资金之间的关系。假定政府采用的是自愿储蓄方式来动员国内资金，比如说，政府用利息率的调整和投资税收的优惠等方式来促使人们把收入的较多部分转为储蓄和投资，那么被发掘出来的国内资金究竟如何在新产业部门 and 传统产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差别利息率和差别投资税收优惠来实现。在制定这些差别的利息率和投资税收优惠时，政府可以根据产业结构的现状和目标模式，以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过去已经达到的水平来统筹安排。总之，以自愿储蓄的方式来动员国内资金，并妥善地在部门之间进行分配，阻力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阻力的话，那么阻力既来自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储蓄观念（即人们是否受利息率和投资税收优惠的吸引，改变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提高储蓄率，增强投资意愿），也来自金融部门的融资能力（即金融部门有

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合理地把社会闲置资金挖掘出来，并把它们主要用于支持新产业部门的发展上）。

假定政府采取的是强迫储蓄方式来动员国内资金，比如说，政府用类似摊派性质的政府债券推销方式，提高直接税和间接税税率的方式，提高某些消费品价格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定额的方式等等来挖掘国内资金的潜力，以便把筹集到的追加资金用于发展新产业部门，那么将会发生这样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政府可以较快地集中一定数额的货币于手中，然后按照自己预定的目标，分配这些资金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部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资金集中方式是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强制性的变更，以及对企业经济活动和企业收入分配方式的强制性的干预，因此它可能挫伤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影响经济增长率，它也可能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干扰，对经济增长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动员国内资金的过程中，政府不是绝对不可以采取强迫储蓄以集中资金的做法，而是说这种做法必须适度，否则就难以兼顾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这两个方面。

应当认识到，无论是自愿储蓄还是强迫储蓄，只要有利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它们都是可行的。作为经济调节者，政府有必要根据每个时期的特定条件，使自愿储蓄与强迫储蓄两种方式配合使用，自愿储蓄在进一步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方面是有较大作用的。而强迫储蓄只要运用得当，比例适度，就能够较快地使政府集中

（转第43页）

世界经济宏观新格局——三个经济圈
形成之后，中国怎么办？

“大中国经济圈”的构想，理论上不无
基础，现实中最大的困难是，大陆、台、港、
澳的全体中国人如何丢掉历史的政治包袱，
重建共识，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

“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与 中国的对外经济

何小锋

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有一个重大变动，这就是一股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在形成，其主要表现为三个“经济圈”的崛起：一个是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一个是西欧以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为主；另一个在亚洲，包括日本、“四小龙”和马来西亚、泰国等。也有人称这三个经济圈为“三大经济强权”，它们将共同扮演推动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在这种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有哪些因应策略？这是值得中国经济界人士研究的问题。

“美加自由贸易协议”

1988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同加拿大总理麦尤里签定了“美加自由贸易协议”草

案，双方现正提交各自国会审议通过（其中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以使该协议在1989年1月生效。该协议内容包括对关税、农产品、能源、金融、投资、服务业文化产业，纷争解决的办法等等规定，范围相当广泛。简而言之，就是撤除商品及服务业贸易的障碍，相互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投资自由化，共同设置解决纷争的处理机构。按计划将在1999年建成一个北美洲的经济体系。

实现这个协议，美加可获得巨大的贸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机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7年两国之间商品贸易额约为1355.6亿美元，远高于美日双边贸易1122.7亿美元，及美与西德双边贸易额385.7亿美元，居世界两国间的双边贸易

额之冠。目前，加拿大政府从来自美国的货物中抽取10%的关税，美国则对加拿大的进口货课以5%的关税。消除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将刺激两国贸易额的增长，据估计，在协议生效五年内，双方的贸易额可望增加250亿美元。美国将从增加投资机会、稳定物资来源和扩大对加出口方面获得可观的好处；而加拿大预计在1993年内因此新增12万个就业机会，促使工业生产总值增长11%和实际国民收入增长2.5%。

这个协议肯定会对中国对外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是中国对美加的进出口贸易将受到更强的竞争和限制，目前这一市场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0%强，贸易额约为84亿美元；其次是对中国利用外资有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1986年中国实际从美加引进外资4.24亿美元，约占当年利用外资总数的6%，是除港澳与日本之外第三大的、且增长最快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各国发展双边贸易的联合化趋势，起到重要的刺激作用。日本、台湾都发出了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呼声。

在这种趋势下，一方面双边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得到加强，但对第三者则加强了保护性，特别是对经济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其不利影响则更大些，因为它们还不具备与他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条件。看来在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区域化趋势已成为保护本国市场，扩大商品、劳务出口的一种手段。

“欧洲统一市场计划”

1985年，欧洲共同市场（EEC）委

员会提出了“1992年成立欧洲统一市场计划”，两年多来得到了EEC会员国的热烈回响。由于提出的时机恰当、内容具体、目标明确，促成了“1992年计划”的初步成功。1988年底成员国将对该计划展开第二阶段的讨论。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1989年底之前，EEC各成员国将统一发EEC护照，国名列于EEC名称之下，撤除互相间的海关；（2）缩减成员国的税率差异，摒弃出口零税率的规定，将出口品视为内销品课征增值税；（3）会员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允许金融服务业跨国销售，容许金融机构跨国设立；（4）各会员国开放政府采购，不用其保护国内产业；（5）统一产品规格，使商品流通更自由；（6）开放EEC国家内公路运输市场。虽然该计划未涉及EEC的对外贸易政策问题，但已引起美日对EEC对外高筑保护壁垒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已就此事对EEC提出警告，日本的商界和产业界正积极在EEC设立据点，并在当地彻底进行“本土化”，以应1992年的来临。该计划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指出，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却还没有人说得清的问题，但其影响肯定是很大的。（1988年9月3日版，P.50）

对中国来说，与欧洲共同体的贸易额占总额的13.4%（1987年），来自欧洲共同体的外资额占总额约8.9%（1986年），这一大市场和来源地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该计划的冲击。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987年)	其 中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1986年)	其 中	
		出口额	进口额		对外借款	直接投资及其他
总 计	827	305	432	72.58	50.15	22.44
美国, 加拿大	84.1	33.6	50.5	4.24	0.96	3.29
占总计%	10.2	8.5	11.7	5.8	1.9	14.7
欧洲共同体	110.7	38.2	72.5	6.49	4.98	1.51
占总计%	13.4	9.7	16.8	8.94	9.93	6.72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87>, <中国统计月报>1988.9

“亚洲经济圈”

相对于美加共同市场和欧洲共同体统一市场而言, 被称为“第三经济强权”的亚洲经济圈则显得困难重重和进展缓慢。先是有人提出这个经济圈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中心, 继后又有人把中国大陆和东盟四个成员国也包括了进去。

夏威夷“东西中心”主任李浩博士最近撰文说, 1960年北美的生产占全球总产值的1/3强, 如今已降至1/5; 东亚和东南亚在同一时期, 比重却从10%跃升至20%; 东亚和东南亚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经济持续增长纪录, 已有多年增长超过10%。但亚太地区在发展中也有着一些危机: 全世界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并存; 人口日益拥挤、农村普遍贫困;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将会引起“骚乱”; 地区冲突(如南北朝鲜、台湾与大陆)未消弭, 但已大为缓和。(《世界箴言月刊》, 1988年9月)

在这样的条件下试图建立亚洲经济圈, 则显得比前两个经济圈困难得多, 但

其潜力和前景也更吸引人。最主要的问题有:

第一, 在这个仍处于幻想阶段的“经济圈”中, 各国的态度显然很不一致。

日本仗着强大的经济优势, 有意主导亚太地区经济, 在东亚“雁行式”发展模式充当“头雁”角色, 形成与北美和EEC为三足鼎立的态势, 因而日本对建立亚洲经济圈最为积极。8年前, 日本就提出了“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设想。1988年5月, 日本当局又在一份“亚太地区的合作展望与全面策略”的政策报告中提出, 日本应当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分享科技资讯, 协调经贸政策, 并建立“亚洲自由贸易模范地区”。最近, 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日元经济圈”的概念。这种主张在东盟一些国家得到响应,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表示, 亚洲国家应以日本为主设立一个“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台湾《远见》, 1988年10月号)

两个超级大国对这个经济圈有着不同的动机。苏联想借此开放其面向太平洋的地区, 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美国则力图

说明其经济主导地位并未下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军事力量不可能被日本等国所取代，所以也不想放弃在亚太区的经济地位。

台湾当局则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和互惠影响，突破国际孤立地位，借机重返国际舞台，特别是想染指“关贸总协定（GATT）和太平洋经合会议（PECC）”。亦有人提出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中国在这个模式中占据什么地位？这是一个关键和敏感的难题。如果这个亚洲经济圈不包括中国，则显然忽视了这一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是回避不了的。而且由于1997年以后香港回归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将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如果把中国包括进这个模式中，则在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多国两制”、经济差距大等各种复杂因素，其协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起码在本世纪内，恐怕难以实现这个模式。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更为可行并有利的模式，是建立目前在海外颇有呼声的“中国经济圈”。

“大中华经济强权”

面对世界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中国怎么办？目前到本世纪末显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中国10年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正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已在亚太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改革、开放的更进一步发展，也为形成“中国经济共同体”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经济圈的设想最早由香港、台湾

的学者提出，目前已受到国际上的关注。最近美国《商业周刊》载文认为，通过商人逐利的本性，自然会结合台湾的资金与经济力量、香港的金融服务与交通设施、大陆的科技、原料及廉价劳工，组成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大中华经济强权”。（《商业周刊》，1988年10月10日）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海峡两岸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中国人，如何丢掉历史和思想上的包袱，积极组织公开的谈判和默契的配合。显然，改变观念、重建“共识”是一个首要问题。诚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台湾“天下”、“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先生所言：“面对这种区域性经济结盟的兴起与蔓延，面对世界市场这样的瓜分与保护，分布在亚洲国家与地区的10亿多华人如何自处？仍然坚持政治体制的不同，个别发展，受制于美、日等国？或者‘让政治归政治’，设法形成经济合作，凝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华人力量，为中华民族争世界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中国政治家们，还有什么课题比这个更重要？”

在海内外各种讨论意见中，旅美学者郑竹园的建议值得探讨。他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对峙近40年之后，在现阶段政治与经济制度互异的情势下，全面性的统一暂时不可能达成。可行的道路，是依照欧洲国家的先例，成立“大中华经济共同体”，或称“共同市场”，其包括大陆、台湾、港、澳与新加坡。具体原则是：①各成员维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不相统属；②共同市场求经济上的互助、不求政治上的统一，政治统一为未来目标；③总部可设在香港或新加坡；④共同

市场可以减少贸易限制，提供优惠贷款，但不包括资金与劳力的直接交流；⑤成员有自由退出的权利。对这一构想，有港、台学者提出不应当把新加坡简单地包括进去，这是很有道理的。更要指出的是，海内外学者应该放弃“主义”之争，求大同、存大异，才有可能取得建设性的进展。

中国大陆、台、港、澳的经济联合，看来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对联合各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各方经济互有长短，经济联合正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如果这个中国经济共同体能够建立，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将在世界经济中进入强国地位。从发展趋势看，其将有能力与其他经济集团一较天下（见下列几个表格）。据估计，这个联合体1988年的进出口总额将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900多亿美元，从尖端科学到高技术，从卫星、飞机到化学制品以至一些消费品，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走向经济联合之路

可以预料，建立中国经济共同体，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的强国之梦，虽然在目前其实现仍需突破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障碍。但这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之事，也将会成为新一代华人的共同理想。

从更长远来说，中国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将会使海峡两岸走向政治统一之路。政治统一难于靠一时的强求硬索，只能是通过经济合作日益密不可分，形成“水到渠成”之势才行。因此可以预料，中国的统一大业很可能沿着下面的几个阶段进行：

- (1) 两岸发展通商、通邮、通航；
- (2) 建立中国经济共同体；
- (3) 建立国防分工体系；
- (4) 实行中国式的政治统一体制。

按照“一国两制”总体思想的设计，香港和澳门在本世纪末回归祖国，这已是不

表1 1986年经济集团重要指标

	总人口	每人国民生产毛额	国民生产总值	总贸易量	
	(百万)	(美元)	(美元)	出口	进口
	(百万美元)				
欧洲共同市场十二国					
总计	322.8		3,442,140	708,489	687,349
美加自由贸易区					
加拿大	25.6	14,120	361,472	90,193	85,068
美国	242.0	17,480	4,230,160	271,307	387,081
总计	267.6		4,591,632	307,500	472,149
东南亚五国					
总计	295.0		204,939	64,758	64,283
提议中之华人共同市场					
中国大陆	1,054.0	300	316,200	31,148	43,172
台湾	19.5	3,688*	71,916	39,758	24,165
香港	5.4	6,910	37,314	35,440	35,366
总计	1,078.9		425,430	106,346	102,730

可逆转的趋势。因此，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
是台湾问题，需要海峡两岸人民和政治家对此作出新的努力。

• 每人国内生产毛额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出版之“1988年世界发展年报”

表2 提议中之华人共同市场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及日本之比较

	总人口相当于	国民生产毛额相当于	出口相当于	进口相当于
欧洲共同市场	3.2倍	12%	15%	15%
美加自由贸易区	4倍	9%	34.6%	21.8%
东南亚五国	3.7倍	208%	164%	160%
日本	9.1倍	23%	46.4%	68.7%

表3 1986—1989年香港、台湾、日本每年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

国家(地区)	1986	1987	1988	1989
台湾	10.8	12.3	7.4	6.5
香港	11.2	13.5	7.1	5.7
中国大陆	7.8	9.4	9.8	7.8
日本	2.6	4.9	5.1	3.8

资料来源：亚洲华尔街日报1988.10.3

作者单位：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谭湛明

(接第37页)

一笔既可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用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资金。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配合使用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以兼顾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正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是作者今年一月五日提交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的论文——编者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现代股份制运作机制 及借鉴意义

刘文韶 梁俊乾

体制及运作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股份制在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发展，逐步成为左右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成分的基础成分。1980年美国的企业构成中，仅占全美企业总数的16%的股份公司，销售额和净收入分别占全美企业销售额和净收入的89%和79%。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其所以如此，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即股票市场和股份制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体制。

一、股票市场及与之相关因素构成股份制企业的社会动力机制

现代股票市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股票分散持有，股份大众化、社会化。据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料，1952年美国仅有650万人持有股票，占总人口的4%，到1985年增至4704万人，达总人口的20%以上，加上间接持股的人数，持股人总数达1.7亿以上，占人口总数的8/5强。香港也有类似美国的情况，社会公众，甚至一些家庭主妇也成了股票市场上的常客。香港汇丰银行规定每个私人股东持股量不能

超过总股权的1%。香港《公司条例》规定上市公司的上市股权不能低于股权总量的25%。公众普遍持股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股票上市前和上市后的规范化、法律化。对于公司上市应具备什么条件，办那些手续，股票市场的一系列程序规范明确。企业股票在上市前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经营业绩（香港规定一般应不少于5年），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核数，经营过程的财务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股票市场的上述特点，将企业不自觉地置于社会动力机制体系之中。（1）股票的分散化、大众化，使企业的发展在千万个股东的社会基础力量推动下经营，股东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企业的发展，股市的变化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晴雨表，正常的情况下，股价波动是企业经营好坏的自动反馈信号，指引着资金方向。股东在股票市场上的选择，构成了市场导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企业以科学经营取胜，以质量求生存。推动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包括社会资源在内的资源的优化组合。（2）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必须公开，促进了企业

经营过程的透明化和分配的科学合理。把企业更加明晰地暴露在社会监督之下，各种私下交易被公开交易所代替，借用社会监督力量推动企业的进步。公司股票上市后，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增强了企业的经营信心，另一方面虽然股价的涨落不会对公司原来资本的实际形态发生丝毫影响，但对公司新筹措资金影响重大，给企业造成压力。使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尽心尽力，设法把企业经营好，企业在进一步扩大规模中才更易筹集资金。

(3) 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推动。如一个会计师一旦受聘为一个公司的核数师，则要对企业向社会公布的企业经营状况负法律责任，一发现有弄虚作假，轻则要吊销营业执照，被行业协会、公会开除，重则绳之以法。

二、股份公司的体制构成特点，促进了企业经营过程的科学化和社会精英阶层——经营者阶层的形成

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但股东大会一般不干预公司的经营业务。董事会一般由三部分人组成：投资者（股东）、经营者精英（一般成为高级职员）、社会名流。有三合一的，也有其中二合一的，单一的由投资者组成的则极少。董事会是公司法人的集体代表。单个股东即使拥有较大的股权，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干预公司在法定范围内的决策经营活动。

现代股份制企业经营者队伍的构成表明，非投资者的比例有日益上升的趋势。许多公司的董事会中，包括一些典型的家族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已无投资者。据有

关资料：美国100家最大公司的1475名董事和经理中，只有10%出身于富豪之家，其余90%是凭自己才华取得经营成就和地位的（1980年）。日本对一批大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个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高级职员中，有1410人是职业经营者，只有90人同时又是业主。大的股份公司资产持有者不得不求助于经营专家，一大批非股东专家们担任了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等要职，而资产持有者退居董事，甚至连董事也不是。

驱使这些非投资者兢兢业业经营和开拓创新的是股份制体制特点和个人社会价值观。经营者阶层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按其身份均属雇员，但大多数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是董事会成员。无论是否是董事会成员，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忠诚的执行董事会的决议。现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动机并不完全取决于获得物质利益的多少，荣誉感、支配欲、社会地位等非物质利益的满足是企业家经营的更实际动力。现代股份制体制的特点形成了真正最关心企业命运的不是持股者，而是企业的经营者。经营者的事业就是经营企业，企业的成功是经营者的成功，企业的失败是企业经营者的耻辱，是企业家事业的失败。在现代商品社会里，一个高级职员在甲公司因经营无方而被解雇，乙公司往往不会聘用，即使聘用也要打折扣。社会价值观加上较高的经济待遇，迫使这个阶层的人员，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企业尽心尽力。

总之，股份制的这种运行机制，一方面制造了物质财富，使股份经济从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制造了社会财

富，即促进了社会精英阶层——经营者阶层的形成，使资源的优化组合真正得以实现。这两种财富和社会动力机制、企业家价值观念的联结，形成了现代股份制经济的运行体系，是股份制的活力源泉之所在。

积极借鉴，加快股份制步伐

现代西方股份制经济的成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而我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不长的基础上发展股份经济的，应该积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加快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现结合深圳实际情况，谈谈加快股份制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一、完善董事会制度，使董事会逐渐成为经营者精英聚集的班子

我国的股份制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一个能维护国家利益，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股份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股份的管理核心是企业的董事会，董事会制度在深圳市的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这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董事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应该参照香港和国外公司法及有关组建董事会的条例，制定适合我国股份制管理的董事会条例。对董事会成员的组成不强求统一，根据企业各自的特点，董事会的成员可以是股东，也可以是非股东。董事会是企业的战略决策班子，应由关心企业、重视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人组成，董事会成员一般应是经营者精英。董事会不是虚设，而是职能和权力都非常明确的、正常运作的组织。

进一步理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决策经营过程

中形成“两马驾辕、各行其是”。这首先是体制上的原因，各对自己的所派机构负责，合作与协调不够。政府应逐步对国营企业的组成实行按国际惯例办事，政府有关机构只向国营企业的董事会派国家股代表，企业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及高级职员由董事会确定，向董事会负责。政府的有关机构向企业派去的国家股代表，应充分代表国家利益，其国家股的增殖状况应与其个人利益明确挂钩。

二、抓紧与股份制有关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股票市场

典型意义的股份制是由股份制企业、股票和股票市场组成，不上市的股票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大大下降。与股份制密切相关的是股票市场的建立，在没有股票市场（主要指二级市场）的情况下，发挥股份公司吸收社会资金的作用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必须同企业股份制发展相适应，在大力发展短期资金市场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长期资金市场，开辟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交易市场。为企业股票上市创造条件。

独立的负无限责任的社会会计师制度和律师制度的社会化服务与监督是股票上市的必要条件，应尽快在更大范围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从深圳市来说，企业构成成分多元化，多与外商、外资有一定的联系，企业要逐步从社会上公开聘请会计师和律师，促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决策过程的科学合理。

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进行企业资产评估，而此工作又是一项与国家、企业利益密切相关、比较复杂的工作，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

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的资产评估规定和办法，组织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资产评估机构。

三、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企业股票走向国际市场

前面已讲过，从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是一廉价利用资金的重要途径，利用国际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也是一条重要的利用外资的途径，且比其它利用外资途径担更少的风险。所以，应该创造条件，鼓励经营基础较好、产权关系明确的内资企业和比较成功的合作、合资企业的股票在国内上市的同时到香港和其它国际股票市场上市，这样有利于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引进外资简便、廉价、有效的方式。从深圳企业的现状来看，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股票的企业还不多，但今后股票走向国际市场是一必然趋势。所以，必须大胆的按国际股票市场上的通行惯例，进行企业股份制的规范化改造，促进特区企业尽

早进入国际市场，真正走上国际大舞台进行竞争。

四、借鉴移植香港关于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规

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组织的基本方式。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法律在管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主要以严密细致的法律来实现，附之以其它经济杠杆。在借鉴利用现代股份制经验的同时，借鉴移植香港关于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规也是十分必要的。香港的经济法规与英美的法律属同一体系，符合国际惯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法规之长。但是，借鉴移植必须和改造、充实结合起来，要形成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特区特色、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我国企业集团的兴起与发展，必然出现“经济性的垄断”，它既不同于“行政性的垄断”，更有别于资本主义垄断。现阶段，这种垄断性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开拓。

企业集团发展趋向的垄断性

范 英 刘 青

随着我国横向经济联合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1986年以来，一大批企业集团活跃在经济舞台上，“垄断”这个往日只是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抽象名词，开始作为现实的经济问题，走进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关注，围绕着垄断是不是已出现，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垄断”在持否定观点者的笔下，是一个极不光彩的形象，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弊端：①使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出现停滞的趋势；②阻碍新兴企业的发展；③不求改进，影响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等，从而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在《强迫加入组织》的著作里，指出“垄断”就是剥夺！剥夺原料，用联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剥夺运输工具；剥夺销路；剥夺信贷等等。在我们国家，垄断的存在有其“不合理”的背景：其一，不成熟的市场机制是企业集团垄断产生的重要前提；其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裂缝，为垄断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其三，人为设置的障碍为企业集团垄断大开绿灯；

其四，传统经济模式的弊病，为企业垄断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结论是“企业集团垄断的出现无疑是传统经济模式后遗症的借体复发。”（鲁开垠：《来自企业集团垄断的思索》，《中青年经济论坛》）

然而，垄断是什么呢？在对之进行评价之前，我们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垄断实际上是指少数企业或集团，依据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控制，通过“自由地”调节供给和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垄断形成的客观条件必须是：①以商品经济为基础；②作为垄断主体的企业集团，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③这种优势的经济实力，是通过公开竞争而获得的；④要有能力控制生产和市场，必须以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物质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属于一般商品生产规律的竞争，就必然地要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存在并发生作用。这种竞争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为争夺最有利的生产和销售条件而进行的，不受限制的竞争，表现为通过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使自己的商品卖得比别人的更便宜的办法来进行。在竞争中，大企业由于能够更多

地，更有效地使用机器和各种新技术，能够更广泛地实行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并且能够节省各种费用，因而占有明显优势，在战胜对手的同时不断扩大规模，由此引起生产的集中。竞争在引起生产集中的过程中，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推动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展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摘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显然，这个过程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垄断一旦形成，一方面确实会形成一些弊端，如上所述。而另一方面，垄断会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具体表现在：垄断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生产单位；第二，由于生产的高度集中，各个垄断集团组织，不再像自由竞争时期的商品生产者那样，是为了情况不明的市场而进行盲目生产，而是可以对本国甚至对全世界的市场容量，原料来源等等，作出大致的估计，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可以根据协定，有计划地分配和控制原料来源；第三，垄断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工作活动的社会化，使科研工作从分散地进行的事业，转变成了由垄断组织建立的研究机构集中地进行的事业。垄断就是使生产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正是向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发展吗？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联合体组织在专业化协作、技术实力、资金实力等等一些方面占有优势，可以在组织内部有计划地开展经济活动；对市场容量的了解，可以使联合体更好地按消费者的需要组织生产和

销售，科研工作的社会化更是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的要求。对于垄断带来的弊病，我们不必过于忧虑，只要它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因此，正如商品经济的存在必然产生竞争一样，竞争发展的结果必是形成垄断，它是商品经济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既然是规律，我们就只有去顺应它的发展，利用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硬要去阻止它的出现，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劳的，甚至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实际上，我们目前存在的横向经济联合体内，已经出现了垄断的某些特征，但这只是经济性垄断，是在社会化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完善和统一的市场体系中，通过激烈的竞争而形成的。它靠的是经济实力，而不象那种行政性垄断，即通过行政的或其他的力量划地为牢，对经济实行分割，筑起种种壁垒，人为地造成某些生产者在一块“世袭领地”内形成垄断。前面讲到的所谓垄断存在不合理的背景中的“垄断”，就是这个“行政性垄断”。这种垄断，在我国国家长期存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桎梏，我们真正要消除和防止的只是这一类“行政性的垄断”，而不是横向经济联合中出于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性垄断”。后者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当然，垄断不能无限发展。由于垄断组织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利用垄断价格操纵了市场，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了阻碍。同时，垄断行为也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国家应该有一定的限

制垄断的政策。按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集中体现在产业组织政策上。他们的产业组织政策分为两类：一是限制竞争，利用规模经济的政策；二是维护竞争，限制垄断的政策。这两类政策的实质内容，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往往都被资本主义各国所同时采用。关于限制竞争，利用规模经济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国家政府，为了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手段，甚至亲自出面进行干预，以推动合并，扩大企业集团的规模。同时，制定有关的立法，在财政、税收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推动企业集团的发展。限制垄断的政策，包括以下内容：①制定和实施禁止垄断法，该法的主要措施是禁止竞争者之间以协议等形式达成价格同盟或限制产量，对规模过于庞大的企业进行分割，规定企业的最大市场占有率和资金周转额等；②制定和实施企业合并法，对能够产生阻碍竞争作用的不合理的企业合并行为限制；③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主要措施是利用各种经济杠杆，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如通过税制改革使各类企业在纳税问题上，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

以上的政策措施，在我们国家也一样可以适用。一般情况下，两类政策措施可以同时实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可以侧重其中一方。从目前看，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利用规模经济发展企业集团上。当这一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当垄断的弊端显露时，则要把重点放在后一类政策，即限制垄断，维护竞争。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

过渡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这时，电力、内燃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使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使垄断逐渐代替自由竞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资本不但垄断了原料、销售市场，而且通过资本输出，直接在国外生产商品，占领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市场。具有世界性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掌握有庞大的资金、先进的技术，控制着许多大银行、工矿企业与商业运输公司，雇佣有大批的专家，所以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要建立经济特区，在当前就不得不同这些跨国公司打交道。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具有规模垄断的大联合企业——企业集团，才能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目前，我国发展企业集团具有许多优势：

1、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可以造成巨大的生产单位，有较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能生产出“拳头”产品，即指质量好、成本低、竞争能力强、有销路、有较好信誉或有发展前途的，创汇多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能集中力量生产出高精尖高附加值制成品出口，提高出口能力，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逐渐使我国的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2、具有规模垄断的企业集团在专业化协作、技术实力、资金实力等等一些方面占有优势，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同类产品的相对集中，从而取得劳

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最终取得综合经济效益——规模效益；企业集团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努力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企业集团可以带动和帮助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

3、企业集团有能力形成一个遍布国内外的信息网络和经营渠道，对国际市场容量、原料来源等等，作出预测，按消费者的需要组织生产和销售，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集团也将有大发展，有些企业集团建立起一套适合国际竞争需要的组织形式，掌握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它们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展到对外投资、海外参股，兼并外国企业，开办跨国公司等方面去。企业集团逐步发展成为可以与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的拥有规模经济综合优势的大型骨干企业集团。但我国具有规模垄断的企业集团不具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腐朽性：

1、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大中型企业的财产所有

权绝大多数属于国家，企业只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集团的规模越大，经营的业务范围越广，说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垄断引起资本的集中，不是私人所有，而是为国家所有。因此，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激烈而尖锐的对抗性矛盾。这样的企业集团有时兼并中小企业，并不是为了“吃掉”这些中小企业，而是为了更好地配置社会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因此，规模垄断的发展不可能产生使生产和技术出现停滞的腐朽性。

2、当规模垄断发展到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干扰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时，国家可以利用各种经济法规对垄断实行限制，引导和制约企业集团的经营方向。同时应消除不利于竞争的各种因素。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竞争机制，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防止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裂缝为垄断的形成提供机会。因此，只有正确引导我国的规模经济朝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向发展，才能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起飞。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郑英隆 黄振荣



经济联合体间的利益分配研究

王 河

经济利益是企业联合的纽带，企业集团的利益分配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团凝聚力的高低。因此，寻求有效方式实现企业集团内部利益的合理分配，使各成员企业所获得的利益与企业集团整体利益同步增长，对进一步推动企业集团发展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一)

企业集团的分配活动，要比单个企业复杂得多，特别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跨所有制联合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加上现行改革中新旧管理体制的摩擦，表现在分配上则更为复杂。针对这种现实，要建立和完善企业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处理好企业集团与成员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 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何谓平等、互利，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平等、互利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法则之一，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依然属于商品交换范畴；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集团是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各个成员企业在收益分配中相互得益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谋求集团和成员企业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企业发展目标。平等是联合的基础，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不

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伙伴关系，不论大小企业，一律平等以待，对于联合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用平等协商的方法去解决。互利是联合的核心，结成集团的各个成员企业，只有做到经济上互利，才能使联合各方都有积极性。

(二) 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必须等价交换，以实现其价值并相应获利。要兼顾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搞一方对另一方的无偿调拨或占有。在利润分成、物资调拨、内部价格制定时，都应该实行等价交换。一些成功的企业集团一般是以各个成员企业的投资比例为基础，同时考虑各方提供的资源、材料、设备、技术、劳力和生活服务设施等条件，商定股权份额，分享盈利、分担风险的比例。有些企业集团在坚持互利原则的基础上还把让利作为增强企业集团吸引力的特殊手段。例如，生产优质名牌产品“蝙蝠”牌电风扇的南京长江机械制造总厂，当见到与分厂在物资进出时，虽均按国家调拨价“低价低进”，但分厂因没有最终产品销售权尝不到“低价高出”的甜头，就下放20%的产品自销权，从而使总厂与分厂的利益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可

见，只有实行等价交换，企业才能以收抵支，增强企业集团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坚持合理协商的原则。由于参加企业集团的各个成员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因此处理企业集团内部一切事务都需要始终坚持相互协商、相互谅解，在协商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前特别是在产品价格制定方面，要贯彻合理协商的原则。不少企业集团的专业分厂和协作企业，由于部分原材料自筹，议价购入，存在“高价低出”的吃亏现象，而总装厂为保名牌产品销价稳定，很难接受成员企业和协作配套企业的提价要求。又如，现今科技成果缺乏科学作价标准，企业反映其要价高支付不起，而科研单位则反映技术不值钱，没有经营积极性，这个问题已成为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影响联合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些问题，除国家研究制订定价的有关政策规定外，仍需要通过合理协商解决。

（四）坚持集团整体效益和成员企业利益相统一的原则。由于企业集团是由各个成员企业自愿结合组成，在经济利益分配上，一定既要考虑集团的整体利益，也要同时考虑成员企业的利益。随着联营经营事业的发展，企业集团的利润分配应保证集团本身和成员企业的收入都要得到逐渐增加。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企业集团内部利益分配要具有不同的比例结构，在企业集团开始兴办的过程中，不宜过多地占有利润，以免损伤企业的积极性。从结构利益最优的原则考虑，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条件，进行多种因素的分析、比较和判断，合理确定利益分配的最优化的比例

关系，促使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实现合理结合，协调发展。

（二）

合理的分配原则和认识，要通过具体的分配方法来实现。目前，在我国企业集团中，已由单一的生产资料组合方式决定的利润分配结构过渡到多元化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决定的利润分配结构。利润分配结构的多元化，决定了利润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第一，按报酬分配的方式。

投资报酬：一般是指资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为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参加联合各方以资金做媒介，互相协助，提供支持，相互之间的分配是根据投资多寡与效益高低进行的。

产品转让报酬：在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内部，有的企业为了集中力量更新产品，而将自己原先畅销产品转让给协作厂来生产，这里包括给协作厂提供技术资料，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以及产品的商标等，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协议，这些企业可以取得一定数量的产品转让费。

劳务技术协作报酬：在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内部，有少数企业用劳务技术协作的办法，来弥补企业资金的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以及原材料的短缺等困难，而对方可以用资金和实物以及技术提供为报酬，这样就形成了以固定原材料供应的办法作报酬的方式。

技术转让报酬：是指企业集团内部的技术协作所应采取的分配方式。它是接受技术的企业应按一定的数量和方式支付给对方有关提供工艺、图纸等技术资料，派

技工进行指导的技术转让费。

第二，内部协作价格对所得收益分配的影响。

所谓内部协作价格，就是依据内部价格一次结算，自负盈亏。也可称为内部结算价格。在实践中内部结算价格的制定有三种做法：(1)按现行的出厂价格作内部结算价格，这种方法虽然省事，但在我国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的情况下，势必造成收入和贡献相背离的苦乐不均，造成现行价格和专业分工的尖锐矛盾，有的企业就会因为吃亏而不愿参加这种企业集团。(2)以实际成本作为内部结算价格，利润全部反映到集团，这种方法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新的“大锅饭”，成员企业不再关心赢利，而且没有利润后，资金就没有调剂余地。(3)是计划成本加上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内部结算价格，平均利润率又分为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工资利润率几种，这几种各有长短利弊。究竟采用哪种利润率，应根据企业集团的特点，由各成员企业协商确定。

第三，利润分配法。

企业集团中龙头企业的利润总额，等于集团利润总额扣除国家税利和协作成员企业应得部分后的余额，这部分利润按国家规定应分为三部分，生产发展基金应由龙头企业统一掌握，根据集团的长远规划、各成员企业的生产技术装备状况和生产能力分配使用。福利基金的大部分应由龙头企业掌握，用于职工生活福利设施和其他支出，其余部分应根据各成员企业的需要进行分配或奖励效益好的企业。对于奖励基金的分配，龙头企业应按照各成员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产量定额、零部件目

标成本等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并考虑各成员企业中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安全卫生条件等，进行必要的修正，合理确定奖金总额和分配比例，切忌采取按职工人数平均分配的方法。

第四，级差效益分配法。

这是根据级差效益原理，对企业集团的利益分配关系进行优化，以增强企业集团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合理可行的方法，所谓级差效益，是指在进行工业生产时，投入等量劳动会有不同的生产率，从而使各种条件较好的企业获得的一种超额收入。其中，由于产品技术难度、劳动强度、资产密集程度的不同以及原材料价格的高低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超额收入，称为级差效益第一形态，由于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等主观因素所形成的超额收入，称为级差效益的第二形态。运用级差效益的原理，就是要合理区分级差效益的两种形态，并实行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法，对级差效益第一形态，可利用集团内部协作价进行合理的调整和分配，即对技术难度高、劳动强度大，或原材料价格波动频繁的产品和零部件，以及资金密集度低的企业，在定价时给予适当补偿，相对平抑物化劳动创利润与活劳动创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差别，使各企业的赢利条件趋于平等，调动集团各成员企业的积极性。对级差效益第二形态，则全部归各企业所有，集团内部互不调剂，以鼓励集团各成员加强管理，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并在集团内部形成比质量、比管理的竞争局面。

第五，按股分红承担亏损分配法。

对于实行股份制的企业集团，对股东坚持按股分红，按股承担亏损的原则进行

分配。股份制集团的可分配的利润，是利润总额减去应缴纳的所得税及应提取的各项基金后的余额才是可分配的利润。在实行税、利并存的前提下，按先保、后留、再分的顺序进行分配，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即集团先缴纳所得税，在剩余部分中集团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后备金后，再按股分红。而分配数额大小由集团董事会决定，既可以多分配，也可以少分配，也可以不分配。为了稳健起见，集团最好不要将可分配的利润全部分光。集团可在盈利较高的年度中，多留一部分利润不予分配，以备利润较少年度进行分配。过去年

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与本年度的利润合并分配。股利分配方法，在发行股票的情况下，按确定的股息率分配；在不发行股票的情况下，按各方投资比例分配。

综上所述，企业集团及成员之间分配合理与否，决定着集团企业本身发展的前提。企业集团本着互惠互利和平等的原则进行收益的分配，有效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这样，企业集团的经济利益以及责任就会统一起来，成为推动企业发展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黄振荣



吴质籍贯小考

熊清元

吴质是建安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家。关于他的籍贯，《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说他是“济阴人”。据《续汉书·郡国志》，济阴乃郡名，后汉时其属县有11个，地域较广，作为籍贯似嫌宽泛。然而此外史籍中别无明确记载。要知其具体籍贯，还须考证。

近读《晋书》，发现如下两则材料：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鄆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也。（《良吏传·吴隐之传》）

（青龙二年）景怀皇后崩，景帝更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女，见黜，复纳（羊）后。

（《后妃传上》）

按，《魏志·王粲传》及裴注告诉我们，吴质曹魏时期曾任过振威将军、北中郎将，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太和四年，入为侍中”。查清·洪贻孙《三国职官表》，魏侍中中只有一个吴质。因此，可以断定此濮阳吴质当即《魏志·王粲传》中之吴质。但《魏志》说他是“济阴人”，而《晋书》却说是“濮阳鄆城人”，不同郡，岂不矛盾？考《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属县有“鄆城”。王先谦《集解》云：“《晋志》改属濮阳国。”《晋书·地理志上》濮阳国属县中也正有“鄆城”。原来，吴质是后汉济阴郡鄆城人。《晋书》鄆城改属濮阳国，故与《魏志·王粲传》所记郡望不同。而后汉鄆城在今山东鄆城北不远，因此，吴质的籍贯应是今山东鄆城县。

这里须要附带指出的是，今人著述有说吴质是今山东菏泽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这大约是误把隋代济阴郡的治所当成了吴质的具体籍贯，因为隋代济阴郡的治所在今山东菏泽。

“书海酌蠡”责任编辑：刘斯翰

就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与张太增等商榷

何国文 何力坚

张太增、郭利平、杨晓明合写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见《学术研究》杂志1988年第5期），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家劳动的产物”，“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讨论。

（一）

张太增等三位同志的论据是：“在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劳动是绝对相依、相对独立的劳动；工人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资本家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尽管形式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不同，场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尤其在当今新技术革命面临竞争与挑战的时代，脑力劳动对生产力的构成和生产力的发生、发展起着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这一点不能只对工人而言，也应包括资本家。因此，剩余价值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家并不是剥削了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无偿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

分析起来，主要论据不外是如下两点：一是资本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二是关于劳动力价值的理论不仅对工人而且对资本家也同样适用。

我们认为，第一点论据只能当作个别事例成立，不能当作一般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

个必要论点。因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只要确认资本家为商品生产付出了劳动，就应承认他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所有者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将之委诸一个不是资本所有者的经理阶层来担任。当然，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也总还会有一些资本家亲自担任经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他们确实也主要以出主意、作决策、制订规划等脑力劳动的方式付出劳动。因此，根本否认资本家参加劳动是不对的，但像张太增等同志的文章那样，与工人相提并论地把资本家参加生产经营活动普遍化，或说资本家的劳动是绝对不可少的，我们认为这道理是不成立的。

关于第二点论据，即劳动力价值的理论对资本也适用的观点，我们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价值混同了。

工人的劳动力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商品。即使产业资本家亲自参加商品生产的劳动，也决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从事商品生产，所以并不存在资本家劳动力商品，因而也就没有资本家劳动力的价值。这是我们说张太增等同志的这个论点不成立的理由。在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来进行商品生产这一点上，资本家与一个自己从事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者并无区别。尽管他支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客观上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维持和再生产资本家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必要产品的价值；另一部分是超过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量的价值，即剩余产品的价值，但资本家决不会把这两部分分为前者是有偿的后者为无偿的，因为他自己取得了全部的价值

量，就是说他的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只有把剩余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相混同，才会根据产业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会区分为必要产品价值和剩余产品价值这样两部分，作出剩余价值是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的这种结论。其实，剩余产品泛指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那部分产品。当这些劳动产品是商品时，这种剩余产品就有价值而被称为剩余产品价值。它可以由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者提供出来，例如小商品生产者和工人都可以提供剩余产品价值。只有资本主义下雇佣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价值，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剩余价值，因为那是为资本家占有的工人无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在这里，这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才可以相等。小商品生产者提供的剩余产品价值是不能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这个范畴相混同的，因为这种剩余产品的价值仍归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自己所有，并没有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同样的道理，如果产业资本家自己参加商品生产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产品的价值，这也不能同工人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相混同。

(二)

究竟产业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承认这种资本家的劳动也创造价值是否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相违背？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来不说资本家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已提及，以下拟作进一步的展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不提及资本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创造价值是有其政治用意的。例如在

卷一第五章专门论述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就曾这样嘲讽地写道：“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变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样谦逊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8—219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所谓资本家也有劳动形成价值，看作是庸俗经济学者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辩护的论调。现在我们虽然反对张太增等同志把资本家有劳动参加价值形成当作一般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必要论点，但也把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产业资本家（撇开商业资本家不说）的劳动能够形成价值作为特别例子来肯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理应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普遍现象，作抽象的理论分析说明，不拘泥于非本质个别事实。但现实经济生活却确实有这些事实存在，特别是我们又需要对这些事实作出解释，就应该从理论弄清问题，如果觉得这会与经典论述相悖而回避，反而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弄清这些问题对当前我国改革更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经管系
责任编辑：黄振荣



杜国庠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创建时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本刊首任主编。今年4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及汕头市、澄海县隆重举行“杜国庠诞辰100周年纪念及学术思想研讨会”。本刊特发表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江明等同志的一组文章，以表示我们对这位理论界前辈的纪念。

略论杜国庠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张江明 章权才

今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国庠诞辰100周年。

一提起杜老，学术界的同行们总是深怀敬仰的心情。他既是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又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活动家，他在治学态度和风格上，在文章道德上，色泽鲜明，独树一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杜国庠同志于1889年4月出生在广东澄海县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他的行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889年到1907年，即17岁以前是启蒙阶段；从1907年到1919年，即从18岁到29岁是留学日本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即从30岁到60岁

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和从事理论工作的阶段；从1949年到1961年，即从61岁到78岁去世，是在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上推进理论建设的阶段。这段时间，他除了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外，主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广东师范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兼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广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等职。可以这样说，在60年代以前，广东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是跟杜国庠同志的业绩紧紧连在一起的。

杜国庠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辛勤耕耘了80多年。主要有三方面贡献：一是创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这可以上溯到20年代初。1920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杜老就跟谭平山、李春涛等人一起，创办了《社会问题》杂志，力图用进步观点分析时政，但由于思想倾向明显，仅出版了一期即遭查禁。20年代后期，杜老积极投身于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不久又跟洪灵菲、戴平方等人一起组织“我们社”。“太阳社”和“我们社”都有着自己的刊物，而杜老都是积极的撰稿人。二是从事翻译，介绍进步理论。1928年前后，他介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柯根的《无产阶级文学论》等文学著作；哲学方面介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波德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经济学方面还有《金融资本论》等等。他还自编了《政治经济学辞典》。三是著书立说，整理文化遗产。杜国庠最初研究经济学，后来又研究文学和哲学。对于哲学，他是一位通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他都有研究成果问世，而用力最深的无疑是先秦诸子之学。从时间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1943年前后，则是他写作最勤的时期，收在《便桥集》中的《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以

及收在《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一书中的多数文章，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杜国庠同志的学术论著，大多收集在《杜国庠文集》、《便桥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四本书里。解放前夕，他曾参与侯外庐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审查和修订工作，其中有些章节如《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论》等，是他亲自撰写的，他为全书的出版付出过巨大的精力。

“孔墨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杜国庠是我党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辈，早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转变为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杜国庠是作过巨大贡献的。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使他的许多论著革命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

而在其思想方法上，最为根本的一点，是他始终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杜国庠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也是使哲学史的研究能够成为科学的方法。杜国庠指出，认识世界一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方法，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在《六经注我》一文中，杜国庠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为学和做人，说：“主观主义者，蔑视客观，脱离客观，不以客观为标准。故其所谓理者，常是高下在心，恣意说话；其引用和解释前人的言论，也往往断章取义，任意附会，不惜强使古人以就自己。……所以，主观主义，必然是观念论。”由于一切从主观意念出发，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不可

能被认知。用主观主义去做学问，也就决然达不到真理的彼岸。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中，杜国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批判了旧道统学的唯心主义的本质，他说：“旧道统学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另一方面却一笔抹煞了汉唐以来许多儒家的劳绩。二者都是歪曲史实去替自己的宗派捧场，都是对于真正的学术有害的。”在这里，杜国庠提出了“真正的学术”这个概念。所谓“真正的学术”，其实就是摒弃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作祟，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去还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学术。与主观主义相对应，实事求是的特点就是重视实际、联系实际，以是否符合实际为标准。用实事求是这个科学的方法识物，就必然能够认识事物；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就必然能够取得真正的学问；用这个方法做人，也能够成为脚踏实地的人。

其次，杜国庠认为，实事求是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我们在学术思想上的优良传统所在。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论‘理学’的终结》等文章中，杜国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反驳有人把玄学视为中国哲学精神的论点时指出：“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认为我们为学做人的需要，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玄学是反科学的，歪曲事实，有损学者的风度，贻害青年的学业，尤应纠正。”当时有人认为，经虚涉旷代表了中国哲学的道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杜国庠严厉地批驳了这一观点。他说，固然，在中国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经虚涉旷之学曾经流行过一时，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构成和运动

总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图景，有正面，也有反面，有主流，也有支流，经虚涉旷的流行，决不等于它的独霸。他说：“客观的史实所示：思潮的发展，确如社会阶级的代兴一样，唯物论与经验论也迭为盛衰，时有偏倚，或继承或批判，交织而成一条总流。其间实有一脉之潜通，但无道统的独霸。”他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宋明的道学，这些都是所谓‘经虚涉旷’的，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及至有明末叶，王学势衰，明清之交，黄顾王颜都重‘致用’。前清朴学大盛，戴氏哲学也痛斥宋学的玄虚，控诉‘人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杜国庠对明清之际反理学的思潮尤其重视，对当时的代表人物黄顾王颜诸人的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以顾炎武、颜习斋为例。他认为，顾炎武做学问的目的无疑是“经世致用”，“正因为他志在经世致用，必须足以见诸行事者方算学问，所以他做学问的方法不能不‘实事求是’。”“亭林是最重客观事实的人，他做学问，不是单从书本中猎取知识，而且连‘老卒逃兵’之流都可做他的顾问。”杜国庠对颜习斋的评价更高，认为他治学做人均“富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精神贯彻着他的整个学说体系，形成了他的实践主义，他不但以实际的效用去做衡量学术的标准，而且他的表现方法也是从寻常日用采取例证，使人觉得亲切有味。”杜国庠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总是有的放矢，对历史上主要哲学家的评判，向来是爱憎强烈，是非分明。他把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出来，并认定这才是中国哲学的

精神，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杜国庠认为，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论上，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不仅要以实际为起点，而且要以实际为终点；不仅要正视现实，而且要改造现实；不仅要切入实际，而且要以实际的效用去做衡量学术的标准。30、40年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年代，是全民奋起的非常年代，在学术理论上，也是面向实际和脱离实际两条认识路线激烈争论的年代。这时，学术界有人提出，“最哲学底哲学”，即哲学的最高标准应该是脱离实际的玄学，与此相应，在认识论上他们提出了一种所谓“过河拆桥”的观点，这一观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始是以实际事物为出发点，以经验为桥，其终是过了桥，达到河的彼岸，形成的观念就可以脱离实际，在理论上就可以作任意的飞腾，这时，“哲学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不管事实的。”杜国庠坚决摒弃这种不切实际、不管事实和逃避现实的哲学方法。他指出，这种方法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把桥拆了，就断绝了两岸的交通，在哲学上，也就是割断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因而理论的正确性如何，便无从得到检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所倡导的哲学是要“管事实”、“着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哲学。这种管事实的哲学在认识论方面必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它必须研究客观存在的现实；第二，它必须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三，它必须切入实际，认识和改造现实。杜国庠一生从事哲学史的研究，他最不赞成的是逃避现实和不着实际的空谈。他对魏晋玄学持批判态度，并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玄学家经虚涉旷的社

会根源。他说：“魏晋玄学之所以流于‘经虚涉旷’，自有其逃避现实的社会史根源，不能单求诸思想本身，更不能求诸个人性格。其中，有托而逃，和冒充风雅的，且不去论它。即以清谈的领袖而论，也大抵是喜玄远，厌俗务，所谓‘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一路的。”杜国庠从历史转向现实，尖锐地提出，在30、40年代的思想界中，有人把玄学作为道统，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经虚涉旷的思想也代表目前中国一般爱弄虚玄的先生们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今后和平建国的事业，对于青年为学做人的进修，都是有害无利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玄学的过去和现在大张挞伐的同时，对历史上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传统却大加宣扬。比如，他颂扬明清之际颜习斋那种“实践主义”就是例证，对颜习斋“以实际的效用去做衡量学术的标准”特别赏识，认为这应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好传统。

再次，杜国庠研究中国哲学史，一向对资料的积累、甄别和运用是十分重视的，这也是他实事求是治学方法的具体表现。作为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学者，杜国庠是完全了解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的。为了掌握资料，杜国庠对文字训诂给以巨大的注意。他常常告诫后学，要十分重视文字训诂之学，因为这对于弄懂弄通古代的经学和子学是必不可少的。早在留学日本和在上海居留时，他便对文字训诂之学进行过认真研究。翻开他的先秦诸子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对古籍繁征博引，对古字古义的解释深入浅出，

一部一部著作读起来是流利顺畅，这也可以证明他的文字训诂之学是有着很深根柢的。杜国庠对资料辨伪和考订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并为此花了大量的心血，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疑点都不肯放过。他赞扬清代乾嘉学派在资料考订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朴学家做学问切实、严密、谦虚的好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在接受前人遗产的时候。”（《太极原义不指本体》）他有一句座右铭：“把时代还时代，各人还各人”。他指出：“如果把时代还时代，各人还各人这一初步的工夫做好，那么，什么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以及门户道统等等谬见，自可不发生，就使发生了，也容易纠正。”杜国庠在考订资料的时候，还很注意破除派别之藩篱，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点，在经学史的研究上尤为显著，本文作者之一曾在《杜国庠与中国经学史研究》一文中有详细评介，不再赘述。（见《学术研究》1988年第8期）

注意吸收前人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杜国庠实事求是治学态度的又一方面的表现。他对古代哲学家在认识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总是十分珍视。在《中国思想通史》初版时，没有谈到宋代杨万里的思想。后来，杜国庠通过认真研究，发现杨万里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是当时唯物主义阵营中的一支别出学派，因此建议侯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通史》再版时，补充写上。在研究成果的吸收上，杜国庠不仅从清代朴学家的学术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从近代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学术成就中吸取营养。

不仅如此，对待外来思想，对待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杜国庠也是持着谦虚谨

慎、虚心学习的态度。杜国庠在谈到学术研究中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的综合，不是冶为一炉就完事，而是要批判地接受西洋现代的进步思想，消化吸收它而求其中国化，而使中国的思想现代化。”（《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侧面》）由此可见，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杜国庠所采取的也是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20多年前，著名哲学史家侯外庐先生曾这样评价杜国庠：“他的忠厚长者的优良品质，他的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以及生活严肃、简朴、谦虚的作风，他的学习中精益求精的自我批判精神，他的‘有条不紊’（郭沫若同志的赞语）的治学方法，他的对青年循循善诱的态度，特别是他在革命工作困难的日子里所表现的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和敌人斗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意志，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对侯先生的评价是很有同感的。杜国庠这样的社会科学家和革命活动家，留给后人的可资学习的珍贵遗产是很多很多的，今天学术界的人们有必要加以继承和发扬，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原稿9500字，本刊作了删节。）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凌峰

墨者·学者·革命者

——谈杜老的为人与治学

李锦全

杜老是杜国庠同志（公元1889—1961年）的尊称。他和郭沫若、侯外庐等人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他在同辈中是个长者。郭老在《洪波曲》中说：“杜守素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平常称之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要早我四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侯老在《杜老的道德和文章》中，称“他是老资格的革命活动家”，是“活在我心中的‘墨者杜老’，学者杜老，革命者杜老。”（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89页、194页）即此亦可见杜老为人在同辈中的声誉。综观杜老的一生，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应该说是主要的。但知人论世，为人与治学，两者实在是密不可分。我们纪念杜老百年诞辰，应该学习他为人与治学的精神，作为今天的借鉴。

心伤野岸玄黄血，肠断江声呜咽流。
边塞只今烽火急，中原何日鼓鼙收？
——一个奋战在灾难深重旧中国的革命者

杜老出生在清王朝的末世，他五岁丧父，家庭比较穷困，后得到师友的帮助和

接受地方的留学津贴，1907年东渡日本求学。1914年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结识郭沫若，1916年和李大钊组织过“丙辰学社”，反对袁世凯称帝。同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科，成为“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洪波曲》第107页）他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故国，1919年从日本归来，就开始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革命人生道路。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积极投入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谭平山一起主编过《社会问题》杂志。约在1923年，他同李春涛等人把在北京的住屋命名为“精庐”，实际上起到学术团体的作用。他和郭沫若还加入过孤军社，1924年两人都主张在中国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1925年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先后担任澄海县立中学和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由于他反对国民党右派，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受到通缉，那年秋天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他积极参加工作，到起义军退出后，1928年他才从香港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杜老到上海后，经钱杏邨、蒋光慈介

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和邓初民、潘梓年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简称“社联”）又是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人之一，主编该盟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他除撰写文章参加当时的理论战线外，还用吴念慈、林伯修、吴啸仙等笔名翻译过《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金融资本论》、《史的一元论》、《社会科学底批判》等专著，这些译著在当时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1935年2月，杜老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并辗转押解到南京、苏州等地。杜老在被拘捕期间，充分表现出他的革命乐观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意志。一同坐牢的田汉特赠他一首《虞美人》词：“艳阳照遍阶前地，狱底生春意。故乡流水绕孤村，应有幽花数朵最销魂。由他两鬓丝如雪，此志坚如铁。四郊又是鼓鼙声，我也懒抛心力作词人。”田汉表示愿意“永随君”，又称赞他“此志坚如铁”，可见他在难友群中所受到的推崇和尊重。1937年6月，西安事变后杜老被释放，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刻走上抗战第一线。当淞沪战役爆发时，他参加钱亦石任队长的战地服务队。亦石病死，他继任队长。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又转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抗日宣传干得非常出色，这在郭老写的《洪波曲》中有生动的描述，同时还特别称道他对国民党应付裕如的本领。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杜老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坚持革命的爱国者形象。

一如野鹤一行云，鹤首丹心各不群。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
——一个能真正把中华民族最美好的

道德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结合在一起的完人

杜老在旧中国经历了60年，回国后多半时间投身于革命，不但有时会遭受到杀头坐牢的危险，平常生活也非常艰苦。据许涤新回忆：1930年初在上海同杜老见面，“那时，他是上海地下党文化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工作相当紧张，而在生活上又极其贫困。”为要帮助同志们的进步，他经常出席许涤新、蔡馥生等人的读书会。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吃饭。参加会时，“经常买两个包着玻璃纸的小面包，一面吃，一面讲解。”这使到许涤新非常感动，后来在悼念文章中说：“杜老这种培养后代的精神，直到现在，还使我对他怀着敬意。”（《南国老树》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

对杜老的为人，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有亲切的忆述。他说抗战期间“在重庆时，杜老的清贫廉洁非常出名，多年之中，他身穿一件旧货摊上买的旧西装出入一切场合，总不见更新。”“抗战胜利了，爱国如杜老，总该算对国家、对民族有功了吧，然而，到了上海，杜老却更穷了。……过着除文章稿费之外几乎全无收入的一贫如洗的生活。”“有一天，郭沫若很难过地对我说：‘杜太太来了，杜老家里连一张床都没有，真是家徒四壁啊！’”邱汉生也说：“他亲眼看见杜老夫妇的晚餐，只是喝粥而已。”对此外庐归纳说：“凡到过杜老家的人，将他忘我工作，一丝不苟治学所作的贡献，和他过于窘迫的境遇相对照，无不慨然叹息。然而，杜老从不叫苦，更不肯向组织伸手。在革命队伍里，他对于贫穷的态度，可以说恬淡到了超尘

脱俗的地步。他不是安贫，他是忘我啊！”（第190页）杜老为人是外圆内方，他对敌斗争寸步不让，但平常“待人特别诚恳、谦和，无论面对什么人，无论对方序齿长幼、地位尊卑，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不过“杜老并不是一团和气的人，不是和事佬，他原则性极强，看人看事入木三分，但由于他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他依然是团结的模范。他给人的印象是敬而不远。”以上外庐对杜老的观察是比较全面和公正的。据此他说：“我毕生只遇到为数不多的人，能真正把中华民族最美好的道德和共产党员修养结合在一起，自然地融合在个人一切行动之中。在这为数不多的人里面，杜老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又说：“认识杜老的人，都无不叹服他的道德风貌。杜老的精神境界，由于有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相结合，近乎臻于完美的地步。”（《韧的追求》第191页、189页）这段评价我认为也是符合实际的。

杜老尤为可贵的地方，他不是个半截子革命者。建国以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大有改善。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几十年，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按照一般情况似乎应该多点“享受”了。但他却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没有丝毫的特殊气味。在50年代末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虽已年老多病，但国家对高干的某些物质照顾，却不肯接受，要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为党分忧。后来病重住院，组织上每天给他一磅面包，半两牛油，他还多次表示过意不去。病危时领导前去探望，他只是说，今后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表示遗憾。1961年1月12日，他因积劳成疾，

患肺癌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士之楷模，国之栋梁，杜老一生是当之无愧的。

早赋壮怀常落落，晚成大器自皤皤。
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红棉读远篇。
——一个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哲学史家

上面这四句诗，是杜老逝世后20天，郭沫若在所写悼诗中的摘句。郭老对杜老有“生死交游五十年”的友情，“西狩同舟沥肝胆”，“风云潮汕榻尝联”，这种交情确是不寻常的。他称赞杜老的“早赋壮怀”、“晚成大器”，当然是事实，但杜老最大的贡献，还是他的“便桥一集成千古。”《便桥集》据杜老1959年末写的编后记，说其中“收集了作者近20年来，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部分有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问题的论文。”由于杜老非常谦虚，认为这“到底多半还是一些不系统的短文，未及作深邃的探索，故名‘便桥’。”他还说：“一俟更好的钢筋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其实杜老由于革命工作繁忙，不像有些专业工作者那样写出鸿篇巨制。但正如外庐所说：“在学术研究上，杜老向来以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著称，他的每篇论著都是精雕细琢而成，都是长年探涉的辛劳和深思熟虑的思想的结晶。”（《韧的追求》第192页）对杜老的学术成就，外庐认为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做出的贡献最大。又说“杜老研究思想史，上自先秦，下自当代，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始终如一地贯穿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毕生不遗余力地阐扬唯物主义传统，揭露、

批判唯心主义错误。”（同上，第192页）

外庐对杜老研究思想史的特点作出这样的概括，原则上当然是对的。不过杜老阐扬唯物主义，并不单纯抄录马列的教条，如只简单论证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是从思想到行动上，都服膺那些唯物主义者。杜老对先秦诸子最尊墨家，但他除对《墨经》中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唯物论思想加以阐扬外，还特别重视墨家的务实精神。所以外庐说“他确实是身体力行恪守墨家人格的。”（同上，191页）郭沫若对杜老喜欢墨家，也承认他“在生活上也颇有那种勤苦节约、摩顶放踵的精神。”但他又说杜老“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不是像墨家那样为了‘王公大人’。这就使得他为了革命的利益，甘愿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样。”（《洪波曲》第108页）郭老本来是扬孔抑墨的，认为墨家是替王公大人干事。但他不能不承认杜老摩顶放踵的精神，是为了人民大众，为了革命的利益。可见杜老尊崇墨家，是批判继承墨家唯物主义的务实精神，他是通过身体力行，在革命实践中来阐扬中国的唯物主义传统。

杜老对先秦诸子，除墨家外对荀子也给以较高评价。但他肯定荀子，主要不是阐扬《天论篇》那种严为“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却反而批评荀子“到了《礼论篇》，就不免有点糊涂了，终于把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混为一谈，用他的用语说，就是把‘天’与‘人’，或者‘天行’与‘人道’混为一谈了”。（《杜国庠文集》第290—291页）

不过杜老虽批评荀子。但对他的礼学还是充分肯定。这是由于能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去看问题。杜老对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对礼乐的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都写过专题研究文章，他是把荀子作为转折点的关键人物来看待，并以此来论断他在唯物论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按照杜老的看法，“礼节和音乐的发展，是跟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发展而发展的。可见礼节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反而历史是推进礼乐的动力”。（同上，第271页）据此他虽然承认所谓“礼学”，几乎无不出自儒家。但从发展的历史说，先秦前期儒家的礼学，也和后期不同，前期以孔子为代表，后期则以荀卿为代表，都是时代使然，并无足怪。对于孔子，一方面肯定他所谓“克己复礼”，只是达到仁的手段。认为“这一点，是孔子发展了‘周礼’的地方，也是他的礼学最可宝贵之点。”对这一发展的社会根源，则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一部分庶人的解放，因而反映为“人的发现”。所以孔子讲“爱人”、“知人”，对象不只限于君子，这就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界限，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孔子却批评铸刑书和铸刑鼎，他的礼治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保守的一面。（同上，第285页、第287页）至于对荀子，则特别指出他“言礼也言法，经过了调和礼法而达到承认的地位。”杜老认为荀子发挥儒家的礼学已到了可能发展的限度，终于不能不说出“法者治之端也”而走到孔子礼治主义的对极。由是得出结论说：“可见历史的进展，不依人们的主观见解为转移，反而人们的主观见解要以历史的进展来解释。”（同上，第292页、293页）

正由于杜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分析问题，因而对孔子和荀子的思想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同样由于说清楚了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因而也说清楚了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他们的思想的递嬗，实有内在的必然的关系”，“这是历史必然的反映。”（同上，第198页）据此他提出批评说：“过去许多腐儒，蔽于卫道的偏见，往往因性恶论而扬孟抑荀，因痛恨暴秦的焚书，便以罪李斯者罪荀卿，从来不肯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学术。不知道礼论的发展，以及由礼到法的递嬗，是历史必然的发展的反映，不是某些人所能凭空构想出来的。所以‘知人论世’，必须对于当时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同上，第201页）

其实杜老这种批评，不是只对“过去许多腐儒”，更现实的是针对当时某些投机的政客。杜老指出：“近来又有些人对于古代礼乐大感兴趣”，“好象只要再来一次‘制礼作乐’，中国马上就会变成太平盛世似的，忘记了中华民族目前正在争取抗战的胜利，正在争取建国的前提，——而这却需要民主和科学。”（同上，第266页）而所谓“礼学”，却只适应于“从奴隶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东西”，所以不加批判地提倡，“那必然要做古人的俘虏”，“也必然要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因为它们都是既不科学又非民主的，不适于现代中国”。杜老认为：“目前所需要的是民主的新礼节，科学的新音乐。但是这些需要有一般民主和科学的生活才能产生”，不相信“可能由官僚式的局会一时地‘制作’得出来的。”（同上，第295页、第270页）杜老正是这样来研究思想史，才是真正地阐扬唯

物主义传统，批判唯心主义错误。

在40年代，除有些提出要制礼作乐为国民党当局粉饰太平外，还有的学者想从更高的哲学层次，企图建立一个新道统的体系，为蒋家王朝正统找寻理论根据。这套自称为的“新理学”，一方面说成是“最玄虚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自命为独接“中国哲学的精神”。杜老与此针锋相对，他写出《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同上，第405页）他也是先从历史上作出论证，在《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就指出经过明清之交黄（梨州）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的批判，“理学是决定地终结了”，“虽然还有人企图把它再‘新’一下，究竟是过时的果实，变了味道了”。（同上，第377页）文中还特别举出“意识地反对”理学的顾亭林，认为“他志在经世致用，必须以见诸行事者方算学问，所以他做学问的方法不能不‘实事求是’。”（同上，第391页）并说“他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将永远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好传统。”（第394页）而所谓“新理学”，“接着”的只是几个唯心主义的传统，是“集道家、玄学、禅学及宋明道学的‘玄虚’之大成。”（第488页）所以以“中国哲学之精神”自居，只不过是镀着金字的冒牌货。据此杜老不无风趣地说：“如果说它是玄学精神的进展，倒也罢了”，“要是说成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就得提出抗议了。”（第413页）

上述杜老当年对“新理学”的批评，应该也算实事求是的。他虽然坚持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对唯物主义的阐扬总是结合历史实际，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

力求做到证据准确，以理服人。他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哲学史家，却并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者。通读杜老的主要学术著作，这是我个人深刻的感受。

综观杜老的一生，他襟怀坦白，正直忠诚，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既不主观武断，也不人云亦云；既不轻下结论，也不

随意改变观点；接受人家正确意见，能做到从善如流，但又不看风转舵，逢迎世俗。他的为人与治学，可以说是做到完美的结合，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为要学习前辈无私无畏的精神，特草此文，作为杜老百年诞辰的悼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欢迎订阅一九八九年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广东社会科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平等讨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从理论上阐述和回答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映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动态和理论信息。《广东社会科学》以着重刊登有关研究举世瞩目的香港问题、“一国两制”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经济特区、孙中山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为其鲜明的特色。

《广东社会科学》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季度第二个月出版，每期定价1元，全年订价4元（含邮费）港澳海外地区每期售价10港元。

本刊欢迎登刊广告，本刊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穗工商广字212号

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 地址：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820—472 邮政编码：510050

订阅办法：

1. 本刊自办发行，请填写好订单，将第二、三联连同汇款寄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发行组，第一联留作报销凭证。

2. 可以破期订阅，汇款通过银行或邮局均可，广州市订户可直接到本刊编辑部交款订阅。

银行户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账号：89—09—19500号
开户银行：广州市北京路办事处

文艺大众化的先声

——读杜国庠《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

熊泽初

1928年中国文坛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苏联的普罗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一次大宣传、大引进。其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这场论争也暴露出了中国年轻的左翼文艺界的一些严重弱点，如队伍中存在的团结和小团体主义，作家和作品都脱离群众等。要使革命文学运动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杜国庠以林伯修的笔名在1929年3月28日《海风周报》第12号上发表了《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以下简称杜文），这对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究竟急待解决的是那些问题呢？

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底问题。”“它是普罗底一种武器。它要完成它作为武器的使命，必得要使大众理解，‘使大众爱护，能结合大众的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这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同时，也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根据。因为普罗文学，如若不能达到使大众理解底程度——大众化，它便不能得到大众的

爱护，便不能结合大众的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学而从它的意德沃罗基底支配之下夺取大众呢？”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以后工农大众已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新文学运动的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工农当中去。20年代初关于“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以及“到民间去”的号召在文艺界的回响，说明有的作家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却偏重于“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至于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去适应民众的要求，几乎还没有人提到。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如果文艺“低就民众”，“不啻是艺术的自灭”。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简略地追踪了“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发展，扬弃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发展到普罗文学的开始。杜文首先及时而明确地提出“文学底大众化底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杜文分析了中外革命文学的读者情况，指出，在中国，革命文学“对于一切的读物底读者总数看来，那无疑地是很狭小的。（这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的原因，不能通通由作品本身来负责的。）”这种情形，不但中国如此，日本美国等也是如此。在日本的一个大印刷厂中，60%的劳动者的日常读物，都是讲英雄侠客忠臣孝子一类的东西，读任何社会主义方面的杂志的人，不过1%而已。就是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了十年的苏联，也没有较好地解决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许多作家只致力于作为文化较高的普罗上层分子而创作。

杜国庠认为，中国新文学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不能单靠一般抽象的理论，而主要的要靠普罗作家艺术实践的发展。对此，杜文提出了在讨论中应该注意的几个根本观念：

首先，不仅要注意文学自身的本质，而且尤其要注意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客观要求与条件。

其次，普罗文学的大众化，不但在文字上要力求浅显易懂，而且必须把握普罗的意识，用这种意识去观察现实，描写现实。为此，“作家自身的生活便应该普罗化”。在当时中国几乎还没有普罗出身的作家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三，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复杂，普罗文学所要接近的大众，不是笼统的所谓“大众”，“而是指那由各个的工人、农民、兵士，小有产者等等所构成的各种各色的大众层”。

第四，文学大众化的目的，在于提高大众的思想意识，“以期达到普罗的解放”。所以其作品不仅要为他们诉苦，“紧要的

是要明显地或暗示地写出他们这些痛苦的由来，他们在历史进展过程当中的命运和其所负的使命，指示给他们以出路，鼓舞着他们的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使他们走上历史所指示的革命底光明大道上去。”这是普罗文学的根本立场。

第五，普罗文学的大众化，“应该先把大众所爱护的文艺的形式细心地研究着，批判地接受过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普罗列塔利亚写现实主义底建设问题，”也就是新写实主义问题。

杜国庠认为，“1928年所发表普罗文学的作品，是很少能够使我们十分满意的，有些是由于过去的浪漫色彩的残留，有些是由于没有完全摆脱旧式小说的窠臼，有些是由于没有深入群众，不能了解他们日常的生活而只为轮廓的描写，结局，遂不免陷于公式地概念地描写的缺点……。一句话说，这些都是形式与内容不相调和的毛病。”要克服这些毛病，作家们就要“坚决地站在普罗列塔利亚写现实主义的立场”，“站到普罗哲学的立场——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来，”建设新写实主义，这样才能“离去一切主观的构成，于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来观察现实，描写现实。”

第三个就是“艺术底二重性问题。”

杜国庠所谓艺术运动的二重性，即作品的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认为“普罗文艺运动是普罗斗争的一种方式，它和政治运动一样地是阶级解放所必要的东西。它与政治运动是有着内面的必然的联络，所以它必须与政治运动合流。”

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真正解决，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是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

座谈会召开以后的事，但杜文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而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杜文几乎都已提到，可以说，杜文是文艺大众化的先声。

杜国庠发表此文决不是偶然的。

大革命失败后，杜国庠于1928年1月由潮汕经香港转赴上海，2月，即由阿英（钱杏邨）与蒋光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积极投身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1929年8月底之前，他已翻译发表了好些苏、日左翼作家的作品。1928年7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第七期上，发表了他的译作《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日·藏原惟人）。1928年8月20日出版的《我们》月刊第三期，发表了他的译作《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的发展》（日·田口宪）。从1929年1月1日出版的《海风周刊》第一期，到1929年1月27日的第五期上，连续发表了他的译作《理论与批评》（苏·高根）。《海风周报》第五期还发表了他的译作《俄罗斯文学》（苏·高根）。1929年1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发行了他的单行本译著《旧唯物

论底克服》（佐野学）。1929年2月10日《海风周报》第六、七期合刊，发表了他的译作《关于文艺批评的任务之纲领》（苏·卢那查尔斯基）。1929年3月10日与17日的《海风周报》第十期与第十一期，又连续刊载了他的译作《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日·藏原惟人）。他是在充分研究了苏、日的革命文艺理论之后，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结合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实际，才写出《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

1929年秋，我党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杜国庠是文委成员之一。他积极筹建“左联”，出席了“左联”成立大会。随后，他遵照党的指示，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又发起组织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此后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

作者单位：广州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杜国庠主要著、译年表

熊泽初 黄学盛

篇 名	署 名	发表日期	发表报刊	备 注
咨议局经过大事记	杜国庠	1909.10	《宪政新志》第1卷第2号	吴冠英主编
咨议局记事	杜国庠	1909.11	《宪政新志》第1卷第3号	
列国国产税制度概要	杜国庠	1909.11	《宪政新志》第1卷第3号	
列国国产税制度概要	杜国庠	1909.12	《宪政新志》第1卷第4号	
咨议局记事(续完)	杜国庠	1909.12	《宪政新志》第1卷第4号	
列国国产税制度概要	杜国庠	1910.1	《宪政新志》第1卷第5号	
耶里匿克氏宪法变化论	杜国庠	1910.2	《宪政新志》第1卷第6号	日·美浓部达吉著
我之新银团观	杜国庠	1919.12.1	《新青年》第7卷第1号	
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	杜守素	1924.1.4	《孤军》第2卷第2期	与李春涛合著
列宁与第三国际	杜国庠	1924.4.10	《社会问题》创刊号 ——列宁纪念号	由平民大学出版部出版
马克思之所谓意识形态经济	杜守素	1926.10.17	《金中周刊》第142期	日·河上肇著
牢狱的五月祭	林伯修	1928.5.1	《太阳月刊》第5期	日·林房雄著
一束古典的情书	林伯修	1928.5.20	《我们》月刊第1期	日·林房雄著
废人	林伯修	1928.6.1	《太阳月刊》第6期	(苏)塞甫琳娜著
波支翁金·搭布列车斯基	林伯修	1928.6.20	《我们》月刊第2期	(日)藤田清雄著
到新写实主义之路	林伯修	1928.7.1	《太阳月刊》第7期	(日)藏原惟人著
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的发展	林伯修	1928.8.20	《我们》月刊第3期	(日)田口宪著
理论与批评——无产阶级文学论末章	林伯修	1929.1.1~6	《海风周报》第1—2期	(苏)高根著
理论与批评(续)	林伯修	1929.1.13~20	《海风周报》第3—4期	
理论与批评(续完)	林伯修	1929.1.27	《海风周报》第5期	(苏)高根著
俄罗斯文学	林伯修	1929.1.27	《海风周报》第5期	
旧唯物论底克服	林伯修	1929.1	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日)佐野学著
关于文艺批评的任务之论纲	林伯修	1929.2.10	《海风周报》第6、7期合刊	(苏)卢那查尔斯基著
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	林伯修	1929.3.10	《海风周报》第10期	(日)藏原惟人著
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续)	林伯修	1929.3.17	《海风周报》第11期	(日)藏原惟人著
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	林伯修	1929.3.23	《海风周报》第12期	

续上表

篇 名	署 名	发表日期	发 表 报 刊	备 注
艺术之社会的基础	林伯修	1929.4.21	《海风周报》第14、15期 合刊、第17期	(苏)卢娜查尔斯基著
无产阶级文学论	林伯修	待 查	待 查	(苏)高根著
炭矿夫	林伯修	待 查	待 查	德国独幕剧
艺术论	林 柏	1929.4.80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苏)蒲列汉诺夫著
无神论	林 柏	1929.5.4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日)佐野学著
史的一元论	吴念慈	1929.6.27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苏)蒲列汉诺夫著
社会学的批判	吴念慈	1929.9.25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亚色列罗德著
金融资本论	林伯修	1929	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日)猪俣津南雄著
俘虏	林伯修	1929	上海晓山书店出版	译文,原作者待查
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	林伯修	1930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苏)德波林著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吴念慈	1930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乌达诺夫著,与 柯柏年合译
新术语辞典	吴念慈	1930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与柯柏年、王慎 名合编
国家的本质——国家与法律 第一章	林伯修	1930.6	待 查	社会科学讲座
罗马会见与华盛顿谈话	林素庵	1933.6.1	《正路月刊》第一期	
世界经济会议开幕前后	林素庵	1933.7.20	《正路月刊》第二期	
经济学辞典	吴念慈	1933.11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与柯柏年、王慎 名合编
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	杜国庠	*1937.4.20	收入《杜国庠文集》	
昔日孤岛已变成了死尸	念 慈	1942.4.11	《新华日报》	
二千余年前杨王孙的裸葬论	杜 惑	1943.2.25	《新华日报》	
形与神 其一	杜 惑	1943.4.30	《新华日报》	
形与神 其二	杜 惑	1943.5.5	《新华日报》	
——三国杨泉的形神观				
形与神 其三		1943.5.6	《新华日报》	
——范缜的神灭论				
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	杜 惑	1943.5.24	《新华日报》	
——读《孟子字义疏证》				
红棉屋札存	林 柏		收入《便桥集》	
一、“六经注我”		1943.6.16	《群众》周刊第8卷第10期	重庆版
二、天上与人间		同 上	同 上	
三、“以天地理天地”		1943.7.16	《群众》周刊第8卷第11期	
四、“不可破句读书”		同 上	同 上	
五、太极原义不指本体		1943.8.31	《群众》周刊第8卷第13、14 期合刊	
六、“断章取义”与“还而 体会”		同 上	同 上	
七、《墨经》的“存”不同于 《公孙龙子》的“藏”		同 上	同 上	

续上表

篇 名	署 名	发表日期	发表报刊	备 注
八、名实		同 上	同 上	
九、譬喻		1944.2.25	<群众>周刊第9卷第3、4期合刊	
十、有无、同异、与类		同 上	同 上	
十一、<墨经>的时空观		同 上	同 上	
十二、以某某还某某的校书法		同 上	同 上	
十三、“诗者，持也”		*1957.11		
十四、中间路线的悲哀		*1957.12	收入<便桥集>	
十五、也谈“事后诸葛亮”		*1958.7	收入<便桥集>	
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	杜守素	*1943.9.3	收入<先秦诸子批判>	
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侧面	杜 惑	1943.11.1	<群众>周刊第8卷第18期	重庆版
论<公孙龙子>	杜守素	*1943.11.12	收入<先秦诸子批判>	
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		*1944.10.1	收入<先秦诸子批判>	
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	林 柏	1944.10.31	<群众>周刊第19卷第20期	重庆版
论荀子的<成相篇>	杜守素	*1944.11.12	收入<先秦诸子批判>	
——介绍两千多年前的一篇通俗文学				
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	杜守素		收入<先秦诸子批判>	
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林 柏	1945.12.25	<群众>周刊第10卷第24期	重庆版
玄虚不是人的道路	林 柏	1946.1.15	<群众>周刊第11卷第1期	重庆版
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	杜国庠	*1946.5.18	收入<杜国庠文集>	首刊<中国学术>季刊创刊号
从荀子<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	杜国庠		收入<杜国庠文集>	
荀子对诸子的批判	杜国庠		同 上	
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	杜国庠		同 上	
杂家言之作始者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杜国庠		同 上	
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论	杜国庠		同 上	
杨泉的水一元论	杜国庠	*1946.9	收入<便桥集>	
范缜的唯物思想	杜国庠		收入<便桥集>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及思想动向	杜国庠	*1948.3.20	同 上	
魏晋清谈及其影响	杜国庠		同 上	
论“理学”的终结	杜国庠		收入<便桥集>	
“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杜国庠		同 上	
墨家的逻辑也没有和认识论分家	杜国庠		同 上	
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	杜国庠	*1948.6	同 上	
关于“因明”	杜国庠	*1948.9.22	收入<杜国庠文集>	
墨经的逻辑思想	守 素	1949.2.3	<群众>周刊第3卷第6期	香港版
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文告	杜守素	1949.7.16	<光明报>	香港出版

续上表

篇 名	署 名	发表日期	发 表 报 刊	备 注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革命发展的纲领 毛泽东思想的结晶 辩证唯物论参考资料	杜守素	1949.7.28	《群众》周刊第8卷第81期	香港版
	杜国庠	1950.8	广州市公私立大专院校教师 暑期研究会	
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 要学好《实践论》应该“学点 逻辑”	杜国庠	*1958.5	收入《便桥集》	
	杜国庠	*1959.9	收入《便桥集》	
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	杜国庠	*1959.9	收入《便桥集》	
先秦诸子批判	杜守素	1948	上海作家书屋	
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此为 上书再版）	杜国庠	1955.10	三联书店	
先秦诸子思想	杜守素	1949.6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出版社	（以下为专著和 论文集）
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此为上 书再版）	杜国庠	1958	三联书店	
便桥集——哲学论文集	杜国庠	1960.3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杜国庠文集	杜国庠	1962.7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思想通史》（第1—3卷）	侯外庐、 赵纪彬、 杜国庠等	195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注：有·号者为完稿日期。

有此一说：“应用哲学”即“无哲学”

姜建强对“应用哲学”提出批评：

所谓“应用哲学”丢弃了哲学的根本要素——以反思为思维特点的本质特征和以超越现实为已任的基本功用。

本刊记者石成报道：针对当前哲学现代化的讨论出现的一种“应用哲学”说法和尝试，上海学者姜建强提出批评。姜认为：

“应用哲学”取消了 哲学思维的特点

哲学之所以是哲学而不是其他，就在于它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与最高抽象，这是哲学的本质特性。抽取了这一哲学特性，哲学就不复存在。黑格尔大加赞赏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说它是真正哲学的开端，正是在于毕氏扬弃了具体可感的事物，用高度抽象的数完成了从“实在哲学到理智论哲学的过渡”，把事物的本质“设想为一个逻辑范畴”。（《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17、287页）短短五千字的老子哲学，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就在于老子哲学有着不是一下子就容易读懂读透的抽象、深刻的思辨力量。老子提出“道”这一哲学最高范畴，表明人类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而“应用哲学”之所以不能成立，不是说各门具体科学中不存在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而

是说它把具体的科学随意戴上哲学帽子，用各门具体科学的思维特点来代替哲学的思维特点，把哲学的特点和功用仅仅局限于它如何“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中；于是产生了诸多的概念不清的技术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人才哲学等应用哲学。而仔细推敲、分析这些应用哲学，无非就是技术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和人才学等具体学科的理论，硬贴上哲学的标签。粗粗一看，“应用哲学”似乎解决和摆脱了哲学抽象玄深的“通病”，确实具体化了、可感觉化了，也“物化”了，然而，也同时取消了哲学思维的特点，取消了反思，取消了真正的哲学。这正如黑格尔曾批评雨果·格老秀斯把搜集到的历史上国家对国家行为的材料加以比较，提出一些普遍原则，然后就声称这是“国际公法哲学”。黑格尔说，这并不能叫做“哲学”，只能叫“经验科学”，因为只有“思想才配称为哲学”。（参阅《小逻辑》第46—47页）

“应用哲学”把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简单化了

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十分明了的问题。哲学必须而且应当是现实的反映，必须而且应当为现实服务。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认为，哲学所关注、期待、反映的现实，并不是直接当下的那个现实，而是永恒的现实。哲学是用它反思的认识形式来印证现实的。这也就是说，哲学为现实服务并不总是表现在，外在地为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去直接论证、推断出什么结论，也不是从现有的哲学原理中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它只是以其自身的存在、自身的特点去印证、把握整个时代。哲学对现象的指导，是通过现实的穿透、超越而达到的，从而引导时代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指出：“简言之，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小逻辑》第48页）马克思才断言，“哲学是时

代精神的精华”。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哲学、19世纪的德国哲学，都曾成功地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恩格斯语）马克思光辉的历史哲学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表现了他对1848—1851年革命爆发后法国现实的“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才能。总之，站在现实生活之上去把握时代精神，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与现实问题的本质所在。但是，“应用哲学”所强调的“应用”和对现实的反映，或者是现实的形势和政策解释，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老三论”、“新三论”）直接搬来随便戴上一顶哲学帽子，有些所谓“哲学思考”，作者所分析、思考的都是具体科学或现行政策的事，并不是哲学的事。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什么都是哲学，结果反而没有了哲学。这样一来，“应用哲学”从根本上把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了。

责任编辑：日知



王新知 张劲帆大胆反思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受到质疑

知识分子的定义、历史演进、文化心态、社会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也被提到学术理论上进行探讨，有人预言，又一门新学科——“知识分子学”即将诞生。

本刊记者晨一报道：反思之风刮到了又一个新的领域——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十年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拨乱反正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最近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一论断是70年代末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过去“左”倾错误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而提出来的，它对清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许多遗留问题，对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高知识分子的现实的政治地位，起过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因此，从其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政策性的口号来看，效果是显著的。但从严格的理论科学上看，这一论断并不严密、准确，它是由传统的阶级分析法推导出来的，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的产物。这一论断不仅很难准确地概括我国全部知识分子的现状，并且还给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留下了一些“两难”的理论困惑。

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王新知指出，“工人阶级”一词，其内涵并非无限制的，它无法囊括所有知识分子。其一，从知识分子同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看，有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些则不可以。其二，有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同社会大生产的关系并不密切。其三，从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来看，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他们的劳动特征与一般工人阶级很不相同，混为一谈，便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劳动差异。其四，鉴于知识劳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知识分子的劳动日益与一般工人劳动呈现不同的特征和作用，以“工人阶级”来涵盖知识分子，无法区别二者各自的特殊作用。若要求进一步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这一论断就很难作为理论的依据。

另一位质疑者张劲帆认为：“一部分”的论断，只是单纯从政治角度来确认知识分子的地位、归属，而没有从社会主义条

件下社会生产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利益。他提出，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划分社会主义的社会群体，这就是用社会集团理论来涵盖或扩充原来的阶级理论。若以这一新理论方法来划分，知识分子阶层就应被视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独立的、基本的社会集团（或群体）。它与工人集团有差异：一是它与工人的劳动性质和劳动方式有明显不同；二是它与工人在社会生产体系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三是它与工人的社会作用不尽相同；四是它与工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有具体的利益区别。它与工人集团也有相同性：一是它与工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是一样的；二是它在社会生产体系与国家政治结构中越来越具有与工人集团同等的重要性。

显然，这些质疑者在立论上还未能

十分充足完善，因此，他们的看法是否能得到更多学者的赞同尚未知晓。但他们毕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记者获悉，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这方面的专题会议、研究文章以及话题已日益增多。研究的议题，已涉及知识分子的定义、历史演进、社会角色、文化心态、经济地位、政治作用、物质待遇，等等方面。一位对此颇有兴趣的学术界人士预言，知识分子问题从现实走向理论，很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学”这类新的专门学科。它的产生的现实基础当然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方面尚有许多问题等待人们去认识，去解决，而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历史的载体，它本身成为一门知识也是符合逻辑的。

责任编辑：日 知



“《文心雕龙》88’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龙学”已成为东方文化新“显学”

本刊记者陶原珂、刘绍瑾报导：1988年11月，“《文心雕龙》88’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日本、苏联、意大利、瑞典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60多人与会。会议共收到50多篇论文和6部专著。

从黄侃1914年把《文心雕龙》搬上北大讲坛以来，“龙学”已有70年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近十余年来，“龙学”研究发展很快，仅大陆已出版专著80多种，其中理论研究著作明显增加，以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影响最大，并出现了集注性的著作，如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正》、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论文则达800多篇。研究方法有很大突破，微观与宏观相融汇，出现了美学、心理学和系统研究等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龙学”正日益获得各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止，日本、朝鲜、新加坡、美国、苏联、法国、匈牙利等国学者已出版和发表专书和论文120多种（篇）。并已出版《文心雕龙》的日译本和英译本，法译本也将问世，意大利语译本的工作也在进行之

中。港、台两地学者更是把“龙学”看作“显学”，近30多年来已出版《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40余种，发表论文200多篇。

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道”的理解、《文心雕龙》的体系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对于《原道》中的“道”，与会者中以“道”为本体论者居多，但持论各有细别。张文勋从儒、道、佛合流的角度去考察，认为《原道》篇是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提出“自然之道”的概念的，其所谓“神理”、“道心”、“神道”等等，近似“绝对理念”、“宇宙精神”之类的东西，整个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道之文”，一切文化现象（包括文学）也都是“道之文”。道、圣、文转换的论式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蔡钟翔则从中国古代宇宙论入手，认为刘勰的原道论是从道一元论中推演出来的，以为宇宙万物存在着全息对应关系，“天道”与“人道”具有同一性，因而从宇宙本体论之道也能推演出文学之道。周勋初则认为王弼《易》学对刘勰的影响至大，刘勰自然之道说带有明显的玄学色彩，《原道》篇提到文“与天地并生”，道外化为物，有其物即有其文，依据的是王弼

《易》学中的体用如一之说。王元化也认为“道”实际上就是本体，从宇宙构成论来说，《原道》篇的骨干以《周易·系辞》为主，至于谈道而说德是受老子的影响。曹础基认为《原道》中之“自然之道”所反映的自然观源于老庄而又别于老庄，前者倡导的自然观是文学层的，在于纠正文风之雕刻艳藻，后者倡导的自然观是哲学层的，在于纠正人性的扭曲。由于刘勰的自然观以老庄之自然观为外壳，以汉儒的自然观为内壳，所以《文心雕龙》圆通宏深，成为中国古文论的基石。

关于《文心雕龙》的体系性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徐中玉指出，《文心雕龙》所称的为文之“本”是举要治繁，“以少总多”，“一言穷理”，其类比的观点和实践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这种有哲学深刻性而非哲学化的表达方式，使整部《文心雕龙》辞约义丰。然而，虽然《文心雕龙》体系完整，条分缕析，推理严密，但中国古代文论家却似乎并不重视，而只是较多倾向于直觉直感，形象体验。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不少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虽然没有刘勰那样有体系的理论专著（大概只有哲学、史学的《墨子》、《史通》

等可与之比较），但理论系统还是有的，这与评论家的写作方式有关。诗话是形象化的评，而《原诗》就较有系统，《文心雕龙》则是在大量阅读评的基础上概括出形象化的表达方式。虽然《文心雕龙》的逻辑和系统不同于西方的逻辑系统，但肯定是有。王元化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虽然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不讲形式逻辑的，墨子的三表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也不是就不可以有自己的逻辑思维特点的，比如印度有因明的逻辑思维方式一样。魏晋破除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出现了玄学，提供了很多思辨的东西，如三治论法。魏晋以后，曾随佛教的传播引进过一些逻辑书，如北魏孝文帝时传入的《方变心论》、公元500多年的《回证论》，后来玄奘译过一部因明学（《因明与证理论》），但宋元之交亡佚，清代才又从日本传回。刘勰之后因明学的中断，可能与唐代奉佛批佛之风、对名辨之术的否定都有关系。总之，可以肯定《文心雕龙》是把文艺理论、文学史论相结合的、有较严密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著作。我们应该先找出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逻辑方式，然后讨论它对艺术理论、文艺理论的意义。

责任编辑：日知

解决我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吴 光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虽然不很发达，但却能对知识分子实行比较优惠的政策，为他们提供可以充分发挥才智的良好环境；如果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受歧视，经济生活上得到保障，心理感受上自由开朗；那么，这个国家即便有知识分子问题，它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社会问题吗？大概不至于吧！

知识不受尊重的三种效应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知识的拥有者。但这个定义很不全面，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一般是指那些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拥有在现代认知条件下相对说来是比较先进、比较丰富的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人可能是政治家，但主要的还是那些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拥有先

进、丰富的知识，就理应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而国家也理应为知识分子的服务提供尽可能方便的条件，并给予较优厚的报酬。这个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却完全不懂，或者只懂前半一半。他们或者把知识分子当作威胁自己权利的异己力量加以防范或批判，或者当作可依靠手中权力给予恩赐的对象，让知识分子感谢、服从和崇拜他们的权威，

否则，他们就可能随时收回他们的恩赐，剥夺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的正当权利。于是，在知识分子中就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消极无为、牢骚不满的心理情绪。这种心理情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于知识分子的“名利欲”引起的，而是因为知识分子苦于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来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产生的消极反应，大概可称作“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知识压抑效应”吧！

也有一些人，在理论上、实践中都不懂得或者不想懂得知识分子的劳动性质及其价值。他们是“左”得可爱的“平等主义者”，以为知识分子既然是社会中一个普通劳动者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自然应当在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上和其他劳动者如工人、店员一样“一律平等”。当国家决策者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为知识分子定职称、加工资时，就遇到极大阻力，就有人出来为干部、工人、店员鸣不平，非要把知识分子的待遇与干部、工人拉平不可，似乎不拉平就不是社会主义，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原理，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了。于是乎，近年来就出现了各行各业互相攀比加工资、评职称的现象，什么“管理讲师”、“政工教授”之类的名目就出笼了。弄来弄去，一个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知识分子的工资，往往不如与他曾经同学、现在同龄的初中毕业的工人工资高，更不用说实际收入远不如同龄工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要区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吗？不是主张“按劳分配”，认为工资的国民差异是与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有关的吗？在一个经济上不发达、国民文化水准差距很大

的国家里，如果硬把知识分子的劳动与一般干部、工人的劳动同等对待，在工资（现在仍是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政策上采取互相攀比、一刀切的做法，难道不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吗？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降低知识的价值，也必然阻碍着知识分子劳动积极性的发挥。这实际上是一种小生产式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是不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这种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产生了“读书无用论”，或可称作“知识无用效应”。

知识分子有知识，有知识便有思想，有思想便有个人的独立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就希望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当局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允许其见解自由发表，就不仅使知识分子感到心情舒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见解将有助于政治的清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即便是错误的、有害的见解，只要当局者清，“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弃之”，那也是无碍大局，不至于“天下大乱”的。反之，如果压制知识分子独立见解的发表，知识分子就会与当局离心离德，甚至公开对抗。尽管“胳膊扭不过大腿”，知识分子在对抗中会吃眼前亏，但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吃大亏的不恰恰是国家和民族吗？以往的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本文毋庸赘述。我把上述现象称之为“知识反抗效应”。

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之一瞥

建国以来近40年间，我国知识分子确有受到尊重、心情舒畅的时刻，也确有受到压抑甚至迫害的时刻，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来说，在50年代前期、60年

代初期，尽管也有不如人意之处，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是受到尊重的，其精神感受也比较舒畅明快，工作热情也是高涨的；而在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确有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了歧视和迫害，这已成为历史，毋庸讳言了。自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9年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确实发生了重大转折。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舆论的尊重和政策上的照顾，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学术研究领域，现行政策基本上是开放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外学术交流也比过去自由、开放得多了。这不能不承认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战略上的历史性进步。

然而，由于历史积弊的遗留、僵化思想的作祟和传统习惯势力的阻碍，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还远未达到圆满的解决。现在，不少人思想深处轻视脑力劳动、歧视知识分子观念还没有根本扭转，知识分子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还发挥得很不够，其经济生活待遇还有待于大幅度的改善，我在前面谈到的三种消极的“知识效应”还有存在的土壤和气候。

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针对上述情况，那么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战略对策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如下三点是应该强调的：

一是政治民主化。若与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民主的，若与马克思主义者理想

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相比，中国现在的民主制度又很不发达。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只有在高度民主化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他们的知识和才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首要问题是实现政治民主化。这也是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是学术自由化。一讲民主和自由，我们有些人就神经过敏，视若洪水猛兽，必欲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加以批判而后快。这其实无异于“杞人忧天”。须知，一个理性的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向着更高级的民主自由方向发展。民主和自由，这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也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世界潮流之所向。而学术自由，却是整个社会现代化、民主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学术自由化程度愈高，则它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也就愈高，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就愈加尊重，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自觉性也就愈高。

“学术自由”的口号与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来并不矛盾，问题在于过去并没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往往是一花独放，无人争鸣，学术自由往往受到压制，至少在1957年至1978年间是这样。而压制学术自由的结果，不但严重阻碍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和繁荣，而且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使他们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最终是阻碍

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如果要真正实行学术自由，就应允许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允许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开展公开争论，容许相互批评，当局不要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政见而采取行政压制手段，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要因为别人批评了自己的观点而手足无措，鸣冤叫屈；在学术上应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交流中，只有真理与谬误之分，而不应在东方西方、大国小国、党与非党之间划分禁界。我们既然可以对美国、西欧、日本开放，为什么不能对东欧、苏联开放？我们既然可以经济上对外国开放，为什么不能文化学术上实行开放？在当今世界潮流中，只有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才是明智的，闭关锁国或半开半闭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三是知识产权化。这在西方国家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在中国却有进行普及教育的必要。因为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观念实在太淡薄了。在大陆，如果有人主张维护知识产权，提倡“知识即商品”的观点，甚至可能会遭到不少人的攻击或嘲笑呢！其实，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就象农民拥有土地、工厂拥有机器一样是对资源的占有，不过知识只是一种特殊资源即精神资源罢了。一旦把精神资源化为产品，即知识产品，它也就成了某种财富，不过这种财富具有特殊性质，即它只有在对社会发生作用时才能变为财富。如果一个人的知识没有化为对社会有用的知识产品，则它充其量只是潜在的资源，而不是财富。知识只有在以某种形式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价值，而知识产品为社会服务的途

径可以是直接的（如画家卖画、教授讲课），也可以是间接的（如作品经报刊、出版社发表后提交社会），因此，其产权或纯属个人所有，或既属社会集团又属个人所有，但无论如何，拥有知识并使之化为知识产品的知识分子应是第一产权人。现在的问题是，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原因在于：一是国家缺少具体明确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令、法规；二是在理论上不承认知识产品也是商品；三是虽然在实际上承认它是商品，却又人为地贬低其价值，违反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要真正达到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步，实在还有必要从理论上、法理上阐明知识产品的产权及其作为特殊商品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知识人才的合理使用和自由流动的问题。

知识人才的形成，一方面是国家培养、社会教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奋斗分不开。如果离开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恐怕任何人也成不了才。因此，知识分子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应当自觉考虑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服从国家总体利益的需要，那种凭借知识一味追求个人享乐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人才”是不足取的。但同等地接受国家和社会培养教育的人，其所掌握的知识和对社会的贡献差别很大，这是同成才者的天赋及在成才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密切相关的。因此，国家应当充分尊重知识人才的个人特长，视其能力大小和贡献多少付给报酬。

在我看来，我国现行人才管理制度至少有两弊病：一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管理和使用统得太死，过分强调国家的计划

或领导者的意志，而不太尊重知识分子的个人意愿和特长，其结果，形成了一种非常僵化的“人才单位所有制”，每个用人单位都把自己当作国家利益、国家意志的代表，从而阻碍着人才的流动，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二是由国家硬性规定统一的工资级别和统一的晋升资历，缺少鼓励竞争的机制和手段，结果形成了论资排辈的职称晋升制度和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再加上知识分子低薪制的消极作用，结果是严重阻挠着特殊人才脱颖而出，并造成高级专业人才的外流（流向国外）现象，从而损害了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利益。纠正上述弊病的对策，我认为也有两条：一是在由国家宏观控制国营单位的工资增长总额的条件下，取消现行论资排辈式的专业技术职称管理制度，建设一种提倡竞

争、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二是打破平均主义的薪金制度，对高级专业人才实行高薪制，用竞争的办法稳定本国人才，招揽外来人才。诚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不可能实行象日本、美国那样的高薪制，但在科技落后、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实行高级专业人才的高薪制，恐怕是利大于弊的。

应当相信，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的，是愿意用自己的知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尽心竭力的，只要国家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特长和权益，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才管理制度，清除那些压制、扼杀人才的积弊，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会继续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是充满希望的。

责任编辑：日知



本文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继续。作者认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种低级的特殊的类型。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 的重新认识问题

陈 胜 彝

一、必要性

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重新讨论、重新认识，并不意味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基本认识重新否定。因为，这种基本认识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反复验证的，总的来说，它还是正确的。然而实践同样证明：人们的认识总是要受到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则还将不断地向前发展；实践的成功与失误总是会引导人们检讨和加深原有的认识，现实与未来的挑战又将不断地推动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如果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曾经有力地推动人们通过检讨中国革命的起源，对近代中国社会获得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并据此制订革命策略，有效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那么，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特别是追求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实践，又不断地推动和要求人们继续深化和丰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因此，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讨论、重新认识，不但是否定或抛弃原来的基本认识，而且，正是要求以这种基本认识为基础，通过对近代中国的国情，作更进一步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总体考察，把这种基本认识深化和

丰满起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断追求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尽管在1949年争得了独立，但富强、民主和文明，至今还在奋斗争取之中。何况，富强、民主、文明与独立是一个整体，相互制约，紧密相连。近代中国是当代中国的昨天，昨天的社会面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状态以及那个时期发生的种种情况，与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与未来，依然息息相关。开放改革、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统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因此，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重新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决在1949年取得民主革命的决胜性胜利后，反帝反封建方面仍需进一步解决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在各个领域继续维护祖国独立地位的任务和仍需从各个领域大力深入开展的反封建任务；而且，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清醒、更自觉地把追求富强、民主和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担负起来。可见，我们今天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比之20、30年代以探讨中国革命起源、明确中国革命道路为主导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了。由于它直接涉及到如何估计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如何估计近代中

国和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估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肩负的历史任务及其实现的程度，以及我们民族的发展前景等等，所以，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将为进一步解决“中国往何处去”——寻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样一个牵动近代以来几代人为之探索、奋斗的历史大课题，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继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近半个世纪内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发展较快，成果较多，并且在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与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系统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和“文革”后的10年反思，我们也发现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普遍存在于历史研究中的片面、孤立、割裂和绝对化等偏向外，最突出的是“两重两轻”的现象，即重感情，轻理性；重“为现实服务”，轻科学分析。这种现象与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总是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理论做文章密切相关。诚然，围绕半殖民地问题，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歌颂人民大众反帝反殖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感情与理性是相统一的。因为它对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至巨至大的“西方”的一个方面——野蛮的“西方”，作了本质的揭露；但是，由于对“西方”的另一面——先进的“西方”及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积极影响，却往往被忽视或低估，甚至被反帝反殖的民族感情所掩盖或冲淡。因而，往往只看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将之绝对化，只注重鞭挞侵略者的野蛮与卑鄙，忽视或低估这些侵略者在破坏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故凡“洋”必否，凡“帝”必批，甚至对诸如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等与中国走向近代化背道而驰的现象，也盲目歌颂。同样，在围绕半封建问题做文章时，对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腐朽集团外则卖国投降、内则镇压民众的罪行严加谴责，感情和理智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分化、演变，往往缺乏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地主阶级改革派、开明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常常被忽视或低估。因而，往往只看到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并将之绝对化，笼统地把地主与农民两大阶

级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或夸大地主阶级改革派、开明派本质上和农民阶级仍处于对立地位的一面，冲淡或否定其追求独立富强、向往近代民主、文明的进步一面，甚至凡“农”必是，凡“封”必非，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因此，就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而言，有必要突破以往总是围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做文章的旧框架，开创新的格局，研究新的课题，使之建立在理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对以往围绕“反帝反封建”在各个领域展开研究的旧课题，如何拓宽加深，以便修正旧观点，做出新文章，亦大有裨益。

二、方 法

理性地、科学地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进行重新认识，首先要求方法上有所突破。这里，着重谈谈如何运用总体研究、综合考察的方法，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问题。

一是要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长河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形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自进入私有制阶段后，都不可避免要经历两个大的过渡时期，即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从中世纪向近代——现代化的过渡。相应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来说，就是从古代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中国，第一个过渡时期是在春秋战国前后；第二个过渡时期是在明末清初以后，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直至现在。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明末清初是酝酿期，1840—1949年是前期，1949年以后是后期。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前期而已，即处于追求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时期，也就是封闭的“中国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的时期。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作出科学的认识，就不能脱离对这一阶段前前后后的了解。因为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是环环相扣的。只有把扣住近代中国这一中心环节的前环（明末清初以后的酝酿期）和后环（1949年后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对近代中国这一中心环节的基础、现状和前景，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才能比较确切地估量近代中国这一中心环节从前环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为后环提供了什么，在中

国历史进程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历史任务，起到了什么样的过渡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等等。从而，科学地判断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及其特征。

二是要在世界近代史的历史范围内、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形态。

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新兴资产阶级为着开拓世界市场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世界于是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从1840年以后，中国也被卷进了世界政治、经济旋涡，成为整个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之中；因而，其发展亦不可脱离近代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只有把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放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恩格斯语）才能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或从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角度，看到世界对中国的影响，看到中国在近代的变化及其与近代世界的联系，看到中国如何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如何从闭关自守走向世界，如何从封建主义逐步走向资本主义。同样，只有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才能科学地、理性地把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事变提到近代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改变那种以感情代替理智的狭隘观点，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侵略性和先进性，及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多方面影响，给予客观的、全面的评估。

三、特 征

目前，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作出一些初步概括：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畸型发展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处于从中世纪向近代——现代化过渡的前期的社会。

从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和殖民主义色彩的、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从上述两个角度所作出的概括，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的。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主要特征，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

1. 我们之所以把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归入五种社会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形态，并以此丰满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是因为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外扩张，西方资产阶级“把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把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把东方从属于西方”。（《共产党宣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就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被迫卷入并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近代东方社会形态之一。强调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在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根本任务，在于跟上世界潮流，改变从属于西方的地位，实现中国的近代、现代化——从资本主义近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认识，曾经有效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是为实现中国近代化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而非最终目标。因此，强调近代中国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反帝反封建的目的性认识，更自觉地把实现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肩负起来。

2. 我们之所以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又强调它“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和殖民主义色彩”，并以此丰满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则因为近代中国社会，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很明显，彻底清除渗入近代中国毛孔肌肤的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色素，比之在政治、经济领域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要困难得多。因此，强调近代中国“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色彩”，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更清醒地认识，在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外无独立，内无民主”问题基本解决后，仍然存在着如何维

护独立、实现民主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争取富强、文明的任务——这一任务曾因强调反帝反封建、追求独立、民主，而长期被掩盖或忽视。须知，没有富强与文明，独立与民主亦无保障。

3. 我们之所以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又继续强调它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无论国家地位，还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化，都不同于完整的封建社会和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从近代世界来看，资本主义是多种类型的，除了欧美那些典型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外，近代东方社会形态中，尚有象日本那样，经过自我改革，独立发展的、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还有象印度那样，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中国与日本或印度都不同，基础不同，发展前景也不同。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不必走印度道路，也不可能走日本道路，更不可能走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只能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类型的低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是，严格地说，“半殖民地”和“半封建”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个类型。过去，我们常常把“类型”和“形态”混同起来，以“类型”代替“社会形态”。两者的关系，似应称之为：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或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称之为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4. 我们之所以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是属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乃是根据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进程及其相互关系，对近代中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综合考察的结果。

生产力。近代中国从工业、农业到科学技术，从人的素质、劳动工具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其水平都相当落后。商品经济随着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发达的。总之，中国虽然从1840年开始进入了近代历史范围，但直至1949年，近代化的程度还是非常低的。

生产关系。在近代中国经济领域中，国际资产阶级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垄断了中

国的金融和财政，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革命运动的提纲》）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相勾结，并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官僚资本主义则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和帮凶；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得到独立的、正常的、充分的发展，也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尽管它在近代经济领域中，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过一定作用，但它却始终没有成熟起来，而且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极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它具有一种亦资亦封、半资半封、封中出现资、资中存在大量封的奇特现象。即：不少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时还保留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许多特征。不少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者，同时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代表者。他们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剥削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维持着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即使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中，也往往采用封建主义的方式来经营，大量地保存着封建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使这些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因此，严格地说，这些近代民族企业，既非完整的封建生产关系，亦非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典型地表现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特征。

上层建筑。上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决定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呈现一种不中（中世纪）不西（西方近代文明）、亦中亦西、半新半旧、新旧掺杂的奇特现象。即在近代政治生活中，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但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传统意识；新的机构成立起来，却不同程度地仍在执行封建统治机器的职能；“宪政”、“民主”和“法制”等不断被提倡，但结果总是为专制和独裁披上更美丽的外衣。从实质上说，封建专制主义并不是什么“幽灵”，它依然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总是最先进的意识和最落后的意识并存，最时髦的概念往往被用来作为表达旧思想意识的工具，先进的思潮与腐朽的意识形态相互混杂，落后的意识总是拉住甚至溶化先进的意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则引进很少，改装很多；扶植很少，压制很多；了解很少，恐惧很多；实事求是地分析

或观察很少,主观地肯定或否定很多。甚而,以封建主义的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去理解、接受西方各种制度和思想,结果往往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纳入到中世纪的旧框架中,民族化甚少,封建化甚多,以致不能形成真正的近代意识。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仍然在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

凡此种种,都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就其发展进程而言,已属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以此丰满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认识,有助于我们明确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尽管其后脚还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尚未完全拔出,但其前脚已跨入资本主义地带(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重心已经转移。我们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看成象欧美、日本那样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因为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并没有真空地带,近代中国随着其重心转移到资本主义一边,我们就应当把它归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范围。

第二、如果否认或抛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势必模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如果不把它丰满起来,看到它是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实现近代——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及其途径。认清它是没有充分发展的低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坚持“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可以由低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走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同上)

由此可见,重新讨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 “议院”与“民权”

李时岳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

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首倡“议院”的是洋务派官僚

洋务派官僚并不都是“议院”的反对者，而且，有的还是“议院”的首倡者。

1874—1875年间，清政府就如何加强海防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核心是怎样把“自强新政”推进一步。讨论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主张仿行西方的政教制度，特别是“议院”，认为这才是西方富强的根本。朱采提出“开言路”、“布公道”，要求学习“泰西各国，有所兴举，必君臣金谏而后行”的制度。^①广东巡抚郭嵩焘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②随后出使英、法，一再议论西方立国的本末，指出其本实在于“议政院”。^③洋务派领袖人物、总理衙门大

臣文祥对“议院”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驳斥那种认为西方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的说法，指出“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认为中国虽然难以照搬但“义可采取”。^④当然，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郭嵩焘因发表此类主张而丢官弃职，郁郁终身。文祥于1876年逝世后，不再有人敢向朝廷建议仿行，“议院”遂无下文。直到80年代初，由于边疆危机日益紧迫，“议院”问题才又被强调提起。

1868年，翰林崔国因以“国体不立，后患无穷”，提出包括“设议院”在内的10项自强之道，奏请“速筹布置”。奏折中，着重指陈“议院”在沟通上下之情、动员人民为国分忧出力方面的作用，强调“设议院”“为自强之关键”。^⑤他后来出使美国，仍一再奏陈“泰西富强之政，……其枢纽全恃乎议院”。^⑥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口授遗折，向朝廷陈述设“议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遗折写道：“夫西人立国，自有

本末，虽礼乐教化，远迹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居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以边患频仍，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变通图治。^⑦

至此，洋务派官僚的“议院”观已经成为内容明确、论点清晰、体系完整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上述人物属于洋务派是没有疑义的。因此，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是与事实不符的。

所谓早期改良派实为洋务政论家

通常所说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据说，这些人在爱国与卖国、企业官办与商办、主张与反对“议院”等三大问题上，和洋务派有着根本的分歧，从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反对派，维新派的前驱。前两个问题不能成立，近年的论著多有述及，无庸赘言。这里只谈“议院”问题。

在上述人物中，冯桂芬虽曾谈到中国“君民不隔不如夷”，但他随即指出“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就可以解决，用不着向外国学习，需要学习的“独船坚炮利一事耳”。^⑧这正是洋务派官僚在60年代的认识。他的《校邠庐抗议》可称为洋务思想之嚆矢。容闳致力于“教育救国”，是洋务派选派幼童留学美国的得力人员。薛福成讲“商政”和“用机器殖财养民”，对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起了推进作用。马建忠是洋务派培育的人才，

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并强调“富民”，与李鸿章的看法无异。他对“议院”颇多疑虑，指为“徒托空谈”、“贿赂公行”、“互为朋比”，态度并不积极。^⑨在中法战争以前，谈到“议院”而又持肯定态度的只有郑观应和王韬。

郑观应在1875年成书的《易言》中写有《论议政》一文，简略介绍西方“上、下议院”在“通上下之情”方面的作用，认为和中国“三代之制”相符，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以期“长治久安”。^⑩认识水平没有超过文祥。1884年，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臣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⑪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几乎都和张树声的遗折相同。

王韬的《重民》篇，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可以固国本、致富强。^⑫思想和结论和郑观应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和文祥、郭嵩焘等完全一致。

对照洋务派官僚的“议院”论，可以明确无疑地判定，把是否主张设“议院”作为所谓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分界线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两派中，对“议院”都有赞赏的，有迟疑的；态度有积极的，有消极的。赞赏者基本观点相同，主要是如下两点：

一、从国家富强出发，把“议院”作为

使中国振衰起弱的“富强之术”。他们从不涉及人民的权利问题，其“议院”是为了振“国权”而不是伸“民权”。因此，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几乎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也讲“重民”，其理论基础仍然是传统的民本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他们所说的“民心”，仍然是传统的“载舟、覆舟”的道理，讲求“治民之道”而不是“民治”。

二、“议院”的主要功能是通下情、备咨询。他们往往把“议院”比附于“三代之制”，反映出他们对“议院”的真谛不甚了了。他们从未谈到宪法，也没有议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问题。这样，“议院”就仅仅是反映民意的咨询机构，而不是得到宪法保障的立法机关和“民权”的政治代表。“议院”的设立也就并不意味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改造，而只是在原有机构外增设新机构，作为原有机构运行的滑润剂，从而改善封建专制制度。

如此“议院”，和宪法、民权脱钩，仅存躯壳，不具神髓，是洋务思想体系所能够容纳的。张树声、郑观应批评仅引进船炮器物而不仿行政教制度为“遗其体而求其用”，实际上他们仿行“议院”也恰恰是“遗其体而求其用”的。有些论著，凡主张设“议院”者，便给戴上“立宪思想”、“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桂冠，纯属望文生义、添字解经的严重误会。

从总体上说，洋务派包括洋务官僚、洋务企业家、洋务政论家三种人。所谓早期改良派实际上就是洋务政论家。王韬欣然以洋务派官僚的谋士自居：“曾以指陈洋务，为湘乡曾文正公、合肥相国、丰顺丁中丞所赏识，……迄今所陈，半见施行。”^⑥

郑观应不仅是洋务政论家，且兼洋务企业家。洋务政论家是洋务运动的宣传鼓吹者、出谋划策者，是洋务派的喉舌和智囊。洋务官僚和洋务政论家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虽有分歧，也只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主事与谋士之间的歧异。洋务官僚对自己的企业家、政论家一贯是庇护、信任和器重的。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从来没有过洋务官僚和洋务政论家尖锐对立以及洋务官僚因政论过头而自戕喉舌的记录。

几种中国式“议院”的方案

有时，所谓早期改良派又扩大到中法战争后、甲午战争前的一些人，主要指一批主张设“议院”的论著的作者。这批论著有：宋育仁的《时务论》、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汤震的《危言》、宋恕的《六斋卑议》、陈炽的《庸书》、陈虬的《经世博议》和《救时要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等等。

这是相当庞杂的群体。它已不属“早期”，大部分正处于维新运动高涨的前夕。就思想倾向说，有的应属维新派，如何启、胡礼垣；有的正向维新派转化，如陈炽、陈虬、宋恕；有的仍抱“洋务主义”，如宋育仁、邵作舟、汤震、郑观应。从总体考察，除何启、胡礼垣外，他们的“议院”观仍然显示出甲午战争前的时代特色，并没有完全突破洋务思想的樊篱。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议院》篇中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⑦集中概括了他们对“议院”的理解。《盛世危言》集洋务思想之大成，代表了洋务思想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的不少论著都提出了在中国设“议院”的具体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宋育仁：把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们组织起来，“就翰詹署为陈议之所，掌院为院首，正詹副之，廷辩得失，论定上闻”。^⑤

二、汤震：自王公大臣至四品以上京官组成上议院，由军机处主持，所有四品以下京官组成下议院，由督察院主持。两院讨论大政方针的利害得失，然后“由宰相敷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⑥

三、陈虬：令各省“札飭州县一例创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择优议行”。^⑦

四、陈炽：由百姓推举士绅组成乡一级的既议事又办事的“议会”，然后经过“县选”、“府举”、“省保”，送到中央，组成下议院；上议院则“仍因阁部会议”。事经两院议定之后，“行否仍由在上者主之”。^⑧

以为设“议院”即兴民权者也许会爽然若失。从这些中国式“议院”方案里，能看到多少“立宪思想”、“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影子？议员出自现任的封建官僚和封建士大夫，几乎不用选举。“议院”的形式或为言官集议，或为学校议政，或干脆和封建官僚体制融为一体，最后的裁决权仍属于君主。这样的“议院”，丝毫不会有损于封建专制势力的统治，根本缺乏资产阶级夺取或分享国家政治权力的内容，说它是封建专制机构的附庸是一点也不过的。

一般地说，引进外来文明有三个层次，即器物、制度、观念。顽固派反对一切外来文明，洋务派有的始终停留在器物层次，有的进入制度层次即止步不前。“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⑨在世界性的较量中，古老的中国文明已经败下阵来。但是，要承认固有文明的衰败是很不容易的，越衰败，越要寻根，越要“固本”，死守住传统的观念形态，结果引进的器物不能发挥其效用，引进的制度变成非骡非马的怪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支配下的中国式“议院”，只能是这样。

维新派的“议院”与“民权”

维新派继承了洋务派关于“议院”可以“通下情”、“张国势”的思想，但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强调“议院”和“民权”的关系，实现了观念层次的更新。

康有为在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中的认识还没有超出洋务政论家的水平。但几年之后，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权”，“权归于众”，君由民立，“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设立“议院”等崭新的命题。1898年在《日本变政考》中，更明确指出：“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立法属议院，行政属内阁政府。议院不得权过政府，但政府不得夺议院之权——“此宪法之主义也”。这种代表人民，掌握立法权并受到宪法保障的“民选议院”，显然和仅仅借以通下情、备咨询的“钦命议院”是大不相同的。

严复指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

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②扼要地阐述了“议院”的民主精神。他认为民主制度只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自由”才是民主制度内在的神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根据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严复驳斥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观点，抨击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阐述了主权在民、立君为民、君仆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原理。^③

谭嗣同不仅运用社会契约论阐述了君由民举、立君为民、民主君仆、民可“易”君的道理，而且直斥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帝王为“独夫民贼”，全面驳斥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支柱——“三纲”，并指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④在谈到“议院”时则着眼于立法权，“查泰西议院。立法之权、行政之权，分而为二。立法者议员也，行政者君主与民主（指民选总统）也。”^⑤

梁启超认为，中国贫弱的病根就在于封建专制，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则在于“议院”，因为“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政分则事易就”。^⑥他完全同意严复关于“议院在权”的论断，并进而指出，有权的“议院”还得考察“得政之人”和“民权究何在”，才能判定是不是真正代表“民权”的“民政”。^⑦

观念的更新，把维新派和洋务派明显地区别开来。正是在“民权”问题上，而不是在“议院”问题上，维新派遭到顽固派、洋务派的疯狂攻击。顽固派大肆叫嚣：“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⑧“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⑨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则强调“法制”可变，“伦纪”不可

变，“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⑩

挺身而出批驳张之洞的是何启、胡礼垣。过去，把他们划归所谓早期改良派是不恰当的。就思想内容说，他们鼓吹“民权”，认识高于所谓早期改良派一个层次。他们在《〈劝学篇〉书后》一文中，针对张之洞的攻击进行全面的批驳，系统发挥天赋人权论，完整阐述社会契约论，为“民权”大唱赞歌，是维新运动时期杰出的启蒙佳作。^⑪

历史事实说明，不是“议院”，而是“民权”，成为维新派和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分界线。

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令人惊异的是，当维新派把“议院”和“民权”、宪法联系起来，使自己的“议院”观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性质的时候，他们对立即开设“议院”却迟疑、犹豫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叶公好龙”？不，因为真龙并没有出现。它既无法用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来加以说明，也无法用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恐惧来予以诠释。这里所反映的是一个中国近代令人困惑的历史难题。

从国家富强的需要说，中国应亟设“议院”；但从社会实际的情况说，中国又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怎样在一个贫穷、愚昧的国家里实行民主，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维新派自然不会懂得，自由与雇佣劳动、平等与商品流通的关系，不会懂得资本主义经济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但他们完全可以觉察，维新变法的

力量是十分单薄的。“守旧盈朝”，愚氓遍野，“民”的大多数并不站在维新派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的“议院”，势必为守旧势力所把持而成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因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设“议院”必先“开民智”。因此，在“百日维新”期间，设“议院”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不是什么“倒退”、“变节”，而是脚踏实地的前进，是为在贫穷、愚昧的中国摸索实现民主政治的道路。

“百日维新”期间，有关“开民智”的措施如建学会、办报刊、设学堂等曾见诸诏谕；而“总其大要”的“变官制”却始终没有在诏谕中出现。按照康有为的设计，“变官制”是为了使维新人士取得全部或部分国家政治权力，具体办法是：

一、开制度局于宫中，其任务是“审定全局，重立典法”，“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

二、制度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个专局，“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三、每道设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由民政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办理各县的“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等事。^④

“开制度民政局”是“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全力争取的目标，曾再三再四地敦促光绪“乾纲独断”，立即实施。康有为的“变政”、“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在《日本变政考》中，他把“立制度局以议宪法”列为“变政”之大端，“改定国宪”为“变法之全体”，“二十余年始开议

院”，而民选议员则为“日本维新之始基”。显然，在他看来，从开制度局到制定宪法到开设议院，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就是“开民智”的过程，在一个贫穷、愚昧的国家里为实现民主所必需的准备过程。

“开制度民政局”依靠的是皇权，但光绪没有权。光绪曾把康有为关于开制度民政局的奏折交王大臣会议，并几次责成他们切实议复。但王大臣们始则拖延不报，继则浮词搪塞，光绪无可奈何，开制度民政局的计划终于搁浅。不久，政变发生，维新运动宣告夭折。

“百日维新”失败了。制度民政局尚且没有开成，立宪、议会、民权等等自然无从谈起。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光绪无权，因而带有偶然性。在封建时代皇帝无权是不正常的，连维新派核心人物如谭嗣同，“当其初被征入朝，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⑤如果光绪有权呢？历史不能假设，但至少可以提醒人们，不能从“百日维新”这一特殊事件的失败中得出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改良道路走不通之类一般性结论。不管怎么说，“百日维新”没有提供民主建政的成功经验是明摆着的，这不是维新派的过错，因为变法被扼杀在摇篮里。他们所碰到的历史难题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怎样在一个贫穷、愚昧的国家实行民主呢？严复认为根本没有希望。梁启超曾主张以“开明专制”为过渡，但时势变迁，不久便随波逐流地投身于没有成效的立宪运动。孙中山提出过“军政”、“训政”、“宪政”循序渐进的方案，但戎马倥偬，始终未能着手进行。民国成立后召开的国会，几乎只是专制的遮羞布。蒋介石“训政”20年，“训”出

来的国民代表大会，也很不成样子。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几亿小农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始终是命途多舛的。

- ① 朱采：《海防议》见《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一）。
- ② 《郭嵩焘奏稿》第345页。
- ③ 《郭嵩焘日记》（三），第973页。
- ④ 《清史稿》（三十八），第11691页。
- ⑤⑥ 崔国因：《象实子存稿》第22～29、69页。
- ⑦ 张树声：《遗折》，见《张靖达公奏议》（八）。
- ⑧ 冯桂芬：《制洋器议》，见《校邠庐抗议》。
- ⑨ 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适可斋记言记行》（二）。
- ⑩⑪⑬⑭⑮《郑观应集》（上），第103、967、314、240页。
- ⑫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2～23页。
- ⑬ 王韬：《弢园尺牍》，第184页。

- ⑯ 宋育仁：《时务论》。
- ⑰ 汤震：《议院》，见《危言》。
- ⑱ 陈虬：《开议院》，见《经世博议》。
- ⑲ 陈炽：《议院》，见《庸书》。
- ⑳㉑ 严复：见《严侯官文集》中《原强》、《辟韩》。
- ㉒ 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
- ㉓ 《湘报丛纂》（丙，上），第5页。
- ㉔㉕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94、108—109页。
- ㉖ 《翼教丛编·序》，第1页。
- ㉗ 《翼教丛编》（一），第5页。
- ㉘ 张之洞：《劝学篇》，第21～22页。
- ㉙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六）。
- ㉚ 康有为：《请大督臣工开制度民政局折》，见《杰士上书汇编》。
- ㉛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完全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是否合理，与马克思的认识无关，无须在他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况且，他也没有提供确实的结论。

马克思对跨越资本主义问题 认识的三个阶段

郑 镇

关于资本主义能否超越问题，不同观点都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因此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就不得不从考证马克思的观点开始。

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是近代先进思想家们着重思考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也不例外，把资本主义能否超越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力求作出科学的解答。通览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会发现，其观点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显示出阶段性的变化。

(一) 1842年到1845年，青年马克思以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步入德意志阶级斗争战场。这时他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的激情远远超过理性的沉思。他希望一口气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把德国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这一时期，他隐隐约约地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超越的。

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是欧洲相对落

后的国家。当德国要求消灭普鲁士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时，英、法等国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件，在德国刚刚开始。被英国、法国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受到欢迎。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历史的发展不应当象一个笨拙的新兵重复旧的操练，重复走英、法所走过的路，应该使之提高到英、法等国现有的水平。在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他指出，通过“政治解放”打倒封建专制、摧毁社会等级制度，摧毁行会和特权等等，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解放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主要对资产阶级有利，不能达到“人类解放”的目的，所以它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要真正达到“人

类解放”，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在同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德国如果重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指出，在德国之所以可以实行人的解放还在于它已经有了无产阶级这一政治力量。“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同上书，第1卷，第15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超越的，当时德国不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应该直接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二）1845年到1871年，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1845年以后，随着唯物史观的成熟，马克思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人类社会有五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同时还作出了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指出在德国立即实现以“人的解放”为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先发展为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必要的准备。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也就是说，德国当前所进行的革命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马克思不但修正了1844年的看法，而且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历史进程的顺序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具有历史继承性，而每一个新时代的社会生活都受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产力的制约。它们“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48年12月，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更为明确地说：“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同上书第4卷，第320—321页）在1859年的《序言》中，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历史进程“五阶段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同时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上书第2卷，第83页）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白地告诉德国读者，不要以为这里所揭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的现实只是英国所特有的，恰恰相反，“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而且马克思还指出，在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

生产的不发展”。（《资本论》第1卷，第8—11页）如果说1844年，马克思在德国避免英、法等国资本主义的消极现象，那么在这里，马克思显然认为在德国同样无法避免这种现象了。在序言中，马克思还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这一思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上书第12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书第11页）

（三）1871年以后，马克思把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跳跃性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首位来考虑。引起这一变化的契机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革命在短期内发动不起来，而在东方、特别在俄国革命浪潮正在高涨。马克思希望俄国革命能成为导火线，以促进西方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俄国社会问题。

在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其他地区的原始村社早已瓦解，唯独俄国到处还保存着。马克思分析道，俄国村社组织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那么它必然象西欧国家那样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使公社瓦解，最后发展为资本主义。“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

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因而，“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同上书第19卷，第431页）所以马克思认为，不能把西欧社会发展的模式变为抽象的历史哲学到处乱套。与西欧不同，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苦难历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然而，马克思仅仅指出这一种可能性而没有肯定它的现实性。第一，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同时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而不是只有一种前途。他认真地研究了俄国村社，发现它是一个已经冲破了血缘关系、既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又带有私有制成份的具有二重性的社会。马克思接着指出，这二重性使公社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它既可能成为公社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又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因此，“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后者战胜前者。……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同上书第19卷，第435页）至于哪一种结局将成为现实，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回答。而他更多地看到，如果任其发展，私有制战胜公有制的可能性更大。为此第二，马克思认为要使俄国村社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要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要通过俄国革命挽救公社，以阻止其资本主义的前途。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必须依赖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因为俄国村社生产力

很落后，靠其自身的力量不能发展为社会主义，它必须有胜利了的西方无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支援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于如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对于俄国村社能否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直到马克思逝世的前一年（1882年），他还只是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由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和不同侧重点，有时则只是作某一设想，并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

这就为后人随意运用和发挥他的观点留下了余地。这种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应该坚决摒弃。进而言之，在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不是合理的，与马克思的论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的书没有关于中国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的论述。即使有，也不足以为根据。因为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作的论述，可能因时代的局限性不正确，也可能因历史的发展使原有正确的结论变得过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只能运用其方法，从中国自身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凌峰

沙东迅著《五四运动在广东》出版

第一本关于广东五四运动历史的专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此书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沙东迅经过近10年来的调查研究写成的，其内容包括五四前广东的经济、政治概况，十月革命对广东的影响，广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席卷广东（包括广州和粤东、西、北、中，海南及港澳地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反对无政府主义，广东共产党、青年团的建立，广东五四运动的特点、意义和启示，还附有广东五四运动要事记和珍贵的历史照片。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为此书题写书名，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省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江明为此书写序言。

对新儒学的一种商榷：不要把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认同变成向西方文化认同的包袱。

试论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认同性

陈少华

比较文化的目的何在？大诗人歌德在上个世纪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当今日本学者中村元强调的“世界哲学”的建立，可看作一种回答，它涉及到文化的认同性问题。

“世界哲学”的概念，代表了文化发展综合化的趋势，其核心就是东西方文化发展在动态互补中显示出来的文化内蕴的相对恒定性，即哲学精神、价值取向上相对恒定的世界认同。

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认同，缘于对人生终极存在共同的执着追求。从一开始，在人类终极精神的追求中，东西方文化精神便明显地表现为从一点出发反向走向合的一个圆圈。就艺术精神而言，西方艺术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派的艺术所表征的轨迹是从再现到表现，东方艺术从中国的写意追求到近代的写实追求，其轨道却是从表现走向再现的。这种逆向对转说明，对于

这种终极存在深怀渴望的艺术家，无论是采用写实的风格，还是运用先锋派艺术的荒诞奇诡手法，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形而上学的崩溃是一种对于叫做本质的哲学实体乌有的宣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人类自以为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或宇宙的秩序是怎样的，其根本意义是什么，这种对本质探究的无所不包的乐观主义作法，被叔本华、尼采等人宣判了死刑。由于以往过于迷信概念所包容的一切，作为一种反拨，本世纪中叶西方兴起了分析哲学的浪潮，关注于什么是人所能确切知道的，什么是人不能知道的。同时，东方直觉哲学日益受到西方学者的注目，与西方哲学相比，东方直觉哲学的做法似乎是从来不言本质而本质又无所不现的。它对宇宙世界的精神体验，习惯于把所有的现象看成是协调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既宏观又模糊的把握。比如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有无的问题上，庄子用的就是一

种典型的排除非此即彼的模糊把握：“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有孰无也。”而在易学中，我们知道阴阳互根的说法，以及认为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皆由一气运动所产生。这样，对世界宇宙的本质把握，就有可能超越某种形式逻辑，而有点象禅宗里“看话禅”所言：“有解可参之言乃是死句，无解之语去参才是活句。”

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是语言。东方哲学中对世界总一体的本质把握所透露的意向，其妙处就在于其语言本身含着“不可说”的“言外之意”，比如禅宗里就有许多语言上的“禅机”、“机锋”，通过语言上的“禅机”而得以以心传心。这也是一种对世界把握的思维特性。

西方学者也日益重视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认同。如法国60年代哲学领袖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野性的思维”概念，指未开化人类的具体性和整体性思维，是和开化人的抽象性思维共存而各司不同文化职能的人类思维方式。他说：“野性的思维既可理解为人类生活中永无可能再与其匹敌的、无所不及的从事象征化活动的抱负，又可理解为无微不至地充分关心具体事物的态度，最后还可理解为以上两种倾向实则合而为一”所“暗怀的信念。”^①这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具体性）和综合（整体性）达到对世界存在的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对世界的把握中，主要也是以一种类似野性的思维来进行整合与把握的。

正是一种对人生终极存在的向往，才演绎出人类的各种活动。而“所谓‘终极的

存在’的本质，就人的智能来说，大概也只能理解它的一部分”^②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各自对终极存在的追求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自身的不足，互补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文化上的认同愈发显得自觉，因为这样才能“实际上加深了人的智能对‘存在’的认识”。（谈因比语）

三

人类关于存在的终极性探讨，其实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正如恩格斯早就描述过的：

“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③

这种在对终极存在的追求中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东西方文化对终极存在的渴求，通过各自的理想去进行，存在一种唯我至尊的倾向。同时，由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④从人们本体存在上来说，由于追求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由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无限的但又是至上的有限的。所以，在对终极的迫近中，认同性也必然存在。

所谓终极的存在只能是在人类的发展中无限地迫近的。认同性的存在，经常表现在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对终极存在的朦胧、模糊的感悟境界上，这种表现在现阶段不过是无限接近终极存在的一种表现，而决非真正对终极存在的揭示。正是这一境界吸引着东西方文化的认同。

但丁的《神曲》是一部人类心灵的发展史，做为一种形式上的构成，是从《地狱》、《炼狱》、到《天堂》来完成的。但丁把《天堂》看作人的终极归宿，那里给人的感受是：和谐、宁静。欧洲小说有一种流浪汉框架，此后，在对个人存在以及归宿的探究上构成了一种“成长小说”的自觉，可说是欧洲小说的一种传统。关于一部较早的德国流浪汉小说《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这么长一串的主人公名字其意是“纯朴无知”），吉列斯比曾说：“它是一首寓言诗，隐晦地谈及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风风雨雨里的漂泊、流浪，但他们又会像凤凰一样复活、并最终获得心灵的宁静、安谧。”^⑤而当叔本华读了印度的《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优波尼沙陀》后，非常激动地说：“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真是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确的彻底的和谐精神……这里吹拂着印度的气息，呈现出根本的、顺从自然的生命。……它是我生的安慰，也将成为我死的慰藉。”可以说叔本华“把《优波尼沙陀》哲学视为自己意志哲学的根本”，^⑥在他的躁动、悲愤之后隐藏着渴求宁静和谐的秘密。

在东方，印度佛教所宣扬的，中国禅宗所宣扬的，也大都直指某种宁静、和谐的境界。大诗人李白经历了怀才不遇，漫游历险的各种遭遇之后，突然来了四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中便有宁静、和谐的禅味。

人类对和谐宁静需要的认同，实为东西方文化认同的一环。下文将从人格、宗教情感、审美方面加以探讨，以求昭示东西方文化认同的某种必然性。

四

我们最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格”的解释有如下3条：

1. 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2. 个人的道德品质。
3. 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

这里要说的人格，与第3点接近，是一种社会存在相关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本体的探讨往往与对宇宙本体的探讨相混，对于宇宙本体的自觉容易落实到人格本体的自觉上。与此相反，作为欧洲文化源泉的希腊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故有“认识你自己”之说。从叔本华、尼采始，西人对人格本体的自觉，更是以与宇宙客体对立提出的。人格实现上的东西方相反的方向，形成了两种人本主义。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相信人的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存在一样能归到一上，所谓道生一，一生万物，讲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而西人的人本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切事物的尺度。厨川白村在谈及自然诗时曾慨叹，“象古来的东洋人那样，进了没我的忘我心境，把自己没入于自然”的自然诗，在欧洲几乎是看不见的。确实，欧洲到了18世纪浪漫主义

才比较重视自然，卢梭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开始暗示应追求人的存在与自然和谐的认同。然而，欧洲的文明发展却由于本来突出为人的存在的物质进步反而把人的存在遗忘了，呼唤人的本体带来的是更加躁动的混乱，整个现代派艺术就是深刻的写照。所以现代西方要讲生态平衡，开始对人作重新思考，并向东方思想注目。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穆尔就说过：“东方人还向我们西方人指出”“达到心灵的平静有两种，亦即在印度教与佛教当中所特有的、达到终极的和精神上的平静；以及在中国思想中所特有的、在平凡生活中的平静或满足”^①这是对人生之和谐、宁静的认同。可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必然趋势。

就人格本体而言，人的自我实现含有指向终极存在的意向。但东方的自我实现是进入和谐平静的状态。按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一派看来，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成佛理想，把人格本体的实现转到心性问题上来，认为心净自通佛。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人格实现，所谓“若论佛法，一切现成”。而西方谈自我实现则突出自我，强调竞争、充满焦躁动荡。然而，从西方兴起的第三思潮——马斯洛的心理学看来，他拒绝研究象叔本华、尼采这类人格实现上的不安宁，而把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这类人的人格实现。按马斯洛的说法，健康人的心态稳健沉静，其可贵处在于他们奋斗的一生是热烈而又平静的，他们都是对终极价值抱有某种比较坚定的信念的人。这一研究方向表明东西方文化在人格实现方面的认同。

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怀亨格在其《虚假的心理学》中谈到，人类都是凭借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虚假目标而生活着。阿德勒也认为，尽管这些目标是虚假的，它们却能使人类按照其期待生活着，并指出这些目标经常是属于潜意识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说：“基督教和佛教都属于虚无的宗教。”然而，我们在毫不犹豫地宣称宗教的虚无与反动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宗教仍然具有广阔的天地。并且，T·S艾略特那样，在对一切进行反叛之后却皈依了宗教的做法，也并非个别。宗教的所谓虚假性乃在于人类对终极存在的认识模糊不辨，但这是人类追求终极存在的必然表现。今天，人们可以不再拘泥于宗教教义的束缚，但却不可否认，在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迫近中，人类怀有某种宗教情感。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能使生命保有某种对和谐、宁静的需要，而这种和谐与宁静则是生命指向终极存在的一种“虚假性”需要的表现。

西方文化越来越看到了东方文化在印度教与佛教影响范围中，对于渴求精神上的和谐平静的宗教情感的作用，能够警醒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终极价值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平凡生活中的和谐精神以及“天人合一”、万物归一的信念，特别表现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对这一信念的朦胧的宗教情感，构成日常生活的诗意及实现平静和谐的理想。目前，体现着这种深层心理结构的宗教情感的禅宗，在国外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中村元所说，在美

国就有大量的禅学研究者，尤其重视禅对存在的超越形式逻辑的把握，这表现出东西方对宗教情感的认同。

宗教情感的认同是一种对于生命必然指向终极存在、寻求永恒的认同。培根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哲学，则使人皈依宗教。”人类总是在渴求一种对宇宙、对历史、对人生的包罗万象的终极把握，但正如恩格斯所言，这只能在无限地接近中去实现。培根的话，也暗示着这种矛盾。并不是宗教能在人之外描述一个永在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人是不需要宗教的），而是人从内心深处需要宗教借以指向终极存在和寻求永恒，尽管这种宗教情感在对未来的目标指向上是“虚假的”。

六

对于永恒的和諧的追求，在现实存在中得不到的，审美活动可为我们创造，所以说，美是永恒的显现，美是自由的象征。美与追求生命的秘密相关，只要人类存在，审美的需要总是存在的。

正如对终极存在的把握一样，由于人的心智有限使东西方文化的认同性成为必然，审美的追求，也一样存在着东西方认同的必然，如今道友信所言，“表现与再现都追求存在的秘密。”所以东西方艺术追求的逆向运动必然划成一个圆圈。在审美实现的过程中，和谐、宁静的感受普遍存在，昭示了指向终极的某种必然的认同。任何崇高都是一种伟大的优美，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雨后涨满了湖水式的心灵感受：宁静与和谐。而奇诡怪异之作，当我们感悟到某种直指生命的存在的秘密的

一瞬间，我们心灵感受到的仍然是某种宁静、和谐。正如今道友信说的：“当我们欣赏杰作时，我们会保持一种象灌满水的山湖式的沉默。这种寂静的体验，不正说明了艺术作品具有不可名状的神秘色彩吗？”^⑥而这一神秘色彩总是与某种终极存在相联系的。

七

以上对东西方比较文化认同性的说明，其目的，就大处远处说，祈望为建立“世界哲学”的自觉提供某种依据，就小处近处说，是要表示某种担忧，不要把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认同变成了向西方文化认同的包袱。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同，不是简单的认同，而是经历了过程的认同。

目前有人认为，“亚洲四龙”的社会经济起飞，儒家学说的文化心理起着重要作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儒家学说也好，佛学、禅宗也好，本是做为某种至善的学说提出的，只有极少人能做到，更多的人是无法领悟的。文化所及，还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汽车文化、计算机文化，更能代表文化的趋向及特征。日本人尽管在生活中仍保有很多东方色彩，但在工作、竞争意识上却是完全西方化的。中国文化也应对西方文化先进的技术、竞争意识等方面有一种认同的自觉。人类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人类经过某种不和谐的历程，在人类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丰富性的过程之后，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下转 112 页）

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

吴国钦

中国古代戏剧何时形成？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以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象《东海黄公》、《总会仙倡》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

谈戏剧形成的问题，先要弄清什么是戏剧。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一断语，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下再详谈）这里有一个关键字眼，就是表演的“演”字。王国维注意到了，戏剧从本质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东海黄公》或《总会仙倡》，它们都是一种戏剧演出，有演员表演，有故事贯串，有观众参与。张衡《西京赋》（完稿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是这样记载的：

“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即咒），冀厌（伏）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

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也有记载：

“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伏）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觥之戏焉。”

《东海黄公》的演出形式属角觥戏，演

员通过戴白虎面具进行角力相扑表演故事。它显然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戏”，因为角觥是在戏剧规定情境中完成的，输赢早已“内定”了。

这种角觥戏来源于先秦的“蚩尤戏”。任昉《述异记》载：“冀州有蚩尤神。……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觥戏，盖其遗制也。”今天广西马山县瑶族百姓还认为他们的先祖就是蚩尤公，当地至今流传着“蚩尤舞”。（见孙景琛《中国舞蹈史》第一章）

如果说《东海黄公》这种角觥戏是一种“武戏”的话，则《总会仙倡》这种歌舞戏就是一种“文戏”。《西京赋》描述《总会仙倡》演出的情况是：

“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羆；白虎鼓瑟，苍龙吹篪（chí持；古乐器）。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透蛇；洪厓立而指挥，被毛羽之纤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

《总会仙倡》的演出，有指挥，有奏乐，有歌唱，有故事，有布景，有面具化装，还有舞台效果。如果我们再参照1964年在济南北郊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西汉百戏陶

俑，（参阅《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对张衡的记载就会获得具体深刻的印象。

汉代的“百戏”也叫“散乐”，是当时民间演出的歌舞、戏曲、杂技、杂耍节目的总称。戏曲就孕育在这种“百戏杂陈”的演出环境中，它吸取了各种姐妹艺术的长处，在母体中形成自己的基因。今天的戏曲，不仅唱做念打俱全，而且还有不少杂技、杂耍、雕塑、魔术等艺术形式的表演手段。这套综合性艺术表演手段的来源，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百戏杂陈”的汉代，可以追溯到它的“母体”。儿子总是吸取了父母的某些遗传基因而形成自身的实体的，从“百戏”到后来宋元明清的“杂剧”、“花部”，中国戏曲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五花八门、驳杂多样的表演形态，这是和形成时母体的环境密切相关的，因此我认为戏曲在汉代就出现了。

我国是文化古国，在汉代以前，戏剧艺术的因子散落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诗歌、音乐、舞蹈等已经很发达了：

诗歌——《诗经》《楚辞》的出现说明先秦诗歌创作已经发展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境界。戏曲是诗剧，后代戏曲的某些表现程式，象“自报家门”的手法最早似可追溯到《离骚》的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音乐——《诗经》《楚辞》都可以歌唱。《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先秦时期歌、舞、乐几乎是三位一体的。解放后出土的2400年前的编钟，（宫廷乐器）由56个青铜钟组成，共5000余斤重，分3层悬挂，需5至7个乐师来敲击演奏。先秦的乐器分八大类别，无论是管乐、弦乐、打击乐

应有尽有。音乐理论有《乐记》及荀子的《乐论》。这些都说明当时音乐艺术水平之高。

舞蹈——西周初年就已有《六代舞》，其中有些是前代节目加以整理的，有些是新创作的。最著名的是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大型乐舞《大武》，孔子曾经见过它的演出。《大武》总共分为六段，主要是表彰武王伐纣的功绩。再如《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表现了陈地百姓插着鹭鹭羽毛群舞的情形。至于象《九歌》这种大型乐舞，有人物，有情节，演出规模宏大。

优伶——优伶是后代戏曲演员的前身，其行为具有表演的成份，如“优孟衣冠”所扮孙叔敖的故事。但优伶的本质是统治者的帮闲弄臣，并不如《中国戏曲通史》所说的，那是“在奴隶社会中多少还有些原始社会中民主习惯的遗留。”（第11页）这里实在扯不上什么“民主习惯”！优伶之所以能在人主面前说笑话或进行某些讽刺，是职业赋予的一点“权利”，这就是所谓“言无邮”。（即无尤，无过也）如果不是这样，刀架在脖子上，何来笑话之有？

但是，无论是优伶还是先秦的乐舞，都不是戏曲实体本身。优伶的行为不是审美活动，而《九歌》的主要表演者是巫覡，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大武》则是一种政治礼仪，并非审美活动。因此，王国维关于“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概念，是不够完整的。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什么是戏曲，我们就会把《九歌》《大武》看成最早的戏曲实体。而事实上，它们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或政治礼仪。因为戏曲从表层看，是“以歌舞演故事”；而从深层看，它是一种

群体性的审美活动。也就是说，它必须既有演员这个创作主体的表演，又有观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参与。我们在考察戏剧起源与形成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观众”这个重要的审美主体。王国维自己就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导致了判断的混乱。他在《宋元戏曲考》中，在谈到《九歌》时说：“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谈到巫覡优伶时说：“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谈到《兰陵王》时则又说：“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均引自第一章）谈到元杂剧时说：“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第八章）4种看法并存，我们也搞不清王氏究竟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何时何事。

汉代“百戏”中的戏剧节目，虽然没有剧本留传下来，但从史料记载或出土文物，我们不难把握到：象《东海黄公》《总会仙倡》这样的剧目，既是“以歌舞演故事”，又是群体性的审美活动；既有演员的演出，又有观众的参与。这样的“百戏”节目，才摆脱单纯的角觥耍乐或原始宗教仪式的影响而进入审美的领域，成为中国戏剧最早的一批剧目。

汉代“百戏”产生了中国戏剧的第一批剧目之后，为何到一千年后的宋金时期戏剧才到达它的繁荣期？戏剧的发展为什么如此迟缓？这是本文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从汉代到宋金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锁闭式的社会，朝代虽然改换了不少，但封建经济发展缓慢，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学社会价值取向，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抗变

性，由此铸造了中国人一种封闭保守的心理态势，使民族缺乏创造活力。即是说，戏剧发展之缓慢，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的心理潜质诸方面，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因，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从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来看，汉代“百戏”以后，虽然不能说戏剧的发展出现过“断层”，每个朝代毕竟都有一些著名的剧目产生，象《兰陵王》《踏摇娘》等在戏剧史上影响还十分巨大，但整个发展过程就象社会本身一样，步履沉重而缓慢。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其一，从汉代“百戏”开始，以“百戏”为主要演出形式的泛戏剧形态长期存在。这种泛戏剧形态既包括一些小型的剧目，也包括歌舞、杂技、魔术、杂耍、迎神赛会、化妆游行等演出。它成了社会最重要的娱乐机制，每逢喜庆年节即演出于贵族王室或民间。

应当看到，戏曲与“百戏”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它们之间不少外观系列（如唱做念打）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泛戏剧化形态的长期存在，造成了戏剧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制的姗姗来迟。现举两个突出例子来说。据《隋书·音乐志》记载：

“明帝（北朝后周宇文毓）武成二年正月朔旦，令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及宣帝（宇文赧）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曼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

这说明鱼龙曼衍之百戏杂伎在宫中演出盛

况空前。另一个例子是宫廷与民间一起搬演、规模更为宏大的一次演出：隋炀帝杨广大业六年（610）正月，为炫耀国势，“于（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使人皆衣锦绣彩，其歌舞者多为妇服人，鸣环珮，饰以花毵（ěr耳，羽毛饰物）者，殆三万人。”仅其中的一条会喷雾幻化的鱼龙，就长达7.8丈。（见《隋书·音乐志》）

这两个例子表明：从汉代开始直至宋金时期，“百戏”的演出从来未间断。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机制，一种泛戏剧化的现象，使观众获得审美满足与心理愉悦，在民间一直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百戏的形式繁复多样，色彩鲜明华美，场面热闹喧哗，表演手段则歌舞笑乐无所不包，具有很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力。（甚至还有味觉的，有吃喝的享受，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娱乐与满足）这正好与普通老百姓所过的那种贫困单调、自锁乏味的生活构成巨大的反差，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审美的娱乐需求。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感情维系，无论朝代如何变换，人口如何繁衍，百戏的演出总是存在。直到今天，各地还有不少类似的大型游艺活动，它集歌舞吃乐戏耍于一场。（如中国艺术节和各地散在的节庆表演等）可见，当戏剧还未繁荣起来的时候，泛戏剧化的“百戏”演出一直填补着它的空缺而成了主要的娱乐机制。

其二，从汉代“百戏”孕育了中国戏曲之日起，戏曲的发展十分缓慢，原因是大规模的戏曲观众群体尚未出现。一直到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勃兴，

勾栏瓦舍的林立，才使属于市民的新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新的市民文化出现了，一批全新的市民读者与观众被创造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代新观众群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市民阶层的勃兴创造了宋金戏剧的繁荣。而在汉代至宋漫长的千年中，由于经济未出现大的转机，新的市民观众还未降临世上，戏剧因此只能以“百戏”的形式维系着它的生命。

从北宋开始，中原地区150年未受兵戈之扰，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宋初总户数是410万户，100年后增至1700万户。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城市繁华，物产丰阜。这在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以及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中都有具体生动的记述。唐代的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还禁止夜市，但宋代的夜市交易已十分活跃。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活跃，使宋代的流行歌曲——产生于歌楼酒馆的宋词被大量制作出来，说部大量刊行。戏剧是一种文化消费，是一种身心娱乐，戏剧演出需要观众做出一定的经济支付，而这却是贫穷、分散、封闭的农民难以做到的。

据《东京梦华录》诸书记载，北宋汴京瓦舍很多，东西南北四城都有，最大的一处瓦舍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可容数千人”。在瓦舍里，演出的节目有：说书、说唱、杂剧、傀儡戏、影戏、参军戏、诸宫调、弄虫蚁、说笑话、棍棒、相扑、杂耍等，观众十分踊跃；还有“货药、卖武、喝放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南京临安“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瓦舍，仅北瓦一处就有戏棚十三座，演出之盛况不难想见。

瓦舍的出现，是宋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瓦舍文化”说明一个新的审美群体的出现，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产生。“瓦舍文化”从其本质上说是一种市民文化，一种俗文化。它的出现，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戏剧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在文学史上，“瓦舍文学”极大地冲击着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就推翻了诗文对文坛的统治，从元代开始，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主流；在戏剧史上，“瓦舍文化”造就了新一代的观众群体，从而创造出一代全新的戏剧，宋金元杂剧与南戏被创造出来了，戏剧史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中国戏剧终于伴随着“瓦舍文化”的出现拔地而起，形成自己的高峰，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戏剧大师。

瓦舍里的演出，依然采用“百戏”的形式，但由于观众的大量涌现，演出有了固

定的场所，（戏剧毕竟是一种剧场艺术！）演出规模宏大，远非昔日广场或寺院门前的演出可比拟。“瓦舍文化”的出现，一方面使“百戏”这种自由参与、观赏性强的泛戏剧形态一直保留下来；（如广州的文化公园、上海的大世界可以说是“瓦舍文化”在20世纪的延续）另一方面使戏剧出现了质的飞跃。观众所具有的比较保守的审美心理定势，以及使戏曲以“百戏”的形式徘徊不前的状况。只有在社会经济出现大的转机的情况下才会改变。宋代一代新的市民观众群体的出现，使戏剧在蹒跚漫步1000年后终于登上新的高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一代新的市民观众群体的出现，造成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繁荣。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戏剧的形成及其发展缓慢原因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上接107页）

- ① 《野性的思维》〔法〕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P250。
- ②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P347。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76。
- ④ 同③P126。
- ⑤ 《欧洲小说的演化》，吉列斯比著，胡家峦、冯国忠译，P85。

⑥ 《比较思想论》〔日〕中村元著吴震译，P18。

⑦ 同⑥P144。

⑧ 《关于美》〔日〕今道友信著，鲍显阳、王永丽译，P77。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资源——技术——市场

——德庆山区工业发展引发的思考

蔡仁秀

山区县级工业的发展，是山区经济振兴的关键环节。山区工业的起步和发展，究竟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子？广东山区各县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经验。就我们德庆县来说，通过近几年的摸索和实践，我们认为，选择“资源——技术——市场”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山区实际并可行的。

德庆地处粤西北丘陵山区，依傍西江，南面珠江三角洲沿海发达地区，西北接近广西，与封开县同是连接两广经济的一个衔接地带。如果说，广东省对外经济开放的布局呈三级梯度开放的话，那么德庆当属于第二阶梯，即比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步稍晚，但又比一部分山区稍前。正是这样一个总的战略地位，使我们在考虑发展德庆工业的时候，既要吸取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又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立足山区实际，探索符合县情的发展道路。

德庆的实际告诉我们，山区县最大的优势在于资源的丰富。山区县工业的起飞，必须充分认识并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我们从前几年开始，对德庆山区的资源情况，作了基本的估计。我们认为，德庆的资源优势，大致体现在：一、原材料资源优势：我们有丰富的林业林产资源，有花岗石、稀土、铁、金等数十种地矿资

源，山货、南药产量居全省全国前列，农林产品三十多种。多年来，我们已打下了良好的农业基础，因此，为我们的发展松脂化工、木材、稀土冶炼、石料、建筑材料、蚕桑、南药、果品、粮食等加工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能源交通资源有一定基础。山区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小水电的发展，自己可以解决一部分工业和民用电。我们有粤桂国道和西江这条大动脉，居山而通海，交通有一定基础，为发展商品贸易提供了条件。三、山地肥沃，可用面积广，自然生态环境较优，适宜发展南药、南果、蚕桑经济作物，多年来，县委充分重视农林业基础投资，农林发展稳定，并且已经形成了南药、南果、蚕桑、粮食、林业等五大集约化生产基地。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自然资源的基本优势，使我们完全可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资源开发、加工工业，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发展路子。近几年，正是在充分认识这一优势的基础上，县委、县府对德庆工业发展作了基本的规划，先后建立起林产化工，轻工纺织，南药、南果、食品，机械电器、建筑材料、矿冶等六大工业体系，其中以林产化工、稀土冶炼、建材木材加工、南药南果加工、丝织等尤为突出，初步形成了有山区特色

的县级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近三年有了大幅度增长，从1986年的4960.8万元到1987年7132.5万元，1988年为10291.7万元。工业税利1987年比1986年增长380万元，1988年比1987年增长644万元。（以上数字未含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县级工业的发展，县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农业投入资金也相应大幅度增加，农产品通过加工，提高了附加值，增强了农业开发的效益和后劲，农业剩余劳动人口也部分得到吸收，工农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初步形成。

利用开发资源，发展山区工业必须有两个起动的翅膀，一是资金，二是技术。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资金紧缺加上山区原来的积累底子不厚，这对山区工业发展当然是很大的制约因素。但是从长远看，科学技术则更是山区工业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们在工业系统内部提出了以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企业改革路子，用先进技术求效益，辅以节能降耗，科学管理等，从而推动县级工业水平的提高，也从一个方面减轻资金不足的压力。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缺乏，工人素质的相对低下，是山区工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必须在指导思想，确立科技兴县的思想，把科学技术与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引进，开发有市场前景，有利于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的应用技术，并将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之中，使山区工业逐步由低技术的粗放加工业走上中等技术以至高技术工业发展轨道。我们采取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利用资源优势，与大城市的科技

单位、大学挂钩，进行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我们与包头稀土研究院合作，开发稀土有色金属新产品，远销国内外，并带动本县建起了磁性金属材料工业。我们与中山大学等单位合作，新开发了精制水白天然树脂等松脂产品系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松脂产品深度加工，转化为最终产品。

二是通过“三来一补”，从海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造原有旧设备、旧工艺。如我们引进意大利80年代技术设备，生产高级花岗石板材；引进西德资金和先进设备，生产中密度纤维板材等。

三是立足本县，大搞群众集资搞技改。如县建材厂，发动职工集资，开发免烧砖、水磨石砖、非烧结粘土方砖新材料，使六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

近几年来，通过抓技术、上效益，全县工业系统开发新技术和技改项目共达84项，使工业新增产值近4000万元，新增税利约500万元。

由于在资源和技术开发中，我们都始终坚持面向市场，优先发展市场需求大的工业产品，因此，使县工业产品在短短几年中，由单一、粗放向多样、精优发展。三年来，全县工业系统共开发产销对路新产品百余种，有26种产品分别获得省、市级各项优质产品奖。其中不少名、特、优产品远销海外。

德庆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山区工业走“资源——技术——市场”之路，是山区工业振兴的一条重要的规律，是发展山区商品经济，改变山区县落后状况的成功之路。

作者单位：德庆县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石成

人类历史行为：由短期转向长远

——梁桂全《发展战略学》读后

杜 平

青年学者梁桂全著的《发展战略学》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无论对于发展战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的建设，还是对于发展战略决策和发展战略实践的规范化、系统化，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短期历史行为转向长期历史行为，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大趋势。一方面，人类实践所达的时空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支配自然和社会能力的加强，世界时空又相对缩小了。谁不能立足全球，把握未来，决策现在，谁就会成为现代战略竞争的输家。因此，确立战略竞争意识，进入战略竞争态势，已是刻不容缓。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出现了“战略研究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逐步成为各级决策部门的重要职能工作；不少省、市、县为进行发展战略决策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研究活动。这将会大大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科学性和自觉性，成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历史形式。

战略研究和战略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发展战略学理论。发展战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理论学科，还在创建中。梁桂全著的《发展战略学》一书，以富于开拓性的理论勇气，总结了国内外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把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构建了发展战略学的学科体系，填补了发展战略学学科建设的空白。该书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系统性。首先，该书注意到学科内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全书八章三十一节，从发展战略的历史哲学基础，发展战略学的研究对象，

战略系统，战略规律，战略形式，战略决策，策略决策，战略研究和战略决策方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等八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发展战略学的基本内容。其次，该书在体例上注意从发展战略学基本内容各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构架，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研究对象客体的分析到战略研究、决策主体的操作原则、方法的阐述；从问题的性质和静态系统分析到动态规律的研究。再次，该书注意突出发展战略学的重点和主线。发展战略研究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许多领域，以及不同的空间层次。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的一般战略理论问题，又有各自的特殊理论问题。但是，发展战略的热点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而且，经济发展战略集中反映了一般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因此，本书把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作为重点和主线，作为分析一般战略理论问题的“模特儿”，同时兼顾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战略问题。

正由于该书具有教科书的基本特点，因此，可用作大专院校发展战略学教学以及发展战略学研讨班的教材。

第二，实用性。发展战略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作者努力突出《发展战略学》一书的可读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近几年来，作者曾多次参加了一些市、县的发展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并仔细研究了不少省、市、县发展战略研究和决策的成果。在书中，作者力求把战略研究、咨询、决策中碰到的主要的操作性问题反映出来，并把实践经验吸收到书里，使发展战略学理论具有更直接的可操作性。这对从事战略决策、咨询、研究的实际工作者，有直接的参考

价值。

第三，探索性。正由于发展战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理论学科尚在创建中，一切只能开拓、创造。《发展战略学》一书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发展战略学的理论体系，发展战略的系统原理、方法，以及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学科的专门范畴，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给予肯定的理论规范。其中，有些范畴、原理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有一些问题作了理论规范化表述；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结论，可以说是

自成一家。因此，该书对于专门从事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不言而喻，作为一本探索性的著作，《发展战略学》一书尚有不少不足之处，有待学术界讨论、争鸣、完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石成

（接第31页）

首先，要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准。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认知过程，接受教育多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就比较正确。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先进的政治文化，如果没有必需的知识，缺乏比较和鉴别能力，就难以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意识。

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学校教育以外的其他社会化手段。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次级系统，一个人的政治文化是其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人的社会化过程早在进入学校之前就开始了，家庭、社会都是社会化的场所，对形成个人的基本文化而言，这些场所甚至比学校更加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在学前就开始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例如，人们的政治认同、权威意识、集体意识等就在学前开始逐渐形成了。即使在就学期间，人们也同样受到社会的强烈影响。因此，要使人们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光凭学校和工作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每个人都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再次，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同时，特别应当注意扬弃传统政治文化。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属于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对封建政治文化的糟粕当然应予剔除。但是，对于传统政治文化不能予以一概否定，对其中的一些因素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例如，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尤其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虽然传统的政治认同对象是封建王朝及其典章制度，但强烈的政治认同感本身却是可取的，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要素之一。因此，对类似这些传统因素就应当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不言而喻，政治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存在。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民主，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从政治上信赖、认同、支持社会主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责任编辑：冯达才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奖项目

(1986—1987年)

经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委员会评议审定, 评出我省1986年和1987年的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共160项, 其中荣誉奖1项, 学术著作类41项, 科普著作类6项, 工具书、翻译作品、古籍整理和注释、资料汇编类8项, 学术论文类85项, 青年奖19项。现予以公布。

荣誉奖

项 目	作 者	工作单位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	黄海章	中山大学

学术著作类

项 目	作 者	工作单位
一等奖1项:		
孙中山论	张 磊	省社科院
二等奖14项: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	袁伟时	中山大学
孙中山哲学研究	张江明主编	省社科联
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	刘景泉	省社科院
管理、管理学与管理哲学	张尚仁	华南师大
论经济中心——广州	关其学 刘光璞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
香港市场与价格	何 杰 文武汉	省物价研究所
	陈肇斌 胡幼青	
	李惠武	
中国特区经济学	张元元 何佳声主编	暨南大学
红楼梦新探	曾扬华	中山大学
庄子浅论	曹础基	华南师大
陶渊明论略	李文初	暨南大学
汉语音韵学	李新魁	中山大学
词典论	黄建华	广州外语学院
简明广东史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省社科院

- 叶挺传
三等奖26项:
反思和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
史新论章
南雄特色研究
- 卢 权 襦倩红 省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
刘 嵘 中山大学
- 陈 枫 范 英主编 省社科联
赖泽南 郑泰仁副主编 韶关市社科联
- 《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
的同一性
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
企业党委书记科学领导概论
当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
- 黄春生 中山大学
何梓焜 中山大学
邹永图 杨恩云等 华南师大
黎克明主编 华南师大
骆鉴华 黄守成 省委党校
王荣武副主编
- 新时期话党性
- 黄友林 郭叙编 广州军区政治部理论研究
姜 斌 室
- 法律逻辑学教程
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家庭农场
改革发展遵循经济学规律
——论广东水产业繁荣的道路
- 黄积祥 康忠睦 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钟阳胜 中共河源市委
韩宗琪主编 省农垦总局
丁家树 华南师大
- 李根华 省财厅
- 郑林书 温力虎主编 省营销学会 广东社科大
《税务管理》编写组 湛江税务培训中心
- 李泽沛主编 深圳大学
- 王屏山 省政协
李锡槐 华南师大
郭思乐 刘远图 华南师大
刘清涌 黎雪芬 韶关教育学院
许 汉 广州市教育局
劳承万 雷州师专
袁宝泉 花城出版社
陈智贤 暨南大学
黄伟宗 中山大学
刘孟宇 中山大学
陈炜湛 中山大学
- 预算会计
高级市场营销学
税务管理
特区经济法教程
中学德育大纲设想
中学数学教学
中学语文实用教学法
小学语文教学自学能力的培养
审美中介论
诗经探微
创作方法史
曹禺戏剧艺术研究
甲骨文简论

印尼华侨史 文书立卷方法	李学民 黄昆章 黄勋拔	暨南大学 省方志办
-----------------	----------------	--------------

科普著作类

项 目	作 者	工作单位
三等奖 6 项:		
中国与社会主义 庞巴维克	邱金用 吉布武 肖步才	省委党校 暨南大学
东方之珠——香港	周维平主编	省社科院
100对华投资问题	张作乾	广州外贸学院
深圳经济面面观	唐火照	深圳市府办公厅
古今中外婚俗奇谈	叶旭明 谢华东	郁南县文化馆

工具书、翻译作品、古籍整理和注释、资料汇编类

项 目	作 者	工作单位
二等奖 8 项: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	詹伯慧主编	暨南大学
孙中山全集(8—11卷)	陈锡祺 段云章 张 磊 方式光等	中山大学 省社科院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	省文史研究馆编	省文史研究馆
三等奖 5 项:		
简明中国民政辞典	孙克杰 王 文 叶春生 叶敏辉	省民政厅 中山大学
实用税务会计手册	沈公尚	广州市税务二分局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	省社科院中国古代 史研究室	省社科院
历代竹枝词选	李廷锦	中山大学
冒号分类法解说及类表	李畅发 宋克强等	省教育学院 深圳图书馆

学术论文类(包括调查报告等)

项 目	作 者	工作单位
一等奖 1 项:		
实行外向型发展广东经济的战略	张元元 关其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二等奖 8 项:	廖建祥	省社科院
广州文化发展战略构想 (1986 年—2000 年)	广州文化发展战略 专题研究组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软科学公司
论现实的人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邹永图	华南师大
广东省 1985 年投入产出模型编制技术报告	翟锦云	省统计局
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	广州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几个问题	王 琢 廖曙辉	省委政研室 省府体改办
陶行知教育思想浅识	杨应彬	省政协
珠江三角洲在经济开放形势下的教育现状及对策	省教育学会联合调 查组	省教育学会
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	黄 彦	省社科院
三等奖 40 项:		
历史唯物主义探源	黎克明 蔡茂生	华南师大
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性	柯木火	暨南大学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组论文	高齐云	中山大学
中国妇女的一面旗帜——抗战时期宋庆龄在广东的活动	吴淑珍	中山大学
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若干问题	郑 群	省政协
法制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	吴世宦	中山大学
影响工厂技术人员态度的主要因素	董遵圻	中山大学
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	练铭志	省民族研究所
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粮食体制	张 井	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外引内联办基地发展外向型农业	杜松年	汕头市政研室
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	文武汉	省物价研究所
谈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马恩成	省农委
对农村经济实现商品化问题的探讨	蒋 励	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中, 如何 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	龚鉴尧	省人大常委会
试论新型的企业集团	王 河	暨南大学
广州市中外合营企业经营若干问题	朱家健 郭东临	中山大学
	李雁玲 陈 冰	
投资管理体制与金融宏观调节	李根郁	省人民银行
金融改革与银行负债	余伦昌	省人民银行
对我省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回顾和 建议	郭镜谦	省物资总公司
广东财政发展战略研究	黄贯球 刘秀中	省财政科研所
论我国工资与就业组合的转变	王 珺	中山大学
	蒋江敏	中行广州国际金融研究所
论2000年广东利用外资发展战略	吴润经 蒋江敏	中行广州国际金融研究所
计划生育促进了东莞县的社会经济 发展	胡甫强	省计生委
经济联合与金融改革	刘士焜	省农业银行
外贸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	魏廷华	省对外经贸发展研究所
把粮食生产经营纳入有计划商品生 产的轨道	林望轩	省粮食局
普通学校教师职责	严永晃	省教育学院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实质与人才开 发态势的变化	彭文晋	省人才研究所
从广州市区初中“流生”问题看更新 教育思想的重要性	广东广州教育学研 究会联合调查组	省教育学会 广州市教育学会
广东省高等学校招生标准化考试试 验阶段性成果	省招生委员会高校 招生考试标准化 考试试验研究组	省招生委员会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	汤毓强	华南师大
《水浒》与《米歇尔·戈哈斯》	魏家国	广州外语学院
《战争与和平》和《三国演义》史诗风 格比较	易新农	中山大学
黑格尔的艺术本质论	刘伟林	华南师大
论广东社会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吴义宏	省文化厅
用电视和电脑辅助英语教学	黄 均	暨南大学

近代“候文”书信文中常用敬语

谦语的探讨

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

论近代广东经学的时代特征

试论省(市)图书馆的决策服务

四等奖36项:

思想建设战略的辩证法

思想工作的磁性效应

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调查

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

民族学研究引进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租赁、承包、股份“三位一体制”的设想

实行多层次的综合治理——关于改革控制工资基金方式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地租问题

轻工集体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初探

国营企业股份化和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

税收心理学初探

广东人口发展战略问题初探

解决广东省资金供求矛盾的对策

关于审计程序的研究

论外向型经济统计

经济特区法的调整范围及其法律特征

完善微观金融行为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关于茂名市在体改中如何正确处理

中央企业和地方关系的调查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若干问题初探

试析广东省出口增长的因素

走生活教育之路为社会主义兴学

论因材施教

普通中专招生计划制度改革的探讨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高等

教育体制的改革

郭存智

贺跃夫

章权才

胡继武

吴群策

牛先民

郑雁雄

梁庆寅

姜永兴

黄康辉

李华杰

李永杰

李其应

许隆

谭达球

曾艺人

揭晔

廖世添

许小波

彭永美

叶荣基

黎学玲

林可

肖贤成

李克华

徐德志

许鉴

陈飘

侯雷石

谭锐汉

广州外贸学院

中山大学

省社科联

中山大学

省委讲师团

省总工会干校

广州中医学院

中山大学

省民院

徐闻县体改办

华南师大

省港澳研究中心

新会县二轻总公司

省建行

廉江县税务局

省社科院

省计委

省审计科研培训中心

广州市统计局

中山大学

中行江门分行

茂名市委

省社科院

省外经贸委

广州白云行知职业中学

省教育学会

省邮电学校

省商学院

对独生子女问题的再认识	汪文甫	东山区委党校
马洛剧作主题节奏的两大特点	刘仁静	广州四十八中学
绿川英子在中国抗日和解放战争中 贡献一生	白牛	中山大学
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	李益三	广州文史馆
中山大学六十年(上、下)	许肇琳	中山大学
广东解放初期为建立统一人民币市 场进行的货币斗争	张天枢	省教育厅
宋太宗论	梁山	中山大学
北魏西魏的麻田为世业田质疑	吴平	省人民银行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 探讨	张其凡	暨南大学
新中国的诞生和国际政治格局	杜绍顺	华南师大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	杨式挺	省博
论高校图书馆参考工作的组织	李肇新	暨南大学
	李锦全	中山大学
	陶炼	深圳大学

青年奖(19项)

项目	作者	工作单位
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 方法	李宗桂	中山大学
理性的唤醒——西方认识论冲击下 的中国近代哲学	陈少明	中山大学
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	黎红蕾	中山大学
决策思维学	刘悦伦 廖为健	中山大学
论广东地方外汇的综合平衡	李江涛	广州市社科所
略论产品质量的宏观调控问题	邱志钢	中行广州国际金融研究所
论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几个问题	郭克莎	华南师大
深圳特区土地全面商品化经营探讨	左正	暨南大学
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观念因素	桂强芳	深圳市国土局
逐步推行领导职务任期制	伍毅斌	深圳市教委
《汉姆雷特》中不存在“推迟”问题	钟绍星	省委组织部
文学流派、文学史及其他	黄俊雄	中山大学
	殷国明	暨南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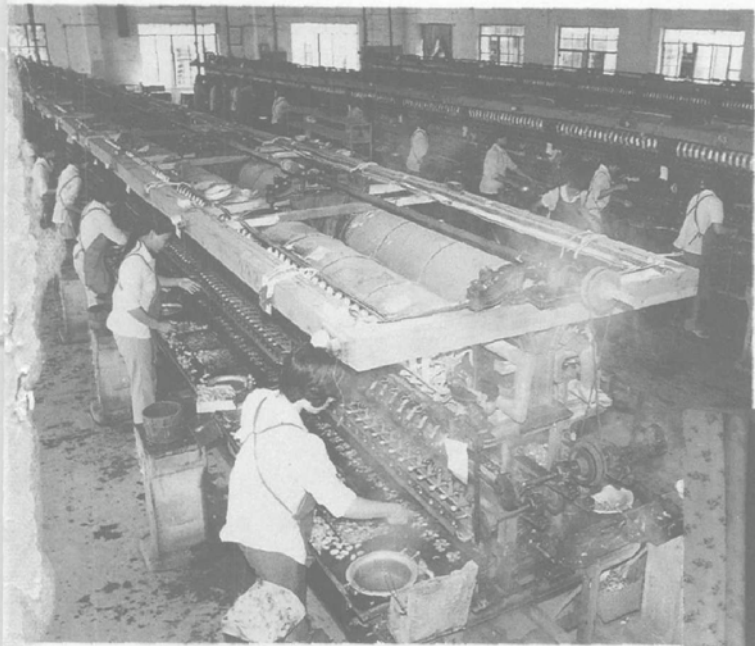
存在句之我见	周海中	中山大学
幼儿学讲普通话(语音训练)	李启文	广州师院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	桑兵	中山大学
护国运动时期商人心理研究	莫世祥	暨南大学
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	罗一星	省社科院
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	林立平	暨南大学
藏而致用 流通开放——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本质和主流	程焕文	中山大学

更 正

本刊今年第一期《科学地认识“五四”的时刻到来了》一文第37页第2栏第25行中的“波诺”应为“般诺”，第38页第1栏第6行中的《中国历史的危机》应为《中国意识的危机》，特此更正。



充满活力的德庆山区工业



▲ 德庆县缫丝厂（生产车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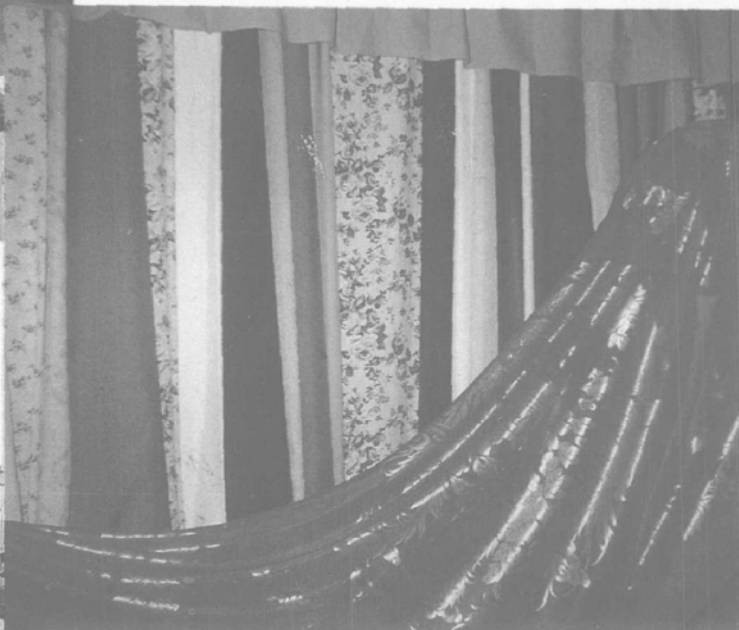
▼ 德庆县二轻服装厂（生产车间）



德庆县城镇粉厂的部分米、豆、
▼ 芝麻加工产品。



▲ 德庆县桂皮加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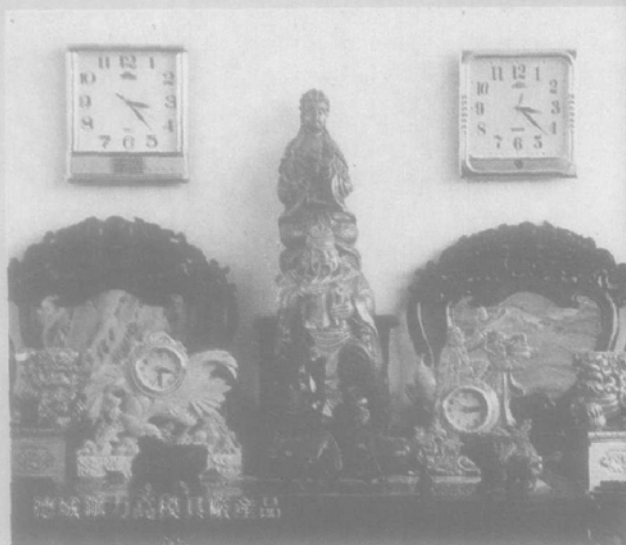


▲ 德庆县丝织厂生产的软缎被面及36"美丽绸、36"无光纺等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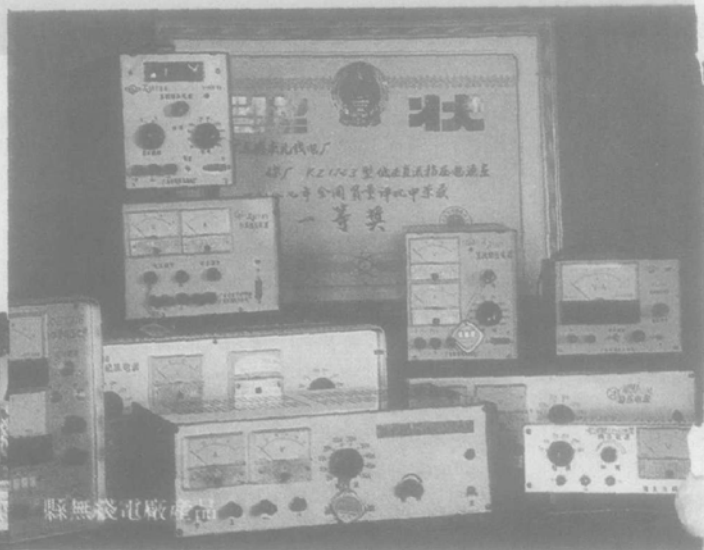
▲ 德庆县首乌酒厂，生产首乌酒、首乌汁、

稳步发展的德庆山区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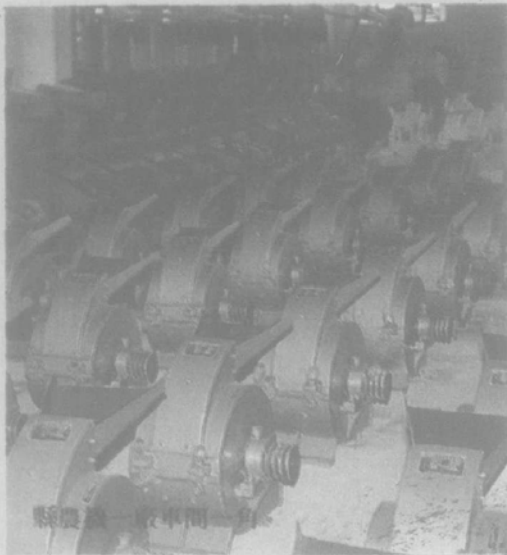
德庆镇力高模具厂产品

德庆镇力高模具厂生产的力时达石英钟。



德庆县无线电厂产品

德庆县无线电厂生产的各类电器产品。



德庆县农机厂产品

德庆县农机厂生产各类饲料粉碎机及农机系列产品。

德庆县电表厂生产各类电表仪器。

德庆稀土磁性材料厂生产的钕铁硼磁性材料。

